

17-09

麻城文史资料

第一辑

17-09
17-09
17-09
17-09
17-0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47259/01

麻城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张薪樵

编 辑：蔡业振

封面设计：余敏文

封面题字：戴定荣

校 对：蔡业振

范志斌

目 录

组建华东海军前后·····	徐在先	(1)
北伐将领 <u>王操如</u> ·····	宋埠区志办	(6)
熊冕南父女·····	熊知礼口述 李宗权整理	(7)
石辟澜·····	市委党史办	(9)
浩气长存		
——记革命烈士王开玉·····	林声口述 王杰整理	(22)
奇袭余家冲·····	余辉成口述· 沈作夫整理	(26)
“左”倾路线的悲剧		
——简记可行桥惨案·····	李成彬 陈邑	(29)
湖北省第一座水库——大塝水库·····	龟山区志办	(31)
余诚生平简介·····	市政协文史办	(35)
李贽在钓鱼台讲学·····	阎河区志办	(37)
农民起义领袖鲍世荣·····	缪镜洁 何均 屈介蕃收集整理	(39)
彭韬及其遗作·····	彭锋吾收集整理	(41)
严重其人·····	严政 徐怨宇 严善明口述 甘茂森整理	(45)
我所知道的夏斗寅·····	王中兴	(50)
麻城五十年代的扫盲工作·····	闾丁(执笔) 严仪周	(54)
李柱中先生的办学思想·····	朱长愈	(57)
汪子弼先生办教育二、三事·····	童桂馥	(59)
“麻城良师”——刘世楹·····	刘美灼	(62)
我的祖父胡衡甫·····	胡勇(执笔) 胡金勇	(65)
为羨君家方术异 金针度处亦延年		
——回忆我的父亲、麻城著名针灸师王		

仲芳.....	王曙光 (68)
“天福泰”戏班的建立及其发展.....	缪镜洁 (71)
农民梅勤生的口头诗.....	梅基癸 (74)
农民诗人陈道信.....	王杰 (80)
蔡家山采陶工艺与抽象装饰.....	余敏文 (83)
能工巧匠夏长炳.....	夏德能 夏远明口述 沈作夫整理 (88)
✓ 侵华日寇盘踞宋埠罪行种种.....	周基正 胡良斌 徐厚良 李明 (90)
宋埠沦陷后的日伪政权 机构.....	汪显主 李明 刘世德 胡良斌 (96)
日寇侵华战争中宋埠陷区经济掠夺种种.....	徐厚良 叶世堂 李德昭 (101)
我所知道的日伪“麻城县合作社”.....	李德昭 (104)
✓ 王家细湾的劫难.....	王杰 (107)
✓ 日寇铁蹄在料棚.....	李成彬 (109)
✓ 求孙埠惨案.....	余品璋 (110)
我在麻南敌后抗战的一段经历.....	刘永贤 (112)
民族勇士万孝浩.....	张良钧 张远亮 (121)
智溺日寇.....	黄昌益 (123)
✓ 郝家铺教案始末.....	宋埠区志办 (124)
王五玉轶事.....	缪镜洁收集整理 (127)
吴久阶趣事.....	李成彬 陈邑整理 (139)
盐田河的来由.....	董胜来 缪镜洁整理 (141)
蕙兰山上蕙兰香.....	缪镜洁 (143)
磨子河趣闻.....	缪镜洁 (146)

组建华东海军前后

徐 在 先

继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之后，我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发起了淮海战役。这个战役，经过三个阶段、六十五天的艰苦战斗，取得了完全、伟大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击毙、击伤、生俘敌官兵共计五十五万余人。从而为解放上海、南京，进而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支持下，继续在中国人民面前玩弄反革命阴谋。蒋介石一方面导演“下野”的丑剧，推出李宗仁同我党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却加紧搜罗残兵败将，布置江防，妄图负隅顽抗。以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所部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间的八百四十公里地段上；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所部四十个师，二十五万人，布防于宜昌至湖口间的九百九十八公里地段上。以敌海军第二舰队扼守长江下游，护卫蒋家王朝营垒——南京；江防舰队居长江中游。另以飞机三百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还有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停泊于上海及长江口，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我军南下渡江作战，固守江南。

我党中央对敌人的阴谋洞悉无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词中，针对敌人的阴谋，向全军发出了“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号召，提出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军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经过短期整训，迅速进行渡江演习，筹备渡江器材的工作，并将战斗序列编为东集团、中集团、西集团，部署了渡江作战任务。我当时是第三野战军后备兵团第一师政委，参与了渡江作战和接管江阴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谈判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完全暴露了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华东我军遵照这一命令，在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与二野密切协同，于当晚二十时开始，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渡江作战，百万雄师乘着数千只木船，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南疾进。在北岸我军强大炮火的支持下，渡江大军突破敌炮、敌舰的拦击迅速接近敌岸。四月二十一日，我东集团渡江成功。在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工作的相互配合下，国民党江阴要塞守敌七千人于二十二日宣布起义。

江阴，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敌布防了两个炮团，一个步团。有个炮团团长叫唐丙林，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其兄唐真照，是我党苏北的地委书记。通过他们在敌军官兵中做争取工作，加上守敌慑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遂被迫宣布起义。

我军占领江阴要塞后，迅速控制了炮台，配合江北三野的一个特纵，五个团的兵力，严密地封锁了江阴沿线江面。这时，英帝国主义派来四艘军舰向我挑畔，我军立即予以猛烈还击，其中旗舰“紫石英”号被我击伤，在镇江水面搁浅了。其他三艘向上海逃逸。国民党的第二舰队，则全部被我封锁，无法逃遁。二十三日，该舰队司令林遵，遂率舰艇二十五艘在南

京附近江面起义，其余二十三艘，被迫在镇江江面投降。当晚，我渡江部队解放了南京城，从根本上动摇了蒋家王朝。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军渡江胜利以后，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发起了上海战役，至二十七日，即解放了上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抢夺资财和挑起国际事端的阴谋，为保卫我国海防、继续肃清国内残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南京和上海获得解放以后，蒋家王朝已面临全面崩溃，但其亡我之心仍然不死，他们凭借海上优势继续作乱。帝国主义也不肯轻易放弃在中国既得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拚命支持行将复灭的蒋家王朝，进行垂死挣扎。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单一陆军兵种的我军，就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了，要对付海上的敌人就有困难。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保卫上海及沿海水域的安全，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海军。因此，华东野战军前委于我军接管江阴不久派员到江阴要塞司令部召集有关干部会议，研究建立华东海军问题。当时我任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政委。记得会议确定的华东海军的组织序列是：第一，以国民党海军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起义的二十五艘舰船为基础，编为华东海军第六舰队；第二，把接受过来的上海国民党“中”字号十多条大型运输舰，编为华东海军第五舰队；第三，将在镇江水面被迫投降的国民党第二舰队的二十三艘舰船，编为华东海军江防舰队；第四，将接收国民党一部分质量较差的江防舰，编为扫雷大队；第五，从国外进口部分鱼雷快艇，编为快艇大队；第六，将江阴要塞与吴淞要塞合并，成立松沪水警区。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艰难曲折的。华东海军建立初期，存在的困难不少。但都被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我军干

部战士一一克服了。首先是，如何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改造成为人民海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取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法。思想教育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忆苦思甜、两党对比、新旧对比等活动，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性质，宗旨和方针政策，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和反人民的本质，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组织整顿主要是从我军中选调一批优秀的干部战士上船上舰，掌握要害，直接指挥。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正确的，改造是成功的。其次是，解决“旱鸭子下水问题多”的问题。我们三野长期从事陆地作战，北方人较多，人称“旱鸭子”。这些同志从陆军转到海军，顾虑很多：怕晕船，怕出海回不来，怕负伤没有医院治疗，怕迷失方向，怕淡水和其他生活物资供给不上，怕完不成任务，等等。归纳起来，主要是怕水。对此，我军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集体动员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号召大家发扬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认真组织干部战士进行技术训练，通过沙盘作业、地图作业、水上演习等方法，使其掌握海上作战特点，掌握武器装备的操作方法。这样，终于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提高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

华东海军的雏形一经建立，就立即投入了革命战争。同年六月一日，我海军舰艇，在陆军和强大的海岸炮密切配合下，一举解放了崇明岛，运送了我一个炮团和一个步团的兵力登陆，首战告捷，为华东海军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七月，华东海军正式组建起来后，司令部由江阴要塞迁到上海水电路。由袁也烈任司令员兼政委，后调赵启民为政委，高志荣任副司令员，康志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冠三任参谋长，以后主要负责同志因工作需要几经更

换，第二任司令员为张爱萍，第三任司令员为陶勇，第四任司令员为饶守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利益，党中央指示华东的党组织和军队集中一切力量，占领沿海岛屿，肃清残敌，剿灭土匪、海盗。华东海军根据中央和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示，于一九五〇年春收复了舟山群岛和嵎泗列岛，并建立了相应的海军基地。这时的华东海军，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较强的战斗能力。为保卫华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华东海军的所属单位有第五、六舰队、江防舰队、扫雷大队、快艇大队、淞沪水警区、舟山基地，外加仓库、工厂、学校等单位，约三万余人，除一部分干部战士为原二舰队起义投诚人员外，其余大部都是从华东各纵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都是经过多年战争考验的骨干，身强力壮，政治可靠的优秀分子。华东海军的建立，对于保卫大上海，保卫祖国的东部领海不受侵犯，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东海军建立后，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青岛也相继建立了海军，称为北海舰队；广州也成立了海军，称为南海舰队，我们的华东海军也改名为东海舰队，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军委于一九五〇年的上半年，建立了中国人民海军司令部，由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刘道生、王宏坤、方强任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海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她是在我党领导下，经过全军指战员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兵种。我们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海军，并使其日益发展、壮大，确实是罕见的。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惊呼：“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北伐将领王操如

王操如，字王林，亦字原松。（1878——1926）麻城市宋埠区杨畈冲村王家大坑人。保定军校毕业生。北伐战争爆发，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一军所属第一师少将参谋，始与贺龙结识。王刚勇多谋，身先士卒，与北洋军阀吴佩孚作战，屡战屡胜，深得贺龙赏识。1923年汀泗桥战斗，作战失利，几丧全军，王与贺双双奋力突围，脱险后，同回王家大坑稍事休息。贺龙仅留宿一夜，翌日便回川以招旧部。月余，贺致函王操如，接其归队就职。王与贺于北伐时期，共同求索救国真谛，倾向共产党的主张，与贺龙交谊甚笃。1925年，贺与王率部由四川至云南进湖南追讨军阀，多立战功。1926年8月27日，为配合汀泗桥战役，在湖南与贺祖耀军阀部队作战中，在桃园县热水坑遭国民党右翼分子暗算，不幸牺牲，其时年仅四十八岁。操如牺牲后，贺龙大恸，说：“失去操如，就是失去了我的左臂”。全军无不动容。为褒扬北伐英烈，军部特派仪仗队护柩归葬麻城杨畈冲，追加中将军衔，并设灵位于歧亭杏花村《烈士祠》。与辛亥革命先驱屈子厚、周干臣并列灵牌，供后人凭吊。灵前，还有唐生智等各界人士赠献的挽联一百多幅，其中贺龙亲拟挽联云：

“不贪钱、不怕死，致其终志；

爱人民、爱共和，乃厥初衷”。

贺龙率部起义后，还念念不忘战友王操如，直到1949年大军横渡长江胜利前后，还将珍藏的画像列入革命烈士行列，于战前动员，战后追奠先烈作为楷模，教育将士。解放后还亲自

过问其遗属生活，并珍赠操如遗像，以示永怀。

宋埠区志办

熊冕南父女

熊知礼口述 李宗权整理

木子店丁家坳乡熊冕南，化名履冰，（1876—1945），前清秀才。其父汝明，廪生；祖父名灿，咸丰己未科进士。他家三代儒生，不求仕进，甘教私塾为生，世称孔孟之徒，诗书礼乐之家。

一九二六年冬，熊冕南先生在鸭儿河本族祠堂设馆教书，受到武昌读书回来的学生李梯云等人的影响，革命的思想逐步萌芽。不久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殷家园农民协会秘书。他白日教书，夜晚偕随身就读的大女儿家模和在武昌农民讲习所麻城分所回来不久的二女儿家训出没村庄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劳农神圣”，“一切权利归农会”的革命口号。以后，他俩女儿也相继加入党组织。熊家训任殷家园“农协”妇女会长，熊家模任副会长。多次到石碇坳、木子店、东义洲等地演讲宣传，提倡“妇女剪头放脚”，“反对封建婚姻”，“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等主张。她们的革命活动，使豪绅惶恐不安。于是，家族房户非议：“冕南父女参加赤党，妄言邪说，败坏家风”；社会豪绅诽谤：“熊冕南，父不父，女不女，伤害人伦，紊乱纲常”。他们父女面对种种责难，有时“横眉冷

对”，有时“以牙还牙”，有时“挥毫回击”，家模写过“讨沈芝台檄文”，公开与她小时订过婚的沈家进行抗婚废约。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大革命失败。殷家园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芳原被土劣捉送国民党第十三师驻滕家堡的沈寅洲部。不久，于两河口被杀害。并侦察捕捉熊氏父女三人，熊冕南先生获悉，逃至龟山矮桥在同族家教书隐身近十年。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形势转好，才回梓里仍在族祠教书，一九四二年于塾馆病故。家模逃往武汉继续读书，考入省女中、省女师暨武昌中华大学等校学习，在省女中期间散发过《向导周刊》，曾参加过周恩来举办的“政干训练团”，因脚小没有赶上火车而落伍了。她武昌“中大”毕业后，在麻城闵集、石碇坳、罗田肖家坳，武汉临中、世界佛学院等地中小学教书。一九七二年退休，任教三十七年。一九八一年她八十岁于武汉病故，终身未嫁。家模，在家隐蔽，被家族房户发现，强行逼迫出嫁，胸怀积郁，两年后回娘家咯血而歿。

熊冕南，虽读孔孟之书，不拘泥于孔孟之道，敢与封建礼教反其道而行之，他出于山区一个科第功名之家，确实难能可贵。家模、家模，作为书香门第之后，不做娇娇小姐，敢于与三纲五常挑战，成为巾帼女郎。

熊冕南先生，一家祖孙四代教书，桃李满天下；父女相携革命，麻东人民交口颂扬。

石 辟 澜

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八月，我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忠诚战士石辟澜英勇牺牲了。对于他的死，大别山的人民是十分痛惜的。血肉之躯可灭，生命之花常开。石辟澜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象一朵灿烂的山花，永远开在人们的心中。

寻找真理 锋芒初试

石辟澜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城内西门外廖厝巷驸马里二号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里，乳名海青，一名鸣球，又名尔平。父亲名琢之，是老实的手工艺人，母亲蔡兰英，是贤惠的家庭妇女，虽未上过学，但靠自学，能够亲笔给儿女们写信。兄妹五人，石辟澜排行老二，一家七口，靠父亲做手艺为生。住房狭窄，每逢阴雨，屋漏难以遮身。石辟澜虽家境贫寒，其父仍让他念书，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念完小学。在校读书时，石辟澜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后因父亲患病，家庭生活困窘，才中辍了学业，去当补鞋匠，挣钱养家糊口。劳作之余，他总是手不释卷，虚心求教。稍长，先后在家乡及汕头当过小学教师。当年的潮州，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下，马列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加之党

所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给辟澜纯洁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石辟澜在家乡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统治，急切寻找“拯斯民于水火”的真理，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前后到了广州，靠做点小事情和卖文为生，并就读于国民大学夜校政治经济系。时留日进步学生何干之（谭秀峰）、谭国标在国民大学任教，石辟澜听了他们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犹如在长夜难明的境况中隐约望到了启明星的闪光。他与同学年学史、陈健等组织秘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针砭时弊，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之后，石辟澜参加了广东文化运动总同盟（简称“文总”）。

“文总”当时是我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主要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联盟”、“戏剧作家联盟”等群众组织。“文总”负责人经常开会，传达党的指示文件，研究斗争形势。石辟澜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青年成立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推销、介绍进步书刊，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进行革命宣传演说。在这风雨如磐的年月里，石辟澜怀着赤子之心，满腔热情，无畏地战斗着、学习着，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西南政府”陈济棠害怕革命力量发展，派代表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撕掉“反蒋抗日”的假面具，加紧镇压人民革命，于八月一日枪杀了“文总”负责人谭国标、温盛刚、郑挺秀、凌伯骥、赖寅仿、何仁棠等同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文总”无法继续活动。“文总”负责人部分转移上海，石辟澜走避香港。

在香港，石辟澜到《大众日报》当记者和编辑。这个报是

“民族革命大同盟”办的，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反蒋抗日的喉舌。石辟澜根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促进群众救亡运动的发展，还直接加入了“民盟”，并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形势，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利用办报的有利条件，广泛结交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与洪飙同志等在一起组织了香港救国会，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港救会”以其鲜明的抗日救国色彩吸引了各阶层人士和人民大众，很快形成了能够号召一千多人进行救亡活动的群众团体。“港救会”还出版了一个油印刊物《偕行》，并筹办了一家书店，继续发展读书会，举办工人夜校，利用《大众日报》副刊开展宣传活动等等，群众活动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港救会”的成立及其斗争活动，受到了社会上的注视，很快成为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砥柱中流 顽石不烂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国民党卖国投降，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一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石辟澜作为华南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精辟地分析了广东和全国的形势，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好评。石辟澜被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总务部总干事，负责全救会的组织联络，处理文件信函，管理经费收支，参与起草文件等日常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去世了。辟澜得知消

息，心情十分悲痛。二十日鲁迅遗体移到万国殡仪馆，他连续十余次去瞻仰遗容。他说：“这是最后一眼，看到每个到来的都十分悲痛，这就是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撕下身上的衬衫来写哀词：“哭鲁迅先生，踏着你走的路。”鲁迅先生去世后，全救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活动，在上海发动了一万多群众到万国殡仪馆给鲁迅先生送葬。一路上，群众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石辟澜为之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国民党借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下旬，“全救会”领袖人物“七君子”被捕。原来在第二线的石辟澜等年青的“全救会”干事，立场坚定，毫不畏惧，勇敢地把整个斗争的责任担了起来。“全救会”及时发表了《紧急宣言》、《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爱国获罪”的反动实质。十二月上旬，宋庆龄带领十一位各界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要求高等法院将她收押，提出如主张抗日救国有罪，愿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与他们同享自由。“全救会”发动全国各地救国会共同行动，都要求入狱，迫使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释放“七君子”。与此同时，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斗争形势变得异常尖锐复杂。陈立夫、陈果夫提出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被冯玉祥所阻止。对“西安事变”如何表态，是摆在“全救会”青年干事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石辟澜与其他干事一道，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草拟了一篇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接受张学良八条要求；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北上抗日。在讨论宣言时，一些大学教授中的救国会会员不同意，主张让张、杨杀掉蒋介石，争论异常激烈。石辟澜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感情用事的过激做法，导致的

后果将不堪设想，与其他青年干事一道力排众议，坚持将宣言发表了。在这场救国会内部的斗争中，石辟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使青年干事们挑起了救国运动的重担，成为全救会的中坚。

在“全救会”工作期间，石辟澜化名石不烂，始终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赤诚的爱国之心，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海枯石烂，矢志不移”，为“全救会”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冬，石辟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沦陷，石辟澜以“全救会”执委兼总干事身份回到广东。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石辟澜奉命先是在国民党组织的“广东各界抗战御侮联合会”任职，以特派员、督察员身份去各地巡视检查，发动和组织较为落后的群众；随后就积极加入到文化界的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中去，被选为“文抗”（即广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会的理事。

为了便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石辟澜提出成立一个识字组，并自告奋勇当组长。他带领一批同志举着文抗宣传部识字组的旗子，扛着一大堆识字牌子，到“二厘馆”（黄包车夫食宿、聚集之所），深入到工人的生活中去，把识字教育同抗战宣传结合起来，把讲解“有力出力”同提高阶级觉悟联系起来。黄包车工人中有很多来自海、陆丰与潮汕的破产农民，石辟澜和他们乡音相通，亲切融洽。由于他和同志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久就在工人中建立了党的组织，搞好了工会工作。石辟澜还参加了“抗战教育实践社”的活动，经常到中山大学去搞抗战讲座。同时，还对“抗战教育实践社”开办的“自修班”青年学员的学习、生活和实践予以热情的指导。此外，他还为宣传团结抗战的《新战线》撰稿。他在《新战

线》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如《安定民心的限度》、《扩大反间谍、反汉奸运动》等，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麻痹人民，消极抗战的阴谋，象匕首、投枪一样，插入顽固派的心脏，顽固派见之胆寒，民众见之拍手叫好。

石辟澜是一个很能干的宣传工作者，文笔出众，善于词令。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中，往往众议纷纭，莫衷一是，他常以马列主义深锐的眼光，分析形势，精辟说理，态度雍容，言简意明，闻者为之叹服。他还随姜君辰等同志参加了世界反侵略会广州分会的工作，在广州分会召开的各界头面人物大型会议上，石辟澜摆事实，讲道理，条分缕析，义正辞严，痛斥法西斯的暴行，与会者为之折服。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在姜君辰、石辟澜的倡导下，大会通过了向希特勒抗议和谴责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文件。

一九三八年十月，顽固派日渐露出消极抗战、积极“限共”的面目，在武汉公开解散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民先”、“青联”、“蚁社”三大抗日团体，在宣传上制造了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谬论，这“三个一”完全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在理论上狗屁不通，在政治上居心险恶。广东顽固派紧步后尘，在省党部办的《中山日报》上，大写鼓吹“三个一”谬论的长篇文章。广东“文抗”宣传部的同志义愤填膺，奋力进行反击，驳斥“三个一”的反动谬论。石辟澜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力斥谬论。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后长驱直入，广州随即沦陷，四战区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撤离广州。石

辟澜随四战区撤到韶关。一九三九年初，石辟澜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主办省委刊物《新华南》半月刊，社址设在曲江城中罗沙巷八号二楼一座约三十平方米破旧的本楼里。为了使杂志顺利发行和有号召力，石辟澜慎重地提出了以国民党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进步教授尚仲衣为编委主任的和各有关著名人士参加的编辑委员会。经过石辟澜等不分白天黑夜紧张地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修改稿件，《新华南》创刊号终于在四月一日问世了。

《新华南》问世后，它以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网遍及粤、桂、湘、赣、闽等省。每期尽管印数达四千份以上，但都被抢购一空。销数之大，超过了当时韶关出版的任何刊物，因而震动了粤北，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采取种种卑劣手法，企图扼杀在摇篮中的《新华南》，但都没有得逞。首先，在审稿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稿件进行阉割、腰斩、删削以至扣压全篇，往往一篇好端端的文章，被这帮文化刽子手砍杀得鸡零狗碎，不伦不类。许多重要文章被扣发，更有甚者追究文责，无妄之灾从天而降。对此，石辟澜与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行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石辟澜采取分批送稿，在编后话中声明稿件被扣，或被删多少字，或开窗口、留空白等办法，使读者可以从中领会文章精神。其次，在印刷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控制印刷行业，拒印《新华南》，曲江不能印刷，石辟澜通过党组织把稿子送到赣州、衡阳去印。为了解决印刷困难，石辟澜还与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设立的“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联系，创办了印刷、樟脑、机器三个合作社，从而解决了印刷难的问题。国民党顽固派眼见他们的阴谋一一被粉碎，就采用跟踪、恫吓《新

华南》的作者和读者，派特务监视《新华南》社等惯用的伎俩进行破坏。石辟澜面对反动派的恫吓，毫不畏缩，仍一往无前地战斗着。《新华南》还面临印刷经费困难的问题，石辟澜发动各界人士捐款资助。一九三九年石辟澜到赣州筹出赣州分版，在赣州进行募捐，当时赣州各界包括蒋经国在内都捐了款。在石辟澜的努力下，《新华南》运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导广大人民向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教育人民树立抗日必胜信心，《新华南》无形中成了照耀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一盏明灯。

一九三九年六月，平江惨案发生。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集团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逆转，《新华南》处境更是险恶。广东CC分子高信在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出版会议上，公然指名大骂《新华南》，还派遣特务跟踪石辟澜。党为了石辟澜的安全，一九四〇年夏把他调离粤北。同年秋，中共粤南省委成立，石辟澜任中共粤南省委宣传部长。在粤南省委工作期间，石辟澜患严重肺病，经常发烧咯血。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带病坚持工作。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轰炸九龙，石辟澜住地房屋玻璃被震碎，敌机仍在头上盘旋轰炸，石辟澜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五楼将党的机密文件烧毁。为了党的事业，他确实做到了与友人共勉时说的一句话：“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剑胆琴心 高风亮节

日军轰炸九龙不久，“南委”转移。一九四二年二、三月，石辟澜到达梅县，因病暂不工作，化名余清在乡间养病。在养病期间，其父因贫病交加，在香港去世，得同乡资助，才

将遗体安葬。他的妹妹玩娟多次来信，告知其母在家生活困难，催促石辟澜寄钱养家。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石辟澜在给妹妹玩娟的信中写道：“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命运更惨，我想她老人家这样年纪，反而吃白花花的粥，心里就难过。”“我现在确实无法按月寄钱……你们三姐妹要尽力代我养母亲……”在给弟弟石泉安的信中写道：

“我要你负起责任，每月写两封信给母亲有实行没有？……相隔这么远，我只有祝你：自立、自学、自爱、自强，象你的哥哥那样！”“母亲那孤苦的生活，常常占有你大哥一部分心思！唉，她老人家实在是生活得太痛苦啊！她是最痛苦人群中的最痛苦的一个，为兄的虽已在外流浪十余年，但一念及她那凄凉的影子，就常常失眠。”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你有什么困难，或家里急需用钱时，可告诉一清先生……如万分没有办法，急需用钱时，可写信给周恩来先生，但这不要随便，非万分需要时，不要写信。”这些信，字里行间寄托着他对骨肉亲人的一往深情，但又处处以大局为重，丝毫不以私损公。

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动摇石辟澜坚强的革命信念。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本色，为革命，他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石辟澜在上海“全救会”工作时，他虽掌管着“全救会”的经费，但每月只领八块钱的生活津贴费，即使过春节，他仍穿着破旧的衣服。石辟澜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任职时，月薪八十元，但他仍然省吃俭用，除接济家中亲人外，尽量多缴党费以支持地下党的活动。对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他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以帮助。一次捐款慰劳前方战士，石辟澜在捐款簿上挥笔写下“捐款全月工资八十元”，尚仲衣教授激动地翘起大拇指，呼“石辟澜万岁！”石辟澜的爱国热忱使第三组的同志深为感动。

石辟澜在中共粤南省委任宣传部长时，与省委宣传部秘书邓戈明同志结婚。日军轰炸九龙后，石辟澜、邓戈明撤到香港，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这时，海上已被敌人封锁，时有敌人汽艇巡逻，并用机枪扫射，过海随时有牺牲的危险，石辟澜毅然派邓戈明乘小艇返回九龙，与组织部长王均予联系。

一九四二年五月，郭潜叛变，中共南委被破坏。冬，组织上决定石辟澜离开梅县，撤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待机赴延安。临行时，他与怀孕的妻子商定，孩子出生后即送老百姓抚养，以免影响工作。因此，石辟澜直到牺牲一直未见到过自己心爱的儿子。

“掌握情况 依靠群众”

一九四三年春，石辟澜绕道桂林到重庆。秋，与周恩来等同志同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到延安。石辟澜到达延安后，随即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共“七大”闭幕后，在中央城工部领导的大后方支部学习。石辟澜长期在白区工作，条件艰苦，来到延安，在党中央的身边学习，他无时不感到自豪，感到机会难得。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在他留下的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书上，在许多重要地方，用红笔划了杠，又用蓝铅笔划了杠，还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既有钢笔字的眉批，又有铅笔字的眉批。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石辟澜曾积极要求赴东北，但组织考虑需要有一批干部待机打回蒋管区工作，让石辟澜继续学习。一九四六年，全国内战形成，石辟澜获悉党组织拟派一批干部去蒋管区做地下工作，他又积极要求回南方。经组织批准，石辟澜和邓戈明带着四个月的小女儿，经半年长途跋涉，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到达冀鲁豫解放区。

石辟澜来到冀鲁豫解放区后，积极要求到基层锻炼，被分配到南乐县任县委副书记。他的身体不好，但坚持跟群众一样，吃苞谷、红苕。他穿着又长又大的旧棉袄，县委机关的同志们想给他添点衣物，调剂一下伙食，他总是问：“这是不是制度规定的，大家是不是都有？”是制度允许的，大家都有，他才接受，否则他都予以谢绝。他在生活上是低标准的。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石辟澜曾向南乐县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表示：“如果我能在南乐摸一个月至两个月，让我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了解本县一些起码必须了解的情况，那么就是战争到来时我也不怕了。”组织部长问他所依据的条件是什么？石辟澜回答说：“只有八个字，就是‘掌握情况，依靠群众’，如能够好好遵守这八个字去行事，任何战争到来，都是不足怕的。”一九四七年春，南乐县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开展“耕者有其田”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填平补齐”的查田工作。石辟澜日以继夜地战斗在第一线，他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亲自参加会议，领导群众运动。会前他与村干部、农会积极分子作周密的布置，会后及时进行总结。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工作之余，石辟澜总是孜孜不倦、顽强地坚持学习。一张布告，一项法令，一个同志的报告或讲话，和村干部交谈，他从不放过机会从中学习。他把学马列主义理论，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与南乐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工作作得很出色，受到了南乐干部的尊敬，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七年六月，党中央、毛主席洞察形势，决定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接着一

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大别山解放区。其时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动员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石辟澜一向喜欢火热的战斗生活，主动要求南下，他离别了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小女儿来到巍巍的大别山参加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斗争。

英勇献身 浩气长存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毛主席曾作了估计，提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首长要求全军要争取第三个前途，站稳脚跟。一九四七年九月初，石辟澜遵照刘邓首长指示，来到了工作最艰苦的麻东地区，任麻东县委委员、麻东工作队队长。这时石辟澜仍用化名余清，群众亲切地称他为余队长。

麻东，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有郑齐玉反动民团镇压我商南起义，经常掳掠、骚扰我苏区。由于种种原因，这股反动势力一直没有被消灭，反革命势力比较猖狂。石辟澜来后，住在河西新屋湾。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深入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教儿童团唱革命歌曲，在墙上书写大幅标语：“帮解放军，跟共产党走！”“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他带领贫民团打了大地主、土豪张兆加、张哈细、张静山、李普玉等，把地主的粮食、衣物、农具分给穷苦农民。千百年来，穷苦农民只有把粮食财物往地主家里送，而今，被颠倒了的历史第一次被颠倒过来了，农民第一次见到了青天。革命的风暴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他们不甘心失败，妄图进行垂死挣扎。国民党县自卫队中队长郑家贤、东木区区长郑家学秘密召开了会议，策划反革命暴乱。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开始了。

十月二十八日，匪徒们在王家山召开秘密会议，策划三十一日举行反革命暴乱。阴谋被我党发觉，我麻东县政府遂调一个排到任家湾乡政府驻防，敌不敢动手。十一月三日，我军撤回麻东县政府。匪郑家贤在明山黄川寺成立乡勇队，准备于四日举行暴乱，同日晚，石辟澜、白宪文等同志在任家湾乡政府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对策，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警卫员严国民（原名郭长豪）为了石辟澜的安全，要石辟澜在乡政府留宿，但石辟澜不同意。他说：“大敌当前，我们要为翻身农民撑腰壮胆，保卫胜利成果！”坚持要回驻地河西新屋。在回村途中，石辟澜打摆子失足落水，回村后就昏迷地躺在床上。十一月四日清晨，反革命暴乱开始了，匪徒们包围了乡政府。乡长白宪文组织工作队员们冲出了重围。匪徒们又蜂涌包围了石辟澜的驻地河西新屋。有的群众前来劝他躲避，石辟澜却关切地说：“不要管我们，当心飞子打着！”于是他们向后山突围。这时匪徒熊存绪带着被裹胁来的群众包围了石辟澜、严国民。当时匪徒们只有一条枪，而石辟澜的警卫员严国民既有枪又有手榴弹，而且枪法很准，只要开枪射击，突出包围完全没有问题。严国民当时要开枪射击，但石辟澜坚决不让打，说开枪会误伤老百姓。石辟澜试图向被裹胁来的群众讲明道理，制止暴乱。但匪徒们凶狠地夺去了严国民的枪枝，一涌而上，将他俩抓住，并吊在两棵大桑树上，严刑拷打，当地一位老妈妈不顾个人安危，将自己吃的糯米汤圆端来喂石辟澜和严国民。匪徒们把石辟澜押送到匪首郑家贤那里去邀功请赏，走到金字岗碰到小保队分队长游雪山，游雪山恶狠狠地说：“送么事，打死算了！”匪徒熊存绪、熊存玉争相动手，熊存玉夺过游雪山的枪，枪口对准石辟澜，严国民见此情景跑到石辟澜前面挡住，石辟澜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席！打倒国民

党反动派！”枪声一响，我们党的优秀儿子石辟澜、严国民倒在血泊之中。他俩牺牲后，当地老百姓把他们的遗体掩埋在沙滩上，十一月十一日，我鄂豫军区第四分区部队打回来，全歼了土匪，平息了暴乱，重新安葬了烈士的遗体，把他安葬在尹家岗上。解放后，人民为了纪念他，于一九六五年立了碑。

胡梅兰 执笔

浩 气 长 存

——记革命烈士王开玉

林声 口述 王杰 整理

王开玉，字飞鸣，化名江波，麻城市关厢区许家凉亭人。一九一四年出生，一九四八年三月牺牲于河南新县箭河区的柴山堡。

王开玉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弟兄三人，下辈只有他一个。读小学时，结识了红安县流寓麻城的李宏善。李的家境贫困，经常得到王家的资助。以后他们一同赴武汉进了楚材中学。一九三二年，又一同考上了湖北高级商科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时有进步学潮，而每次闹学潮的领头人中都有王开玉，每每被打伤的，也少不了王开玉，直到最后被学校开除。他的同学李宏善，较为老练，虽也参与了学潮，但始终未被发觉。李每次到医院看望王开玉时，总要告诉他一些对敌斗争的策略；当王开玉被商科学校开除之后，又是李宏善帮助他考进了湖北会计专科学校。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李二人积极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秘密地参加了武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这年冬，王开玉遵父命回家完婚，婚后三天，又毅然离开了家庭。此时，恰值阎锡山国民党第二战区十八集团军办起了民族革命大学，校址在山西的临汾。为了避免家庭对他的纠缠，王、李二人离开武汉。过黄河、经绥远到宜川，投入了“民大”。在民大学习期间，中共党组织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在民大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王开玉和李宏善。

正当王开玉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他家知道了他的行踪，几次书信促归，并骂他是“逆子”，是“祸根”！并说“如不速归，将不认其为王门子弟、永远不给予经济供给……”

王开玉面对着家人的威胁和嗟怨，丝毫没有动摇他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在给父母的复信中说：“……大人前天来信责骂儿，痛恨儿，儿没有法子可以解决这愈来愈恶化的家庭悲剧。是的，儿现在是个为人群所共愤，天地所不容的大罪人；可是儿是有良心的青年，是有血性的青年，而且是很要面孔的青年；儿日后总不致使大人拿脸不出去见亲友……”

“在这种年头，什么毕业？毕业即失业；什么文凭？文凭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什么金钱？金钱是造罪的一种工具。即使有人说金钱是万能，而万能也不过是万恶的过渡罢了。……”

“在这国难时期、在死里求生的神圣战争已经展开了，前线正需要人牺牲，俗话说得有，‘尽忠不能尽孝’，儿已是不孝之子，失掉了孝的义务，应该效班超投笔从戎，为国尽忠。如果我这个志愿能够成功，就不负在这世界上走了一场！……”

（摘自其爱人林声所保存遗稿）

一九三八年，他在民族大学毕业，参加了薄一波在二战区管辖下的决死队，他任决死队二纵队的政治教官，薄一波任政

治委员、地点仍在宜川。

一九三九年王开玉又担任黄河出版社的编辑，石峰为主任，刘岱峰为政治部主任。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份，军阀阎锡山的反动面目暴露。公开反共。然而决死队已经控制了全体队员，新军与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旧军反共，新军抗日，抢口不能一致对外，结果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晋绥事变”。

一九四〇年，王开玉进了陕北工学院，林声在延安女子大学，通过李宏善的介绍他与林声在革命圣地——延安，美满地结合了。

一九四三年，王开玉结束了学习生活，被分配在晋绥分局任财务科长，后又调雁门行署任粮食科长；林声先是在警卫师工作，接着在中原大学图书馆工作，最后又在华中局统战部工作。他们肩负着双重任务，既要抵抗日寇的侵略，又要提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还要保证对大部队的粮食供应。从绥远到山东的阳谷又经河南的商邱到开封，就在这工作转辗变换期间，他们生下了唯一的孩 子——江林。但也就在这颠沛流离中，王开玉染上了疾病。

一九四七年，王开玉奉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分配，随军南下，并正式任命他为解放军某部团长。孰料大军行至河南新县的白店（原名陈店）区，王开玉的胃病复发，加上痔疮也折磨着他，使他不能随军，组织决定留他在白店开展地方工作。他与十几年一直没有离开大别山的新县县委书记刘铭榜密切配合，先后在箭厂河区、白居区任工作组长。他的身份有时公开，有时秘密，有时与敌人进行正面斗争，有时又需要群众多方掩护。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月间，新县国民党保安队下乡了。组织上要王开玉暂时躲起来，他说：“我躲起来，怎么对得起群众……”这时恰是他胃病与痔疮发作期间，迫使他躲在山窑

里，可是，李姓乡长的父亲（贫协会员，后变为叛徒）知道王开玉的动向。这天，他的舅侄儿朱寿祺（保安团的班长）有意识地到舅舅家探听共产党人的去向，李姓的叛徒告诉了王开玉的踪迹。朱寿祺得讯后马上报告了国民党团长胡子石，胡当即分兵两路：一由朱带领，一由李姓叛徒引路，包围了整个山林，王开玉不幸被捕了。

胡子石用大麻绳将王开玉捆起来，吊在大白果树上，要他供出当地党组织的名单，他横眉怒目，不向敌人吐露半字，胡子石又命令用鞭子抽打，用土砖压他，门牙被打掉，衣服被打烂。他仍然是坚贞不屈！敌人拖着他鲜血淋漓的躯体，要带他到县城。他疾病加摧凌，哪里走得动！朱寿祺推搡着在他身后打了一枪，英勇就义了！鲜血染红了东门咀（柴山堡附近）。

就在血雨腥风笼罩东门咀的当天夜里，有四位农民掩埋了这位刚毅的烈士，还用石头围起了标志。东门咀的人民，忘不了这位革命烈士。

全国解放后，杀害烈士的凶手已镇压，隐藏多年的告密的李姓叛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被揭发出来，新县人民为了对烈士的怀念，两次给王开玉的遗骨用优质棺材重新埋葬，一九七一年烈士的遗骨已由林声率子江林，迁至武昌九峰山烈士公墓。

奇 袭 余 家 冲

余辉成 口述 沈作夫整理

一九三五年秋冬时节，我红二十八军高敬亭部，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

是年正月，麻城张家畈区白石山的余家冲，有一清末道台、大豪绅余子敦（亦名雅安）暴病身亡。其独子余硕存，择定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即公历十一月一日）为父开吊，这样，一来可以显扬家世；二来能够捞批礼物。于是讣告东八遼知名士绅和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届时前往公祭。

这一情报为我地下党获悉，通过交通员迅速送到了二十八军军部，军首长经过研究，决定由特务营营长林维先（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率部与手枪团配合，袭击余家冲，狠狠打击东八遼的地方反动势力。

开吊之日将至，余硕存心想：共军目前势单力薄，处境相当困难。常年出没于深山野洼，量他不敢贸然下山。因此，放心大胆地筹措开吊事宜。他请来了清末进士、豪绅李作哲（罗田人）为代奠官；聘国民党军警郑月阶（郑齐玉之子）作防卫；写成六千余字的奠章，尽情地对余子敦“歌功颂德”。并备下一百五十余桌酒筵，招待戚友宾朋。是亲非亲，只认礼物不认人。

这时，林维先作出了周密部署，命一部分人扮成吊孝宾客；另一部分人化妆成货郎、行乞叫化等流派人物，相继混入余府，作内应埋伏，摸清情况，进行联络。

正式开祭的头天，四乡豪绅骑马坐轿，由长工抬着祭礼，前呼后拥地陆续来到余家冲。除本地客人外，还有来自武汉、黄陂、罗田、三里畈、麻城、宋埠的士绅。他们在余家大院轿马一落，就有主人的管家、仆人趋前打躬作揖，迎进客厅。其威风架势，旁观者不得不退避三舍。余府人来人往，邻近的四个小垸，也垸垸客满。日进餐者计千人之众。接收的冥香、纸烛，堆积成山。

当日夜晚，余家的承服礼开始。余硕存一心为亡父设祭，满以为日间作了周密的“安全”准备，请有地方民团二十余人枪作防卫，还派人到周围侦探、放哨，可以高枕无忧，放心大胆地热闹一番。孝堂上密密层层地悬挂着巨幅白绫挽联，上面金字祭轴光芒夺目；三道桌案上陈列着用金银珠宝制成的各样供品，奇形异状，琳琅满目；司仪礼信余佑芝高声赞礼，楼头鼓乐齐鸣。身着蓝衫的礼宾，撩衣甩袖地奉礼；经余辉成誊正的长达六千余字的奠章，读者摇头晃脑、咬文嚼字地念了很长时间。众豪绅久坐疲倦，饮人参、燕窝汤以提神；孝堂下面的人众蹲一层、坐一层、站一层，人挤人地观看。

余家派出的侦探和暗哨都被我军俘获；守卫孝堂的二十多个民团心安理得地挤到一起饮酒作乐，有的东倒西歪，醉烂如泥；有的怀抱枪枝，在火池边打盹。深夜十一时左右，林维先所率领的便衣队，乘着蒙蒙细雨的黑夜，绕道黄市乡，翻过燕子崖，向余家冲急进。在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接通联系，得知孝堂内情后，林维先即刻下达指示：迅速封锁通往余家冲的各个要道，封门、占山，把敌人紧紧包围起来，来个里应外合，瓮中捉鳖。

在孝堂里，代奠信仍在绘声绘色地宣读奠章，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突然，我军便衣队的一位同志手持盒子枪，跳上供桌高

喊：“共产党员来了，是穷老子不要怕！”刹时间，混在吊孝人群中那些“宾客”、“货郎”，行乞叫化的外来客人，在大厅内，拔出手枪，紧紧逼住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豪绅。这时，孝堂乱作一团，有的瘫倒在太师椅上；有的往神龛桌子底下钻；余硕存因熟悉地形，连忙撕掉孝服，脸抹锅灰，偕同妻子从暗道里逃遁；反动军警郑月阶翻墙跌伤大腿，伏于污窖免遭俘获，余者皆一网打尽。此次战斗，一弹未发，我便衣队持刀当场处决豪绅恶霸三十六人（有四人是从外地带入的），其中包括大地主恶霸余永继、余玉阶、余佩芬、余象彬，反动房长、族长余幼彬、余介明，国民党反动军官夏波澄、夏锐卿、夏茂云，反动豪绅李作哲、余淑雨、汪舆薪、余保华、余品国、田家新、肖俊希等罪大恶极的十九人。我军在撤离时，将开明士绅夏锡魁拉到大院里，严正地对他说：“念你平时无多大罪恶，决定留下你，今后如胡作非为，定惩不饶。”说完后，迅速东撤，夏吓得瘫倒地上，不省人事。

我军奇袭余家冲的胜利，既打击了统治麻东一带的封建势力，又威镇了蠢蠢欲动的地霸反动武装，为劳苦大众报仇雪恨，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左”倾路线造成的悲剧

——简记可行桥惨案

李成彬

陈 邑

可行桥位于顺河集区中部，在垸店这个小街的北端。在这座桥的附近，有个叫白骨墩的地方。墩内累累白骨，堆积如山。先前，为了缅怀死者，当地群众自动在这里砌了一座小塔。到了一九七八年，县民政部门拨款重修了一座高大雄伟、庄严肃穆的金字形塔，并定名为白骨塔。而今，凡是到此瞻仰的，无不潸然泪下。对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油然而敬，对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痛恨、唾骂……。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蒋介石的愤恨，党内的左倾情绪，续有滋长。为了防止敌人混入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同时为了惩办恶霸、豪绅、叛徒、特务，于一九二九年成立了麻城县保卫局。到了一九三一年，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以后，就将混入革命队伍的真改组派陈文福，提升为麻城县保卫局局长。陈文福上台以后，以清除党、政、军内的“AB团”，“改组派”和第三党为名，大搞肃反扩大化，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很多真正的革命者含不白之冤而谢世。由于保卫局设在可行桥附近，所以可行桥就成了许多革命者受害的地方。

保卫局整人的手段是毒辣和残忍的。每捉到一个“犯人”，不调查、不分析，不讲平日的表现，大搞“逼、供、信”。没

有干反党的事，人们当然不予承认。但他们采取烟熏、火烤、灌开水、坐老虎凳、穿鼻子、滚铁藜等等，然后以“死硬分子”而诛之。与这些革命者有交往的人也视为同党，同样被迫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头头和同党，则在“坦白从宽”的掩盖下，予以释放。当时可行桥周围，尸横遍野，白骨如山，家犬食人而变成狼狗，群众望而生畏，叹息道：“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

由于肃反扩大化，在可行桥遭杀害的人，数以千计。一年时间内，仅顺河集区有据可查的，计县、团级三十二人，区、营级八十四人，乡、连级一百六十九人，村、排级六十八人，班长、排长、游击队长、战士、队员以及革命群众八百二十二，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五人；县独立团团团长王宏学以及桂柱中等军事领导人，均遭杀害。设在傅家垸的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五十余人，杀得只剩下炊事员和通讯员二人。某垸，晚上夫妻俩在床上捉臭虫，男的捉着一个臭虫说：“这个坏东西。白天躲藏，晚上出来咬人”。女的说：“办死它嘛！”恰巧保卫局的便衣由此经过，隔窗听着，以为是咒骂他们的。于是，连夜把这对夫妻押送保卫局，严加拷打，直至处死。据群众口述，在可行桥被杀害的革命者前后约六千余人。

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使革命遭到极大的损失，原有的领导干部被害，后起的干部畏首畏尾，革命群众几乎成了一盘散沙，致使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均遭失利，导致光裕山和万子山的流血惨案，共烧死、杀死六万余众，青年妇女被国民党卖掉二百多人。苏区一度变成“道路长青草、尸骨遍山岗”的无人区。大革命前，乘、顺两区约十八万余人，遭受两次“围剿”后，只剩下五万余人。张国焘路线恶贯满盈，罄竹难书。

一九三二年九月，鄂东北道委和省保卫局处决了麻城县保卫局局长、反革命分子陈文福和审讯科长刘文高，为革命者报了仇，雪了恨。

湖北省第一座水库

——大坳水库

大坳水库位于麻城市的东南面，麻溪河上游，离县城约四十华里。地处白泉山与大坳山之间，于一九五三年元月准备，三月十三日正式动工，七月七日完成第一期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基本配套竣工。工程总投资为一百七十五万元，完成土石方共计四十六万九千三百余立方米，总库容为二千六百四十万立方米，有效库容为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为二万八千四百余亩。

大坳水库工程指挥部由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任名誉指挥长，许金彪任指挥长、吴德简任政委、向玉成、李继尧等任付指挥长、梁启杰任政治部主任，指挥部下设八个科。

第一、二期工程由湖北省水利厅第四工程队勘测设计的。具体设计者彭拯、审核者杨鸿勋。作大坝稳定计算的是陈炎炉、施工技术负责人杨鸿勋。

大坳水库是在李先念同志亲自倡导和指挥下，我省首建的第一座灌溉、防洪、发电、养鱼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也是麻城有史以来的第一座水库。

大坳水库大坝面长158米，底长30米，面宽10米，底宽233米，高30米，一九七八年整修后，坝加高1.7米，面宽5.7米。

溢洪道全长180米，最深处9米，宽20米，每秒钟可泄洪水360立方米。

列管为马蹄形，空径为1.6米，过水断面2平方米，全长235米，卧管为箱形，长62米，宽4.7米，内分四管，每管有放水孔十三个。每孔长6分米，宽7.5分米，每秒过水1.5立方米，四个孔每秒可放六个流量；水箱为列管与卧管接头的建筑物，接水墙高一点七米，宽五分米。由于笛子列开启和关闭不方便，一九七六年在水箱顶上开孔安装了两台斜拉圆箱活闸门，用二台10吨斜拉螺杆启闭机启闭。一九八三年“三查三定”时，认为输水管质量是高的，也比较安全。

渠道工程的作用是抬高水位，引水入渠道，分滚水坝，进水闸、冲刷闸、拦土墙、土坝、防水堤六个部分。

渠道底宽3米，面宽10米，深1.8米，每秒可通过六个流量，第一期工程竣工时，已开挖1408米长。第一期工程填土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九方，挖土二万八千余方，开山石一万九千一百一十六方，砌石一万零二百二十八方，混凝土二千四百零一方。

在渠道的总干渠后面，有高、低南三条干渠。总干渠从大坳水库至大坳三级电站前池，库水通过三级电站发电后，尾水一部分流入高渠，一部分跌入五级电站，五级电站发电后，尾水流入麻溪河。

麻溪河内建有低干渠，渠道工程——二道坝。二道坝为硷栏河滚水坝，坝高一米，它既可以拦截电站尾水进入低干渠，又可利用滚水以上10.8平方公里承雨面积的洪水在灌溉季节灌塘灌堰。南干渠则从总干渠大坳电站前池内取水入渠。

大坳水库承雨面积大，雨量较丰富，每平方公里承雨面积仅负担灌溉面积416亩，较为干旱的年景，水库入水量有1680

万方,满足1.8万亩灌溉面积是十分充足的。如若将龟山千口堰之水引入库内,再将渠道开至雨淋河过举水后,可发展到原设计的受益面积八万一千八百三十亩。

水库汇流最高点在铺头坳的姜家山,由东向西,经铺头坳水库首尾流入,全长13.5公里,大坳水库流域形状属山丘长形,库首狭窄,腹部较宽,为天然谷防工事地点,可调节水旱灾情,根除了麻溪河4500亩田地的水患。

电站建在大坳水库外的麻溪河境内,是我省最早建成的农村电站之一,一九五八年正式投产发电。

一九六〇年水轮发电机扩建为 4×480 瓩,一九六七年与系统电并网。

电站为引水式电站,引水渠长1.92公里,设计水头101米,压水管为木质管,长173.5米,直径0.8米,一九六七年将下部分三分之二更换为钢管。一九八〇年十月动工扩建500瓩发电机组一台,一九八一年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279万度。

大坳水库山势较平缓,水面比较宽阔,温湿同期,植被较好,水质较肥,是一座中营养型水库。宜鱼面积1500亩,已利用渔业面积1500亩,成鱼年收入2.3万元。由于来水面积大,库内蓄水除保证灌溉面积外,常年还负担发电用水任务,因此,养殖水面不够稳定,加之水产设施配套不全,鱼池数量不足,捕捞工具落后,目前成鱼产量不高。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罗祥云在大坳水库潜伏多日,周览地形,认为此地可建水利工程。解放后,一再向政府书面建议。一九五二年麻城县政府根据罗祥云的建议,并请他作向导,前往实地勘探,一致认定是良好的谷防工事地点。

一九五二年八月,张体学省长来麻城检查工作,县委汇报了勘测情况,并写出了书面报告,当时张省长就亲自批准。

省水利厅的负责同志亲临视察，武汉大学给以理论与实验的帮助，中南水利规划处王处长亲自作建设计划，省水利局第四工程队来实地勘测设计。

当时正值麻城大旱，但是，只用了117天的时间就胜利完成第一期工程。可见当时领导作风之硬，群众力量之强！

在施工过程中，李先念主席，张体学省长、专署付专员田裕如亲自到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李先念、张体学接见了工地劳模并与之座谈，和劳模们一起，在指挥部门前合影留念。

参加兴修大坳水库工程，除了麻城十一个区，四百七十个乡，二万三千多劳动力上马外，还有河南、安徽等地石工远自数百里路外也积极参加这一工程建设。

为了纪念工程胜利竣工，在大坳水库闸门上树立了“麻城县大坳水库工程纪念碑”，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为纪念碑题了词：“从水库的成功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可以想象到美满的将来，大家继续努力吧，争取早日实现机器、电气下田。”

资料来源：大坳水库管理处
大坳电站
麻城市档案馆

龟山区志办 何钧 **整理**

余诚生平简介

麻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余诚，名叔璜，字简斋，号仲勉。湖北省麻城市张家畈区木樨河余家冲人（后定居木子店区李峰山乡杉林河）。生于清光绪九年癸未腊月初五，即一八八四年一月二日。父名雅诗，清太学生。因痛恶官场倾轧，遂弃功名经商，在河南商城开贸易货栈。余幼随父至商城读私塾，性聪颖，过目即能成诵。余师浩桑先生与诚父交往甚密，每谈到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时，义愤填膺，余深受其影响。一八九五年，诚年十二，随伯父子敦回乡读书。一九〇二年会县试，名列前茅。次年府考，中付贡，同年至武汉。余少时深慕明末黄黎洲、王船山之为人，慨然思其志。戊戌秋，其宗兄浩吾自北京归，尽言戊戌变法始末，余闻之狂叫大骂，恨不能即日集合同志起事，其时心甚抑郁。甲辰秋，变卖家产东渡日本求学。

乙巳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余立填愿书加入。孙中山一见即引为心腹，合影留念，并要余主持湖北同盟会。后推举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以湖北盟务亟待开展，于乙巳冬回到武汉，即以“日知会”作同盟会活动场所，与刘静庵亲密合作，举办东留预备学校。他在讲课中痛陈时事，至于涕泣，受教育者无不深受感动。余认为道德腐败是亡国之源，并说：“吾人之救国，须先打破生死关。生命既能牺牲，则声色货利，自不足当吾一顾。”在《丙午日记》中还写道：“不将名誉圈打破，终不能养成高尚之人格，遑论爱国救国乎！”“大丈夫宁犯天下

之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深刻表明了余诚的反清态度。并说：“男儿当自立。终日随人脚跟转是何人格！”痛斥阿谀奉迎人是：“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不自欺是豪杰。”乙巳末，回木樨河度岁。与其伯父祖言创办麻城县高等小学堂两所（县城、石磴坳各一所），倡导改良主义教育，动员男人剪辮，妇女放足。到阎家河、黄土岗、白果等地为上海中国公学筹款，见民众疾苦，深为叹息。族人见其面目憔悴。劝稍自顾惜，他说：“救焚拯溺，何可缓也！”言毕泪下，大口咯血。在日记中还写道：“今日以后无今日，所谓英雄者非快乐人而劳苦人也。”

丙午春，携妻肖开芝赴省。同年秋，萍、醴事起，余密谋刘静庵和归国同志响应。由于奸人告密，刘静庵等九人入狱。余拟召集死士，炸清官署，救同事出狱。由于搜捕甚急，出走上海，住中国公学，被推为中国公学干事。代《神州日报》撰发刊词，为《民报》撰文，反击康、梁，痛斥保皇势力。清江浙总督端方据报，说余为革命党湖北分统，能制多种炸药，悬赏五千元购捕。余在沪无法存身，复东渡日本，务本崇实。其时留学生不务实际者多，余独砥砺学行，以革命为依归，改名诚，字季穆。仍被同志举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

戊申秋回国，居武汉。在原有基础上积极发展业务。至己酉秋，病体难于支持，由李四光、陈子静二人护送上海就医。医言，已非药石所能奏效，只有身居乡间静养，或能冀其痊可。复由余之伯父接回武汉，余在日记中写道：“天扼我何如斯甚耶？我当坚忍胜之，以定力与之斗也。”终因病情渐深，遵医回乡间静养，为了避开奸人耳目，在同人协助下，将余藏入棺木内，底开一孔通气，由其堂兄敬堂迎归故里。其时父母已歿，住少时读书处。余在病中仍能读书自若。后因病入膏肓，

医治无效，于庚午腊月二十六日（即一九一〇年初），咯血不止逝世，时年二十六岁。墓葬余家冲东南面。民国成立，补葬郭家冲青龙嘴余家公墓。一九一二年经黎元洪允准，在歧亭杏花村守贡祠侧，建立余诚、屈子厚、周干臣光黄三烈士祠。一九八二年，县政协、县委统战部为余墓立碑。余病故后三年妻卒，一女九岁夭折，以其兄之子佩舜为嗣。

注：余诚资料成文，是由余之《丙午日记》，贺觉非著《余诚》，余诚故里八旬老人见闻，省辛亥革命博物馆、县志办协助而成。余逝世七十余年，资料较难收集。从《丙午日记》中见到，余与黄兴、宋教仁、于佑任等均有往来，其详情，还有待进一步调查、补充、完善，去误存真。

李贽在钓鱼台讲学

李贽（1527 — 1602），号卓吾，字宏甫。原名李载贽，别号温陵居士，又称百泉居士。上代姓林，因得罪权贵，逃至泉州晋江（今属福建）落籍，改姓李。明代思想家、文学家。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入仕。历任河南辉县教谕，北京、南京国子监博士。后任云南姚安知府，与同僚不睦，弃官。因应黄安（今红安）耿定力兄弟之召，于一五八一年来钓鱼台，时年已五十四岁。他结识的好友梅克生（进士）、周柳塘、僧无念皆与之游，“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李贽的事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僧无念遂在钓鱼台龙潭湖上修筑芝佛书院，为李贽开坛讲学。

李贽讲学“从之者几千、万人（沈瓚《近事丛残》），可谓盛矣！前来求学的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不仅有当地的，

还有山东、河北的。如山西的刘东星了解到李贽是个有学识的人后，便即使其子刘相不远千里来钓鱼台求学。河北的王本钧来芝佛书院相从九年。梅克生（官至右都御史）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龙潭受业。

李贽讲学能显示出他的独特见解。如在讲到秦始皇时，他把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认定是推动社会的前进。他赞同张居正的改革主张，称之为“宰相之杰”。

李贽讲学，反对生硬摹拟，倡导结合实际，主张“从绝假纯真”的“童心”出发。反对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章，赞扬农民是“匹夫无假”的品德，对虚伪、无耻和丑恶行为进行揭露。

李贽在讲学中，批判唯心论的“理能生气”的学说，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并且高度评价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是“匹夫首倡”，即农民中第一个起义领袖。

李贽思想进步，在讲学中反对封建伦理的推崇，他把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寡妇卓文君自行改嫁（“私奔”）视为勇敢行为。

芝佛书院的学习和生活内容丰富，充满朝气。李贽不知疲倦地向弟子讲课，“镇日言笑”，“无有怀而不吐”，他讲课通俗易懂，不仅使学生听得愁容大废，而且刻骨铭心。当时官吏以他为“异端之尤”，火焚其室，拆除书院，两次逐他出麻城，进而被给事中张向达弹劾为“乱道”、“惑世”，被捕入狱，直至公元一六〇二年在狱中被逼割喉而死。

李贽在钓鱼台十多年的讲学生涯，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他的讲学精神一直被人们传颂，他的藏书洞至今依然完好。

阎河区志办供稿

农民起义领袖鲍世荣

鲍世荣，号洪功。麻城市龟山区鲍家大屋人，亦有盐田河区鲍家楼之说。少时聪颖，过目成诵。成年后，受族人聘请至黄市鲍家院的观音堂执教。

明朝末年，灾荒四起，官府催租逼税，致使民不聊生。在李自成义军的影响下，鲍世荣投笔从戎。他与周铁爪、万野于、僧顿彻（亦称陈顿彻法号蹬足和尚）一起，组织龟山、盐田河、张家畈一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义军在什子寨东的龙潭冲建炼矛厂，打刀枪，制武器；在附近的深山僻野操练兵马。其军纪严明，军士强壮。且有名师指点，一个个练就了过硬的武功。他们杀贪官、抗官税，打击豪绅，拯济贫民。闹得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惶惶不安，四处奔命。义军的举动，深得平民百姓的拥护。革命势力日益壮大，不到一年时间，鲍世荣的起义队伍就发展到万余人。

明朝官府，为了镇压农民革命，派出大批官兵，对起义军进行围剿。鲍世荣领导义军，在龟峰山、盐田河一带与官兵周旋，乘机痛击，打了不少胜仗。但因义军占领的地盘窄小，粮草有限，故不能长期坚持。于一六四三年撤至陕西，投奔李自成，正式受编为闯王的部队。

鲍世荣投奔闯王后，参与了西京（今西安）的练兵活动，为一六四四年李闯王攻占北京，推翻明朝统治，助了一臂之力。

李闯王推翻明朝后，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太平麻痹思想。他既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肃清明朝的残余势力，也没有

注意防备清军的进攻。不久，驻守在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与清兵勾结，攻打北京。闯王失利，退入陕西，鲍世荣亦随闯王撤至陕西，后又转移到湖北。一六四五年，李闯王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与地主武装战斗中壮烈牺牲后，鲍世荣带着所部，撤回麻城，继续与清兵和地主武装进行战斗。

康熙十三年（甲寅），清廷巡抚张朝珍派遣黄州太守于成龙、把总罗登云率大批反动武装前往麻城追剿义军；协镇王宗臣坐镇蕲水（现浠水），遣千总李长武、把总吴国礼领兵驰援；四邻各县的地方武装及官绅打手倾巢而出，与鲍世荣所领导的义军激战于麻北的黄土岗。义军作战英勇，当场用火枪击毙黄州把总吴国礼。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义军伤亡惨重。鲍世荣率余部退回张家畈黄市暂避，因清兵追捕，又逃至盐田河的磨子河。鲍世荣在与地主武装的战斗中被俘，经受了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在磨子河英勇就义。

鲍世荣就义后，清朝政府与地主武装紧密勾结，为报“君父之仇”，视鲍为“皇犯”，株连九族，上至鲍姓耄耋老翁，下至哇哇着地的婴儿，共计六十八人，惨遭杀害。黄州府太守于成龙镇压了义军后，凿石碑于黄市新桥桥头，碑文曰：“东山已平，龙潭已清；既耕且织，万世永宁”。（康熙甲寅年），此碑文至今尚存。

鲍世荣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三百多年来，他的革命史实，为后人广为传颂。

资料来源：

- 1、《麻城县志·前编·学校·武备》
- 2、《鲍氏宗谱·世荣公传》
- 3、鲍姓七旬老人口碑。

缪镜洁、何钧、屈介蕃收集整理

彭 韬 及 其 遗 作

彭铎吾收集整理

彭韬，字丹廷，生卒年月待考。麻城市浮桥河镇老爷龕人。老爷龕原叫王家山，因彭人才出众，忌恶扬善，深得民众拥戴。人们常常恭称彭为老爷，久而久之，王家山遂更名为老爷龕了。

彭韬少时，家境贫寒，勤奋好学。清雍正年间，经殿试第二甲录取，获赐进士。顿时，名扬乡里，乡民们为了庆贺彭老爷荣升，经族人计议，决定以浮桥河的尖山潭、泼水坞等鱼塘相赠。彭韬得知后，坚辞不受。忙向族人解释：“吾岂肯贪图私利，置沿河渔夫于不顾而使其失业乎？……”

彭韬虽中进士，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毕生未曾出任官职，惟守田园山水之乐。暮年，家道仍旧贫困。但他不畏权势，爱抚乡民，堪称德高望重。近村有一名叫胡漆的大户，有钱有势。虽读诗书，但品行不端，迷于女色，纵是同族村姑亦不能幸免。时人敢怒而不敢言。彭韬闻听此情，斥胡有伤风化。继而一纸书信，规劝胡漆改邪归正。其中写道：“即令嫦娥再世，总为豆下之箕；纵是胶漆深情，究系瓜中之葛……。”胡漆接信后，幡然悔悟，决心痛改前非。在与彭韬的回信中称是“棒击当头，汗流浹背”。并表示：“抽出七星宝剑，斩断情缘；举起八宝钢刀，劈开魔障。”“前虽失足，今一脚跳出陷入坑。”还深有感慨地说：“冷眼看人最毒，热肠待我情真”。以此来表达彭韬对其真诚教诲的情意。

彭韜虽被放有文林郎（七品官）的官职，但未到职。长期苦守田园，自号“壺山居士”。他学识渊博，熟知时弊。常以自己的才干和所精通的文墨，直谏上书，体现民意。他所写的《广额文》和《代友求救荒文》，就反映了作者对有关政治问题的见解，和他敢于触及官场弊端，始终将自己置身于民众之中的品德。现将其遗作抄录于后，以饗读者。

一、广 额 文

为恳请遵旨“以宏作养以昭文治”事。

从来才堪国华，士风播为休风；儒可宾王文，运通乎景运。然市千里之骐骥，须广筑金台；求七尺之珊瑚，必宏张铁网。此名儒所以日出，而多士所以同升也。

麻邑水秀山明，地灵人杰。天生半壁，波环朝圣门前；谚兆元魁，浪打蔡家园内。暮烟横北郭，龙池生澈夜奎光；朝旭映东山，鹿角竖插天文笔，皋岭飞泉如裂帛，惊翻倒峡之词；古亭松老欲成龙，吹醒生花之梦。杏花村，远近依稀，阆苑香风；桃叶渡，参差恍忽，武陵春色。连绵凤岭，羽仪开文治之祥；埭岬龟峰，河洛启图书之瑞。虞公城下，学士之灵爽犹存，阎氏河湾，都督之风流未泯。毛右军之事业，争传万古高风；苏太守之文章，尚剩千秋余泽。是以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百余人；即如景泰三科，登贤书者二十七子。两家宫保，一门之盛事堪传；四历尚书，二氏之芳踪有据。溯高名于翰苑，足下冉冉青山，追灵绩于戎行，袖里篇篇黄卷。伟矣，名垂竹帛；猗欤，功满旗裳。至若兴朝，愈多髦士。或是父是子，同探上苑之花；或难弟难兄，共报春宫之捷。或雄都坐镇，任寄股肱；或花县分封，功高保障。班班可考，在在非虚，此宗师所目见耳闻，非某等所能笔书言罄者也。无如人才日盛，应试

者已近三千；而额数难逾，入彀者依然十五。黄州路上，摩拳擦掌而来；赤壁矶边，垂头丧气而返。譬若求珠沧海，尚多委在泥沙；犹如采玉蓝田，岂尽登居廊庙。至使松窗不寐，感极目之青阳；因令草径无媒，笑盈头之白发。箕裘惭世业，心伤巷口乌衣；樵木易生涯，肠断南山白石。徒羡弹冠贡禹，孰怜下第刘蕡。今奉特恩，昭兹旷典。以州县大小之别，为额数多寡之分。日暖芹宫，不叹无门问渡；风清泮水，窃欣有路登天。总角书生，执策好随金马；投纶老叟，收竿再钓游鱼。驹不秣而自前，追风掣电；翮无风而自振，薄汉摩云，幸逢钦命，学宪大人，山斗文章，珪璋品望。澄清江汉，作人于菁莪棫朴之先；洗濯潇湘，得士于牝牡骊黄而外。堂内冰心映玉，堂前宝镜悬秋。复逢师台，吾道主盟，斯文宗匠。春风偏拂，狂简皆吾党之才，时雨频苏，桃李尽公门之选。三场麀棘苑，个中之辛苦岂遽忘心！一世老孙山，此辈之淹留能无动念？为此连名上请，合志具呈，伏乞准赐通详，永垂定额。例遵二十，坐看香满芹宫；数益五名，旋睹群空冀野。实荐贤而为国，岂得士以谋私？则玉笋繁华，会见云呈五色，珠宫广大，欣看奎满三陞矣。

二、代友求救荒文

为奇穷复遇奇荒，冒死求以缓死事。

某粗读诗书，略通笔墨。箕裘绵世泽，尚余王氏青毡；淡泊守家风，惟剩桑君铁砚。痛严君之早逝，留下四壁萧条；赖慈母以相依，博得一身狼狈。田园都典尽，已成燕入他家；奴婢俱逃亡，恍若龙归大海。人到四旬还有几？依然无室无家；母今六十实难堪，况复多愁多病。一领残衫何足意？天昏日

暮，后掩前遮，三间破屋实多情，雨打霜侵，东歪西倒。瓦能筛夜月，凄凄照彻愁肠；壁不堵秋风，飒飒吹残病骨。晨烟常欲绝、鼠因粮尽伤心；夜户不须关，犬为家贫放胆。母傍车儿傍母，雪深三尺忘寒；兄依断简弟依兄，日上三竿未爨。见人羞面目，冯驩之长铗空弹；对客拙言词，张仪之舌尖亦敝。高车逢道左，任流口角之涎；大嚼过屠门，难染鼎中之指。今日不知明日事，穷措大何日伸眉；新年仍是旧年人，老精酸几时得志。断齑画粥，久知君子安贫；受冻忍饥，独苦小人有母。莫道门前托钵，便成浪子搔头；须知市上吹箫，还是英雄退步。恭逢父师，八畎神君，万家生佛。四知夙凜，清白本自关西；三异争传，恺惻遍施花县。入望无非赤子，劝捐募赈，本属父母心肠；关赈最是吾徒，推食解衣，好看孔颜情面。为此含羞具稟，冒死陈情。伏乞父师，仁慈持沛，赈济宏施。虽两袖风清，昔日澄同秋水；而芦中人老，此时哀等穷猿。倘升斗惠邀，留得五湖明月；俾膏油不竭，展开万里长风。更祈早汲西江，以苏涸鲋；若使迟归鲍肆，定索枯鱼矣。

严重其人

严政、徐怨宇、严善明口述，甘茂森整理

严重字立三，别号劬园。麻城镇南门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江西南昌。严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叫严宜唤，号采臣，在江西南昌任通判，后调到安徽任文牍、尹州知府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弃官回到麻城老家居住。

严重七岁开始上学，读五经四书。九岁随父到安徽，在陆军小学就读。十三岁毕业后，考入了北平清河预备班（相当于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这时，与同学邓演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考试与邓一样，获得了优异成绩，并得到了学校发给的金表、地图等奖品，严、邓两人约好到广东，同在邓铿部下任职，严担任第三团中校团副兼第一营营长。黄埔军校创立，严随邓又调到该校任职，严任总队长。供职期间，他半夜查铺，还要为学生关窗、盖被，故此，人称“严婆婆”，深受学生的好评。黄埔军校三期结业后，他离开了广东。因严原在军校工作出色，指导有方，所以廖仲凯先生又亲笔写信，通过严的胞弟严政送给严重，继续聘请他为第四期训练部部长。在这期间，严重已是崭露头角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严重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该师以国民党左派军人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政治素质较好。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广州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发布《北伐宣言》。二十一师受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严重率师向闽赣边境挺进，在

福建永定地区击溃“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所属的张贡部。同年冬初，严重率部配合其他部队，挺进浙江。桐庐一仗，消灭了孙传芳劲旅孟昭月部的一万余人，奠定了北伐军东路军胜利的基调。一九二七年二月光复杭州，北伐军控制浙江全省。前后仅以半年的时间，严重率领二十一师转战于赣、闽、浙三省，屡战屡捷。白崇禧曾赞誉严重所统率的二十一师，是北伐军能以少胜多的模范师。此后，严重率部从浙江入江苏，配合北伐军的东征部队总攻南京，三月二十四日攻克南京，严重率部进驻镇江。

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因严重在政治上是追随邓演达的，所以蒋便指使该师三团团长、后升任副师长的陈诚，对严秘密监视。“四·一二”政变后，严看清了蒋的本质和意图，借故有病，拒绝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务厅厅长的新任命，并推荐陈诚接替师长的职务。卸任时，严叫军需处长赵志尧交出全师积蓄的银洋十万余元。

严重辞职后，乘车去杭州，到天竺寺，脱去军服，穿上僧衣。原战友或部下、学生，闻讯前往慰问，他谢绝不见。一次，蒋介石从前门进，他知道后，从后门溜走了。避而不见。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一度下野，严重在各方面的推崇下，出任南京政府军务厅长。不久，又辞职。一九二八年，桂系势力控制湖北，张知本任湖北省主席，聘请严重任民政厅长，历时不到半年，军政之间，不断发生矛盾。严重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的方案；关于实行“二·五”减租的方案，都遭到了阻力，无法实现。严重十分不满，愤而辞职，并声明从此入山不问政治。在蒋桂内战发生以前，严重已定居庐山，开始了他九年的退隐生活。

严重住在庐山太乙村，这是邓演达原来住过的地方。严自

已砍柴，自己运水，坚持自食其力，劳动之外便看书，很多朋友和学生，知道他向来廉洁自持，毫无积蓄。便送钱给他，可他都谢绝了。有些黄埔生去看他，他劝告不要再来，免招麻烦。但是，上山去看的学生还是不少。

“九·一八”事变，对严重是个极大的刺激。接着，邓演达被蒋杀害。严获悉后，无比悲愤，两天吃不下饭。随后，还亲赴南京，为邓料理后事，立嗣、营葬。

天津《大公报》对严重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报道，称之为“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看后，大为震怒，想派人把严赶出庐山。陈诚向蒋建议，说严的名声大，在黄埔生中有威信，给严难堪影响不好。不如用共赴国难的名义，请他到南京担任一个空头职衔。这样蒋才改变主意，派陈诚到庐山请严到南京担任军事训练总监，严拒绝了。后请严出任全国禁烟总监，又遭到严的拒绝。

“七·七”抗战序幕揭开后，严重曾偕施方白先生以谒黄帝陵为名，二次北上，并特赴延安访问过。当时中共中央还派员带兵迎接严二十多里路程。到延安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接见，并且交谈了对抗日时局的意见。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答应改组南京政府，曾提出以严重接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显然这并不是出于蒋的诚意，不过是权宜之计，利用严重做幌子来敷衍舆论，使自己摆脱困境；想利用严重出面，掩护陈诚取代何应钦，以免引起黄埔系的反对。蒋介石离西安回到南京以后，并没有实践他的诺言。严没有被起用，直到抗日战争打响以后，严重还是继续隐居在庐山太乙村中。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蒋介石电邀严重去南京，严一见蒋，便请求上前线。蒋要严去上海视察，严去后看到国民党部队正

在溃退，便转回南京向蒋复命。蒋说：“今后武汉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严重回湖北任省主席，严仍要求赴战场效力。蒋说：“日军深入，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了。”又要严速回湖北。十一月，严重到武昌，行政院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严一再推让，才决定何成浚任省主席。严和张难先、石瑛任省政府委员。严兼任民政厅长、保安处长。一九三八年六月，汪精卫为了报复打击历来反对他的石瑛，借口湖北公路失修，贻误军机，提出撤石瑛的职；蒋介石乘机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陈诚因身兼数职，忙于军事，他口说省政府的事由严负责，实际上秘书长柳克述，建设厅长郑家俊，都是陈的亲信仆从。倚陈之势，遇事掣肘，仍然使严不能有所作为。八月间，敌机狂炸武汉，省政府各厅、处迁往宜昌，严仍留守武昌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汉沦陷前夕，他才绕道汉水，奔赴宜昌。十一月省政府迁恩施。严带少数机要人员，留宜昌三游洞办公。

严重到宜昌以前，柳克述、郑家俊以省政府名义，征用民工六万人，为陈诚便于行驶汽车，修筑由宜昌河西安安庙到韩家坝（省府驻地）二十多里长的公路，造成民怨沸腾。石瑛、张难先出面反对，并致函陈诚和严重，揭露柳盗窃职权、劳民伤财的种种恶劣行径；同时提出辞职。到一九三九年五月间，严感到僵局无法打开，经过与石瑛、张难先反复磋商，决定辞职；接着，他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和陈诚，当面求退。

在严重去重庆前两个月，从蒋身边人传出消息说，蒋打算让严重接替陈诚的政治部长一职，后传了一阵，终成泡影。蒋见严来辞职，反而责备严说：“我在南京就把湖北的事情交给你负责，先是要雪竹（何成浚）挂个名，继而要辞修（陈诚）挂个名，都是为了你在湖北打开局面，你现在不想干下去，李德邻（李宗仁）正在保举他的人当湖北省主席啦！”当面，

蒋介石答应改组湖北省政府，要严提出名单。这样，由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陈诚的钱口袋赵志尧当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严重仍处于左支右绌的困境。

武汉沦陷后，蒋介石不断策划反共，蒋帮驻鄂西特务机关，一方面向上回报攻击严对中共活动不闻不问，一方面又向严提供共党活动情况，对严施加压力。为了保全一些好人，严煞费苦心顶住没有查办。严重历来主张用人公开、用人唯贤。他曾提出“官皆将，民皆兵”、“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等口号，并以不爱钱、不怕死为选拔和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可是由于严长期脱离实际，难免鉴别失真，以致混进了一些坏人。

严重在代理省主席期间，生活不爱奢侈，作风较为廉洁。他积蓄的“主席特别办公费”有几千银元，辞职后，他不领。后陈诚派人送去，也被严拒绝；按严的意见，把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了。

日本在沦陷区推行毒化政策，并用鸦片、吗啡等毒品作为钓饵收买汉奸。一九三九年春，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因吸食鸦片被捕，经严批准，处以死刑。自此，他下命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者，一律处死刑。”对于这项法令，国民党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不予批准，行政院不备案。严找蒋介石，蒋不表态。所以这项法令在湖北只实施了几年。加之，陈诚到恩施后，提出“军事第一、第三战区第一”等口号，气势逼人。因此，到一九四〇年七月严重愤然辞去代理省主席的职务。

不久，严重移居宣恩长潭河，一度在晒坪从事垦荒。一九四一年夏曾被选任为省国民参政员。当时，省府派人送大米等物资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严都拒绝不收，宁愿兼任宣恩中学教师，靠自己挣来的钱维持生活。

严一生不慕官、不图名、不谋利，性情刚直，故此，被称为湖北“三怪”、又称“三杰”之一。

一九四四年夏季，严重身患重病，前列腺发炎，尿中毒。陈诚闻讯后，立即派车接到恩施进行抢救，但终因体质虚弱，无法治愈歿于恩施，时年五十二岁。董必武同志从重庆寄来一幅挽联，联云：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写回肠九曲深”

“一篇书”指的是严所著的《（礼记·大学篇）考释》。

严重临终前，感到自己对国家贡献不大，提出死后要求火葬。当时省府没有照办，依然在恩施进行了棺葬。一九四六年，由当时湖北省主席万耀煌亲自主持，迁葬到武昌九峰山狮子地。解放后，中南军政委员会又用水泥重修了碑墓，文革时被毁成平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省人民政府主持，又重新修建了碑墓。

我所知道的夏斗寅

王中兴

夏斗寅字炳灵，乳名金开，一八八五年腊月十日生，麻城县木子店杨梅河夏家坑人。其父系乡里农民，早年病逝。母亲梅晓春，虽无孟母之贤，却有良母之志。因望子成龙心切，所以教子甚严。她常对人说，我儿金开老诚朴实，将尽力培养成才。她日间拣拾松枝做灯火，夜间帮人纺线织麻，维持清苦生活。夏斗寅将届蒙童学龄，即在朱干成先生门下就读，稍后又

从师程诗斋先生。终因生活困窘，学费不济，而中途辍学。年事渐长，经乡人说合，与郭森侄女郭仙云（后名夏本郭）成婚。婚后生三子。长子德崇，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宜昌区保安上校副司令、新四县县长等职。次子德功，留学法国，因患重病，回天津治疗，不幸在手术中亡故。三子德根，国内大学银行系毕业，现任武钢会计师，生有子女多人。德崇生子女各一，子名汉生，国民党军校肄业，后随祖父夏斗寅经港去台，现任四国公司经理。女名瑞丹，中华大学毕业，于一九八三年由叔父德根办理赴美手续，后去台，至今未归。

夏斗寅中途辍学后，即到麻城县卫队营当兵。不久，离麻赴汉，考取武昌湖北武备学堂。武昌起义后，即参加鄂军部队当兵并任初级军官。至一九一四年在湖北军队第二师石新川所属第八团团部任中尉旗官。同年，因鄂护法军被北洋军阀所败，风声鹤唳，溃不成军。又因某夜，一战马脱缰，窜入炊火场，蹄插锅耳，嘶叫乱奔，引起部队溃散。此时，夏斗寅高举团旗大喊：“有愿到湖南的人，随我渡江南进。”于是收容到人枪约三百余。部队进至长江北岸，适遇其远房外甥万维起拾得湖北官钱局钞票一袋，得补给养。部队继续南下，经湘北各县，直达浏阳、平江两县交界的七岭，当即与土顽蔡俱优团激战一昼夜。击溃蔡部后，夺得团旗一面，缴获人枪四百左右。此时，部队已扩大到七百余人，驻扎浏阳县长寿街，号称鄂军团，自任团长。时值北洋军阀占领中原，吴佩孚出任两湖总督，任命肖耀南为湖北督军，方本仁为江西督军，赵恒惕为湖南督军。因肖、方均系鄂人，对湖北护法军锐意培植，遂各给夏部一个团的薪饷，赵恒惕待以客军礼遇，也给一团的薪饷。经费日见充裕，夏遂函请留在北平的同乡张森（木阶），后又电邀在北平的万耀煌、李柱中、余子强、肖勋、游昆、邱松、汪清梨、

夏鼎新、夏气清、涂刚甫、方定甲、叶蓬等人到湘，商议扩军计划，将原鄂军团扩编为鄂军混成旅，夏斗寅自任旅长，万耀煌任参谋长，李柱中任第一团团长，方定甲任第二团团长。至一九二三年，又扩充一个团，张森任团长。其间，夏一度任长沙戒严司令。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北伐。北洋军阀军长叶开鑫，在粤汉铁路株州和湖广交界处川镇河一带布防，抗阻北伐军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夏的鄂军混成旅扩编为鄂军第一师，归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指挥。夏部同叶开鑫部激战数日，被叶击败后，一、二两团回师北返，经罗田、麻城等县，逐渐瓦解。夏斗寅因作战失利，潜逃到湖北汉阳水上公安局马局长家隐藏。后经马的太太的筹谋，夏乘一叶扁舟，经上海转港，再奔粤汉中段同张森部会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夏师即改编为第八军第十师。后又移防宜昌改编为独立十四师，夏仍任师长。

一九二七年夏，汪精卫、邓演达等人在武汉成立临时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此时，夏斗寅即在宜昌召开团营干部会议，发出通电，公开反共。据我了解，夏斗寅此举，也同时是反武汉临时政府，尤其是反唐生智个人。夏通电反共后，部队即渡江到鄂南蒲圻，蒋介石又命令独立十四师改编为第二十七军，夏任军长。约在一九二八年夏，当蒋介石将原国民革命军统一改编为四个集团军之后，夏的第二十七军缩编为十三师。同年秋，有冠英杰部在安徽境内作乱，当即被十三师击溃，俘虏刘汉涛一个建制团。冬，又接受樊中秀、沈澄一个建制团的投诚，兵力日见增长。一九二九年春，蒋介石将第一集团军的三、六、九、十三等师，按战斗系列编为“讨逆军”后，夏的十三师由安徽寿州至湖北松子关、罗田、麻城、黄陂、孝感、汉川、沔阳、天门、荆门、当阳等县，向西急进。部

队到达京汉线的祝家垅附近时，桂系十八军郑重师的张亚一的一个建制团，乘机归顺，编为十三师七十八团。“讨逆军”各师进抵当阳、汉溶时，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残部，即渡长江退往广西，十三师即由当阳移至荆门、钟祥一带，随即回师东下，师部住黄州，所部分布在大别山区担任反共军事行动。一九二九年夏，蒋冯之战爆发，夏斗寅任平汉南段护路司令，所属三十八旅担任护路，三十七旅在襄樊一带继续反共。蒋冯之战，甫告结束，蒋介石命十三师就地戴帽，编为十三军，夏除任十三军军长外，还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和平汉护路总司令。此时，唐生智通电反蒋。夏部受蒋命令，部署讨唐，同时，唐生智反而任命夏斗寅为“护党救国军讨蒋前敌总指挥”。夏受命之后，即在信阳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蒋、唐两方的战斗任命，部属无一人发言。夏随即表态说：“唐孟潇（即唐生智）反复无常，很不可靠”。于是一致主张拥蒋反唐。会后，夏即令工兵营长夏气清率该营将信阳北一座大铁桥炸毁，部队进入战斗状态。此时，蒋急令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六、八、九各师，兼程北上讨唐，统归夏斗寅指挥。至是，蒋、唐礆山之战，于漫天大雪之中全面展开，战斗约半月，就将唐全部击溃，俘虏败军官兵二千余人。反唐战事结束后，夏斗寅返汉，仍任本兼各职。一九三〇年初夏，冯、阎讨蒋。蒋即命夏斗寅为二十一路军总指挥，统辖中央嫡系陈诚等四个师及本师三十八旅，组成讨冯、阎的战斗系列，沿京浦线北上，与阎锡山两个师，一个炮兵旅遭遇于山东曲阜，被阎部包围，苦战月余，直至援军赶到，才得解围，并击溃阎部。同年冬，夏斗寅继宜昌第四期军官研究所之后，在湖北黄州续办十三师军官研究所。“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中全会，夏斗寅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其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雪竹，作风腐化，声誉下降，在

南京出现倒何标语，迫使何雪竹离职。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钱大钧力举夏斗寅接替何的职务，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但夏的好景不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十一个月后，至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为缓和同四川刘湘、邓锡侯的矛盾，派张群接替了夏的省主席职务。另任夏斗寅为江西南昌行营的总参议，后又任成都行辕的总参议。

一九四九年武汉和平解放后，夏斗寅曾任武汉治安委员会委员，后率长孙夏汉生，搭英国兵舰经上海去港，此后行踪莫卜，消息终断。

麻城五十年代的扫盲工作

阎 丁 严仪周

一九五二年春，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了。广大工农干部和青年积极分子，从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迫切要求学习文化。中南行政委员会适时地发出了向文化进军的号召，这样，在县委领导下，一个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开展起来了。

一

推行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首先要培养教师。这个工作，我们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七月间，由严仪周等文化馆站的干部三十五人，去宋埠参加驻军扫盲班学习；第二步是，九月初在白果沙府庙培训，借用短师实习生七十一人，招收社会青年一百一十九人，计一百九十人；第三步是，十一月下旬，招收社会青年一百五十四人，借小学教师二百零一人，

在五脑山学习。十一月下旬，中南行政委员会就扫盲工作提出“大张旗鼓，稳步前进，由点到面，限期完成”的要求后，在县委的领导下，十一月三十日成立了县扫盲委员会，农会主席焦文任主任委员，工会主席许世宝、文教科长李继尧任副主任委员，武装部、青年团、妇联等有关部门的同志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工作队、片，彭介凡担任办公室主任，阎丁任秘书兼扫盲队长。随后，就在各区农村安排了二十五个扫盲试点，计教师二百零三人，学员一千二百三十五人。至十二月初，在五脑山召开这批点的经验交流会，肯定了一些好的作法：如用诉无文化苦的活动，发动群众；用三不误的办法解决工作、生活、学习的矛盾；用少学多看、分段教学的方法进行教学；用自己办学、自己学习的办法，解决办学困难；用互教互学，边教边学的办法聘请义务教师，等等。这次总结会对推动扫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作用。会后又抽出一百二十七人，在原有点的附近增添十九个班，学员八百八十二人。在此同时，又办了第三批点，在麻城、宋埠、白果三镇开班，计有教师三百五十三人，三十九个班，学员二千一百三十七人。

二

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五三年春节集训后，对教师队伍和点面的布局作了调整。五百五十九名干部和教师中，借来的正式职工或实习生，除保留二十二名继续坚持扫盲工作以外，其余回到文教科分配工作。在农村招收的二百七十三人中，有五十六名转为小学教师，暂时借用作第三批扫盲点的煞尾工作；有一百一十一名转到供销社等部门工作；根据自愿，有一百零六人回到本村教民校。这些人经过速成识字法教学的锻炼，激

励了革命热情，增强为工农服务的本领，许多人成了工作骨干。如沙府庙乡学员黄德英，原来是个童养媳，一字不识，参加扫盲学习后，识二千多字，当上民校教师，办社时当上会计。

从一九五四年起，扫盲工作有两个分支，一是农村的常年民校和城镇的职工夜校；一是干部的脱产学习班。这些，深受广大干群的欢迎。干部脱产班，仍用速成识字法，从五四年冬起，办过四期，参加学习的有五百一十四人，每期四个半月，学习扫盲到高小的三本书(3500个生字)。第三期一百六十三人，学习成员为乡党支书三十九人；乡长二十人；团支书二十人；妇联主席四十二人；信用社主任十五人；供销干部十九人；银行干部五人；农业社长三人。下面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对照：

识 字：原来：100字的 100—400字的 400—800字的
 33人 57人 37人

 800—1500字的 1500以上
 24人 12人

学习后：识1500字以下 1500—2000字的
 1人 26人

2000—2500字的 2500—3000字的 3000—3500字的
 13人 62人 61人

写字速度：原来不能写字77人

每分钟 3—5字 6—9字 9—11字
 50人 32人 4人

学习后：3人 33人 31人

12—14字 15—20字
 4人 41人
 65人

写	话：原来不能写的78人	能写便条	写信	见事写事
		35人	55人	0
	学习后	163人	163人	161人
	写总结			
	0			
	85人			

如熊家乡支部书记董孝思，原来不能认、不能写。只记得全乡总人口、总田地面积、总劳动力等大数。上级向他要冬播进度，他只好把工效和人数一合计就得出了一个概数。五三年冬播，还填报过几回进度，他也无法核实。第二年拿出来一看，全乡百分之九十的田地都报种了夏收作物，统购时任务未完成，他也有说不出的苦。通过扫盲学习后，他掌握了两千多个生字，提高了文化水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记载着不少典型，讲起话来也有理有据，有力地推动了工作。

李柱中先生的办学思想

朱长愈

李柱中，字幼琴，号求志居士。生于一八九二年，歿于一九四四年。麻城县白果沙塘畲人。他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参加北伐军，任过陆军中将旅长，获宝鼎勋章。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柱中因官运不济，而对蒋介石不满。毅然解甲还乡，以示反对。从一九四二年他五十寿辰所作的诗中，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态度。诗曰：“悟道知非生此世，万家忧乐到胸头。良心一颗超时种，正气千秋自我留，脱了军装挑粪桶，不骑战马牧耕牛。安如日月升恒寿，长放光明照九州。”李柱中回到故乡后，并没有苟且偷安，也没有全

是挑粪桶、牧耕牛，正如他所说，还是把“万家忧乐”放在心上。当国民党县政府请他出山，为桑榆梓里办教育时，他欣然出任麻城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他办学校，重视人格感化，表率作用。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言行一致，以利“上行下效”。他尊师爱生，对老教师言必称“老”，对学生他常说：“弟子即子弟，校长即家长。”他亲自提笔作校歌：“龟山之麓，举水之滨，钟麟毓秀，蔚起人文，彬彬文质，青青子衿，敬德修业，日新又新，自强自立，作事作人，三年志学，期底于成。”这首校歌，实际上是校训。他提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常说：“大粪溅到脸上是光荣之点。”他强调青年人要充满活力和生机，反对暮气沉沉。他作“兴起歌”，要求学生每天早晨集体起唱，歌词是：“早起早起，早起长生，不早起该死，早起是黄金，不早起是狗屎……”，“同化一元化，手要剪指甲，头要剃得象金瓜，领扣衣扣不要垮……”。李柱中先生本人亦身体力行，勤俭朴素。他在任麻城县中学校长期间，从家到龟头河（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以前，学校设在龟头河，以后迁到阎家河），有五十华里远，总是赤脚草鞋，途中一包冷饭。有一次，他从龟头河回家，路过白果乡公所，乡长鲁龙飞要派轿子送他，他说：“我也不是没长脚呀，要什么轿子。”原国民党麻城县县长钟韶，是他的部下，看到他生活清淡，想关心他，他总说：很好。他经常带领学生攀登龟峰，至今龟峰上还留有他亲手书写的“钟麟毓秀”四个大字。

在办学过程中，李柱中先生的教育思想，不能不受到历史的限制，也不能没有某些消极的东西，譬如，他极力崇拜宋代理学家张横渠、周敦颐、程颢的思想，还极力推崇清代曾、左、彭、胡的家书，而这些，则是应当采取分析态度的。

李柱中先生感于世道维艰，诸多时弊，在绝望之中于一九

四四年刎颈自戕了。在追悼他的大会上，原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鄂东行署主任李石樵送了挽联。李品仙送的挽联是：“一剑毕余生，失当代人师，谁复传经尊凤壁；卅年伤旧雨，废春风和气，办应堕泪共羊碑。”李石樵送的是：“解甲归来，苦为育才催白发；骑鲸西去，名留史册仰青峰”。

汪子弼先生办教育二三事

童 桂 馥

汪子弼先生，字龙蟠。麻城县石碇坳人。生年待考，病逝于一九四七年。先生系前清秀才，后又毕业于两湖优级师范学堂。青壮年时期，游历仕途，曾出任恩施、远安、罗田三县的县长。晚年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武汉启黄中学任教多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武汉沦陷，乃回原籍，办教育，兴学校，为桑梓服务。先生是我县教育界的一位拓荒者。他办教育的事迹，在我县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泯灭的一页。

一九三九年春，汪先生在石碇坳原有小学堂的旧址上，创办一所正规的中心小学（即今麻四中的前身），他担任校长。当时，县城、宋埠等城镇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大批青少年失学，教师失业，先生聘请家在县城及其附近一部份失业教师来山区任教。招收麻东几个山区的青少年入学，男女兼收，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共六个班，学生三百余人。师资队伍齐备，力量雄厚。余佩鸿先生任教导主任。一至六年级的级任教师依次是颜少仪（女）、汪汉文、吴季直、吴伯厚、李福畴和占晖岳等先生。还有算术、画图、体育和音乐科专任教师丁文玉、杜竹平、余绍礼和易璋应（女）等先生。各年级课程开设齐全，

除语文、算术之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和手工劳动等课程。

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各科教材和油印机无法购买。凡是笔学科，都由任课教师边抄写、边讲授。由于当时历史潮流的推动，学校办得很有朝气，全校每周有周会，各班有班会。每早操后有朝会，并由值日学生领呼抗日口号。晚睡前分班站队，唱抗日歌曲。在当时那种特殊困难条件下，能够办起如此正规的完全小学，这对于麻城教育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创举。

当时麻城全县还没有一所初中，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继续升学问题，一九三九年秋季，汪先生又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单行创办一所私立龙潭中学，他当校长。由于学校是私立，校舍、师资、经费等问题都必须自行解决。先生奔走于麻东各地，与热心教育的人士磋商计议，决定从麻东各地的祖、会、庙产中筹集资金，作为办学经费。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一面从原小学教师中选拔，一面到外地聘请名师，如清华大学毕业生、数理教师李昭冶先生是从安徽省聘请来的，英语教师江纪晖先生是从罗田县聘请来的。为了解决校舍问题，修建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楼房，三教三寝。开学后，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两个班，共九十余人，班次虽不多，但学校工作井井有条。

一九四〇年春季，麻城国民党县政府决定在龟头河程氏祠创办湖北省联合中学鄂东分校麻城分部。任命汪子弼为分部主任，并将原龙潭中学的大部分师生合并到麻城分部。于是，私立龙潭中学宣告撤销。龙潭中学虽然只有短短半年的历史，但是在麻城县中等教育发展史上，起了奠基石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春季，鄂东分校麻城分部改名为麻城县立初级中学，分部主任改名为校长。汪先生担任麻城县中学第一任校长。在创办麻城县中的过程中，先生同样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没有校舍，师生住祠堂，宿庙宇、借民房、搭茅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师生人数逐渐增加（当时是学期制，每年春秋两季招生）。到这年秋季，已经有三个年级，六个班，学生三百余人，学校已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县最高学府了。

麻城县中创建初期，抗日烽火方兴未艾，学校只能办在大山里，交通闭塞，师生在教学上、生活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汪先生遇事早作计划，妥善安排，未雨绸缪。因此学校教学工作仍然能够正常进行，师生生活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风雨晦明，鸡鸣不已。在先生的主持和推动下，师生团结，互敬互爱，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校风。

一九四二年春季，一个居心叵测之徒，向国民党当局告状，以汪先生之子当共产党为“罪名”，指控先生不宜担任校长职务（先生之次子汪兴益是共产党员，当时在新四军新五师担任重要工作）。于是，汪子弼先生被免去县中校长职务，调至省二高中当专任语文教师。

汪先生出身于封建科举，从政多年，晚年才致力于旧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对他一生的评价以及他的思想发展过程，都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但他晚年热心办教育，而且对麻城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先生在上述三所学校当校长（包括分部主任）只有四年，时间虽短，却做了一些开创性的有益的工作，给后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受过先生教诲的学生，遍布各地，大都对先生怀有敬佩之情。

汪先生和我是同乡人，又是师生关系。他在上述几所学校任职和任教的时候，我正在这些学校读书，同他接触的机会较多，受其教益不少。回想起来，四十余年前师生朝夕过从，授业质疑的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先生中等身躯，那时已经年逾花甲，童头皓齿，八字银须，精神矍铄，态度和善，表现出

一幅年高望重的长者和学者的风貌。他那质朴慈祥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麻城良师”——刘世楹

刘美灼

家父刘世楹，字汝擎。生于一八九八年，卒于一九五二年，享年五十四岁。系麻城市铁门区凉亭乡大店村人。髫年就读私塾，聪慧非凡，刻苦用功，经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岁左右，文思大进，出口成才，下笔成章，学业优异，深受塾师赞许。十五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后又修业于法政大学。一九二二年，法政大学结业后，即回县从事教育工作，在考棚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达十余年之久（当时校长是我县早期共产党员、革命先烈王幼安同志），以后又被委任麻城县立第二小学（即宋埠小学）校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武汉失守，麻城、宋埠相继沦陷，县立中学被迫迁至麻东山区。我父应雷松涛、汪龙蟠（子弼）、李柱中、张书环、屈祖培（绳武）、胡竞存（淑贤）等同人的聘请，先后赴杨家冲、龟头河执教，尔后，又在凤壁畈、考棚县立中学和宋埠新陵中学任教员、教导主任。一九四九年，宋埠解放不久，我父又被宋埠区政府安排分配在歧亭小学任教至一九五二年。

先父爱诗词，作对联、思想进步，爱国心强。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常用诗词、对联、抒发心声，表示不满。据我叔父刘凤栖回忆，父亲在高等小学堂任教时，常与革命先烈王幼

安同志促膝相谈，吟诗作对，唱和之往来，每周总有一、二次。先父将相互唱和之作，曾用白贡纸写成一个小本子，其中诗词对联都有，总共有百余篇、首，内有这样一些词句：“群魔起舞乱中华，大好河山遍地蛇，国恨家仇何日了，疮痍满目实堪嗟”，“妖氛罩大地水深火热，旭日耀晴空海晏河清”，“污泥浊水满江流，不予澄清誓不休……”。先父与先烈王幼安同志结下了文字缘，交成莫逆。当时，王幼安同志因干革命遭敌拦劫，被捕入狱，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宋埠干沙河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二岁。父亲目睹此情，悲愤交集，遂至神智失常，坐卧不安，一时外出乱走，一时卧床闷睡，多次想去收殓，终未成功，后竟痛哭终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把收殓未成，引为恨事。

一九三九年，先父在龟头河县中任教时曾与屈祖培、吴伯厚等几位友好议论时局时说：“桂系张淦，拒不抗战，苟且偷生，退却逃窜”（意思是说国民党第七军军长张淦不抗日，退却，跑到罗田滕家堡驻扎）。又说：“当今社会，兵荒马乱。物价高昂，生民涂炭。教书糊口，大麦升半（当时每天工薪只能买一升半大麦）为了后代，甘心情愿。贪官污吏，迟早完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了，我曾亲眼看到父亲兴高采烈地奋笔疾书写了：“台澎依属我中华，海外移民百万家，五十年来思祖国，从今放出自由花……”等几首七律诗。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制造内战，大别山麓又陷入了兵荒马乱之中。父亲又写了：“举起龙泉剑，斩断恶根源，开辟新天地，人人带笑颜。”等几首诗词，歌颂了解放战争的良好开端和胜利前景。一九四八年秋，父亲在宋埠新陵中学任语文教员

时，常对学生们说：“现在正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也是蒋家王朝快要土崩瓦解之日。”当时国民党张淦兵团正驻扎在宋埠搞所谓的“戡乱救国”，他不顾有被抓的危险，毅然在一次语文课上命题为“社会鳞爪”，藉以启发学生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通过这篇语文的教学，对学生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历史是无情的，半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三月，宋埠解放了，父亲曾深有感慨地说：“毕生经历了三个朝代，事实证明，还是共产党好。”

先父为人，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待人接物，光明磊落。梓里父老，曾有这样的评论：“汝擎先生的确是个正正当当的人，他从不巴结有钱有势的人，但总是同情贫困的人，对地方上的歪风邪气，他总敢说直话，说公道话，不怕得罪人，真算得一个正人君子。”

先父在麻城从事教育事业，整整三十个春秋，他对教学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学生循循善诱，精心培植。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举止言行，生活细节，处处给学生以示范，身教先于言教。他最擅长于语文、数学、动、植物教学，讲课中文道并重，生动形象，旁征博引，引人入胜。他尽管身体虚弱，长期患病，但从未贻误教学，常常在暗淡的油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至深夜。在批改作业过程中，发现少数学生的作业错得太多，就将这些学生一一叫到自己的宿舍来，反复讲解，多方诱导，直至学生学懂弄通才让离开。有的学生因家境贫寒，一时出不齐膳食费或无钱买书籍、作业本，他就解囊资助，使其学生安心读书。与此同时，我父还发现有些学生乱花钱，他就及时说服教育，对这些学生说：“在此兵荒马乱之年，你们的父兄拿钱供给你们读书，来之不易，不要乱花钱，要用心读书。”通过这些言传身教后，有不少的学生曾感动得热泪盈

眶，并深有感受的说：“刘先生，您不仅是我们的严师良师，同时，也是我们的严父慈父。”三十年来，经他培养的学生，不仅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更重要是在道德品质上受到了潜移默化的薰陶，多数成为解放后各条战线的业务骨干或领导干部。如原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九年三月，宋埠解放不久，当时任鄂豫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同志，率部南下，途经宋埠，住在“天主堂”，曾委托当时任宋埠镇镇长的张文礼同志，找到我父亲，并请到“天主堂”给予热情款待，畅叙师生离别之情，亲切交谈达两小时之久。王树声同志最后深情地对我父亲说：“刘老师，您几十年如一日，忠诚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真不愧为麻城良师”。

注：本文成文承叔父刘凤栖、铁门区志办张远亮、张良钧等同志大力帮助，在此致谢。

我的祖父胡衡甫

胡 勇（执笔） 胡金勇

祖父胡衡甫，字秉钧，号晴谷。生于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湖北省麻城市麻城镇人。祖父为我县著名中医，经验丰富，著述亦多，闻名遐迩。生前历任麻城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医院院长、县卫协会副主任委员、麻城医联会秘书。麻城县第六届人委委员、县政协副主席、湖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任过第五战区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中校私人秘书。

祖父幼时丧父，弱冠之年毕业于城南高等小学堂。后，拜

学其舅父熊清溪，研讨中医。熊属名医，尤其精于《难经》之学，因而深得其真传。学成之后，独自行医，兼营“胡长春”药店。医术既精，但不为足，又从江苏省武进县恽铁樵交得其函授，因此，日益增进，上溯岐黄，下至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尤契心于张仲景、陆九芝、曹颖甫之学说，故对伤寒、温病内科杂病与妇科诸疾，独具见解。

祖父为人淳厚，襟怀坦白，持躬俭朴，律己甚严。对求诊者，或达官贵人，或寒门黎庶，均一视同仁，以救死扶伤为本，而且不喜求取，因而深受人们的敬仰和赞颂。

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好古而不泥古，学外而不媚外。他常教诲子辈：“医之难，难于辨证，审证既的，用药宜专，若以模棱两可之药治病，以冀倖中，是自欺欺人。”每临诊断，他必详问细揣，多方究竟。如遇疑难重症，或遍考方书，或同仁切磋，从不轻率。他业医五十余年，坚持知难而进，敢担风险，不事推诿，表现了良好的医德医风。他不仅博览群书，潜心钻研，且与国内名医秦伯未（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余无言（上海名医）结为至交，函牒往返，论医议治。一九五五年，他为余先生所著《金匱要略新义》一书再版题跋，并为余先生所著《翼经经验录》一书写了序言。一九五八年，他将珍藏多年之罗田县万密斋名著《片玉心书》抄本，亲自校订并组织出版。秦伯未先生为此书题了书名。祖父晚年，仍手不释卷，孜孜以求，勤搜博采，伏案修文，整理经验，写成医话、医案，后集印为《衡庐医话》。此书精辟地阐述了医工、医德和内外、妇、儿各科的临床经验和疑难病案，得到省内外名家的青睐。余无言先生曾赠诗曰：“肱经之折是良医，济世婆心老不疲，惜得寸阴勤著述，十年不负党栽培，”“仁树须将皓首传，一珠一字费钻研，搜罗灵素长沙秘，写入青囊寿世篇”。

《衡庐医话》在他身后，由麻城县卫生局于一九八一年整理印发，其部分内容在湖北《中医杂志》等刊物上登载过。

祖父毕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几十年来，他亲手培养了一大批门人，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特别是晚年，为培养中医后继力量，更是尽心竭力，甘当人梯。他主持开办了我县第一、二、三届中医药训练班，并亲自任教。他对中医药学理论的精辟讲解，博得了学员一致好评。

祖父除精通中医药学外，还工吟咏，善书法。其诗其字，名闻邑里。

祖父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医事业，深受党和政府关怀。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麻城视察时，他蒙亲切接见，并得到董老赠诗赐教。诗中有云：

“辱承明教幸为多，况复深情作颂歌，我愧未能当万一，薰香盥沐诵无讹”，董老还写下“敬请胡副主席秉钧指正”字样，使祖父深受教益和鼓舞。他说：“这是我生平历史光荣的第一页，我只有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上。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并诗曰：“研讨经方传后学，发扬仁术寿斯民，衰年有幸逢明世，刮目相看畏后生，更喜东风陶万物，新栽桃李满山城”。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去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七八年党和政府为他平反昭雪，召开了“悼念胡衡甫先生”大会，赞誉他为人民的好代表、好医生，正确评价了他的一生。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为羨君家方术异 金针度处亦延年

——回忆我的父亲麻城著名针灸中医师王仲芳

王曙光

我的父亲王仲芳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三个寒暑了。父亲表字仲芳，号宗烈，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城朱衣巷，幼上私塾，天资聪慧、喜书法、善篆刻。

1909年春，父亲就傅于麻城著名中医唐弼臣，与熊济甫、余礼平、唐寅成、刘直轩、邹祥华（女）、陈伯儒、喻淑阳等同窗，颇得唐真传，善中医内科、外科、儿科、妇科、推拿，从1914年起单独行医。

1935年，已被誉为麻城八大名医之一的父亲，深为“汤药性缓”不能“抢救危疾”而苦恼。他经过多方奔走，毅然参加由陈澹庵社长创办的“东方针灸学社”学习针灸疗法。学社于同年（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给第2283号学员证书，准予参加学习。父亲收到证书和由于右任题签，孙科等人题字作序的，陈澹庵编写的《中国针灸治疗学》等资料后，为找到了“探微阐奥”、“针膏育起废疾”的方术而欢喜若狂，“拼命吮汲”，父亲先后精读了《中国针灸治疗学》、《温灸学讲义》、《实用针灸学》、《温灸学讲义补编》、《新著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人体写真十四经经穴图谱》、《人体经穴图》、《铜人腧穴像》、《运针不痛心法》等书和运针制灸方法、同时，还钻研了《解剖生理学》、《诊察学大意》、《病理学大意》以及《孔穴学》等著作，既丰富了父亲原有的中医

知识，又学到了针灸这项“别有名山事业在，针经一卷渡无边”的“效逾汤药”，“十可九痊”的“急救良术”。父亲为了将所学的“济世方术”尽快应用于实践，每天坚持“寅时起床，端坐入定”按照《运针不痛心法》的规定，“运气于指，心注于针”的练习指法。每晚，对照《人体经穴图》在自己身上或在我母亲身上标点，或试针试灸，以求认准穴位、体验针感。父亲在应用针灸疗法的实践中，每有所得，及时批注。例如在《实用针灸学》“小儿”篇的眉批上写道：“急惊取穴少商、人中、大椎、昆仑、曲池、中腕六穴可好”；在“胀满水肿”篇的眉批上写道：“面目四肢俱肿，腹胀脐突，先灸两天枢穴后，一二日续灸水分、气海四穴、肿胀全消”；在“失血”篇的眉批上还写道：“鼻血灸委中穴奇效”。父亲对书本知识并不生搬硬套，《针灸学讲义》规定的温灸疗法是“将其艾炷放置穴上以火燃之”，并认为灸后“不溃脓则病不痊”。父亲不以为然，而从“灸之目的在使内部得温煦、神经缓和、血液畅行”出发，大胆进行改革，将中药鲜生姜切成薄片置于针后穴上，艾炷在姜片上点燃，使药力透过姜片入穴。这样，既达到了温灸的目的，又使病人免受灸溃之苦，受术者交口称赞。

1940年夏，父亲逃避日寇从外地回县城后，立即将朱衣巷改名为医师巷，在门前直书“针灸中医王仲芳寓”九个大字，正式以针灸中医的身份济世。父亲对门诊病人，一律以礼相待，亲自安坐敬烟茶或由我母亲代敬，除急诊外，父亲都要等待病人“气顺则脉真”之时，再从容号脉。号脉时，父亲危襟正坐，目不斜视，神情专注，意念集中于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细心体验病人两手的“尺、关、寸”各部位的脉象，以求通过“切脉”来为“望、闻、问”综合判断提供准确的施治依据。并将自己的诊断和用针用药意见以及注意事项等，

耐心细微地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讲解，以取得他们的配合，直到病人全部理解了，树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后，才“对症施治”。对急诊病人，父亲在综合诊断的基础上，先施以针灸，以减轻其痛苦，再处以汤药，以断其病根。不少被抬子抬来的病人，自己临走时说：“王先生看病，有打针吃药，病就診好了一半，一打金针，病就全診好了。”父亲对因路远，一时回不了家的病人，经常留食留宿，甚至帮助煎煮汤药，从来不取分文。父亲对要求出診的人，从不摆架子，不分昼夜，随叫随到。出診时，父亲肩背一个小布袋，手拿一把油纸伞，晚上，提着一个纱灯笼。小布袋内装有一个圆形铜质小墨盒，一枝锯掉半截笔杆的小楷毛笔、一叠针灸中医师王仲芳处方笺，一盒金针，一包艾炷，一块鲜姜，一卷用来点燃艾炷的“纸烟”。这个被称为“救命袋”的小布袋、挂在案头的左上角墙壁上，不出診不用。父亲除在挂袋处亲笔书写颜体五言诗一首，诗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方艺术深”外，另将该诗亲自雕刻在经常使用的铜质墨盒上。用以时刻告戒自己要將“曲径通幽”的“禅方艺术”像“初日照高林”那样，把温暖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病人的父亲，不幸于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患脑溢血病不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仅五十三岁。

“天福泰”戏班 的建立及其发展

缪 镜 洁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年），活跃在鄂东和皖南地区的“天福泰”大戏班子，博得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个戏班子，演唱精湛，武打惊人，服装道具精彩夺目。它的活动延续近百年。“天福泰”的盛名，至今在鄂东和皖南一带被人们广为传诵。

戏班的建立，其起因是这样的：当时肖家山（今盐田河区南冲庙村）有个大财主叫夏映均，其人倜傥不羁，敢作敢为，自尊心特别强。有一次，他路过罗田县项家河，正碰唱大戏。当地豪绅见夏映均来了，即令戏班子停演，为夏“跳加官”，以便获得彩礼，补其戏费。

台上跳起“加官”，台下顿时哄动起来，人们七咀八舌地说：“来了个什么高官大富，停戏不唱！”“总不是个金头罗汉吧，何必如此厚重！”夏映均听了很是憋气，一怒之下，便慷慨回答：“耽误了戏，我给钱！”这话既炫耀了自己的豪富，又贬刺了面前站着的几个豪绅。话音一落，即令随从拿出银两把戏钱全部付清。

这一招夏映均胜了，那几个豪绅不得不设宴相待。在酒席筵前，豪绅们交口夸赞说：“夏君慷慨捐资，真不愧为麻城大财主！”夏深知他们的伎俩，便乘势讽刺：“贵县唱的是阳春白雪，可是破台塌板太不雅观！”在座的豪绅被刺得满脸通红。夏接着说：“贵县如果不嫌弃，我还愿募捐巨款，帮助你们修筑一座

万年台，以免今后唱戏用柁树、门扇搭台。”在坐的豪绅听了无不惊讶，个个站起来打恭，连声道谢：“多蒙巨款相助！”但他们满以为夏是在酒中失言，吹嘘自己。夏映均看透了他们的心底，便当面开好付券，叫人到肖家山提款。这件事，犹如石击池水，很快在罗田、麻城、黄冈等地传播开来，那座专为演戏用的“万年台”，不到一年时间，真的在项家河修筑起来了，直至民国二十年，才被国民党拆毁修了碉堡。

夏映均捐款把项家河的“万年台”修筑起来后，人们议论纷纷，有赞扬的，也有说风凉话的：“夏映均只是有钱帮别人筑台，就是没能耐自己搞个戏看。”慷慨敢为的夏映均，那里能听这种挑衅话，从此，他下定决心，自己要组织个戏班子。于是，他将本地一些戏曲艺人，聘请出来，组织个二十多人的弹腔小戏班，这个戏班取名曰“天福泰。”由于戏班刚刚建立，道具、服装简陋，演唱技术不高，一次在夫子河演出，当地豪绅指责戏班子牌号大，戏唱得不好，便唆使一伙流氓地痞，将“天福泰”的牌子砸了，并撵走了戏班。夏映均受到这种严重刺激，连肺都气炸了，他便横下一条心，觉得小敲小打不行，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于是，他除遍请本地名师外，还邀游外县，访聘著名艺人。在大冶他看中了昆腔戏班中的黄善富等名老艺人，他以每年每人百两白银的薪俸，特聘为师，后又从蕲春、广济等地特聘了一批乐师和演员，都一一厚礼相待；还花费五千两白银，派人往京、津、沪、苏、杭、汉等地购来大批道具、服装。在家训练演员、乐师三年，于一八四〇年春，一个八十余人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子，正式与观众见面了。

夏映均在为完善戏班设备上，是不惜重资的，演员服装，各式各色齐备。如唱《闻太师回朝》时，闻太师身穿用绣花针在彩绸上联缀而成的针衣蟒，在光照下，万点银霞，闪耀夺

目，华贵无比！为了服装的不断更新，还专雇二十多名绣工在家，常年绣衣。道具方面，更以巧、精、全著称，如唱《永乐皇帝观灯》，硬是抬出四十八鸣大锣上场，演员超出舞台，走入大厅广众之中，将观众带入同永乐皇帝一起观灯，其热闹和壮观场面，引人入胜。诸如武将，文相所用的坐骑，如骡马、狮、虎、青牛、白象、麒麟等，亦如活灵活现。有一次在罗田县李婆墩与浠水县的天兴泰大戏班唱对台戏，天福泰唱《花子盘蛇》，蛇缠人身，头尾晃动，栩栩如生，以此，赢得了大量观众。

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的唱、做、念、打等功夫，当时都是第一流的。尤其是武打功夫，给人印象更深。如在《目连传》中，叉杀傅刘氏的场面，使人惊心动魄。傅刘氏要经受一〇八叉，叉叉惊险。其中有《黄龙出洞》一叉，傅刘氏和武师，先后从台内一排小翻出场，傅刘氏翻到台前侧柱旁，刚一站住，武师便立即对准刘头上一叉，叉尖刺入台柱，叉柄颤颤有声，距刘氏头顶不过半寸，使人瞠目咋舌，叹为观止！其精湛武功，由此可见。

夏映均对戏剧并不内行。但他十分注意不断提高演员的表演艺术。每年年终，他照例把全体演员接到家中，进行总结，对表演艺术高超的师傅，给予金钱奖励。因此，演员们都积极注意钻研自己的业务，不断地提高演出水平。

夏映均一手创办起来的天福泰高腔大戏班，在等级观念十分严重的封建社会里，常被一些“大人先生”们耻为下流艺。夏映均独不持此见，他全力以赴，苦心经营，并不惜大量投资，从买设备、请师傅，加上常年补贴，卖掉了良田三百石（合二一〇亩），共花白银万多两，因而使天福泰成为当时艺术高超，脍炙人口，长盛不衰的大戏班子，演唱近百年，足迹

遍涉鄂东、皖南廿余县。在客观上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促进各地戏曲艺术的交流，提高演唱水平，都取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夏映均死后，天福泰高腔大戏班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才闭箱停演，但天福泰的盛名，却至今嵌在人们心里，传在人们口上。

一九五二年七月，湖北省文化厅派三位同志访到盐田河区肖家山，将天福泰的后期演员夏久亭、雷金魁、胡继高等老艺人，请到省文化厅，抢救和挖掘传统剧目，他们通过学习党的文艺理论，方针和政策，苦心回忆，写出了一批剧本，并教练学徒。同年十月在武汉还示范演出了《赵五娘描容》，湖北日报除刊登这一消息外，还登载了夏久亭和胡继高饰演《描容》的剧照。

农民梅勤生的口头诗

梅基癸

梅勤生是麻城县闵集乡的一位农民（1886—1970），他辛勤地劳动了一辈子，也唱了一辈子。他的歌唱揭穿了旧社会的黑暗，欢呼了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梅勤生老汉小时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从小喜欢唱“山歌”，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哺育，所以他的口头诗作得很好，唱得又多，乡里人都管叫“歌袋子”。

刚在得力的时候，地主收回了他家种的佃田，生活逼得他只好到城里去做码头工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整天整夜地劳动着。但每到月底发饷的时候，这个会费，那个租费，七折

八扣的一除，还是落得一家人捋肚子。当时他痛恨地唱道：

两脚奔奔走，为了身和口，
肩挑一百八，裤子打疙瘩，
肩膀做大路，总是打饿肚，
要想肚子饱，除非天倒了。

不仅是吃不饱，而且还受着工头的压迫，经常挨打受骂。特别是公司里那些吸血虫，是他最痛恨的。他咬牙切齿的唱道：

小小豺狗满街游，
莫让畜生碰了头，
打狗不如先下手，
不打快些把身抽。（躲开的意思）

工人们不仅到处哼着这首诗，而且还用纸写下来贴到公司门上去。被伪乡长袁文斋发现了，把梅勤生抓去关了几天就开除了。

城里站不住脚，不得不又回到贫困的农村，向户长磕头说好话，才种上了一亩多祖上的佃田。每到新谷下地的时候，扬叉扫帚一丢，连稀饭都不能饱吃一顿。说起来是祖上的田，应该大家都有份，可是谷子偏偏要送到户长梅厚德家去，被他一口吞了。到青黄不接的春天，就用高价卖给穷人，从中牟起厚利。梅勤生恨不过，便在全族祭祖的时候，写了一段祭文，中间有几句是：

吃祖喝祖又卖祖，
脚弯手弯怀里弯，
祖宗若不显灵圣，
地皮不日造成潭。

当场念完后点火焚烧，气得那些管祖账的地主吹胡子瞪眼

睛的直顿脚。

那时国民党的**小保队**，在农村明地抓丁派款，暗地抢劫行凶，搞得农民不仅黑夜不敢出门，就是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在路上走。梅勤生痛恨国民党对老百姓这种残酷的压迫，就唱道：

河内无鱼虾作浪，
国家无人鬼当权，
青天白日出活鬼，
太阳下面鬼行蛮。

群众听到这四句歌，象是出了一口大气似的，高声大唱。

梅勤生老汉在旧社会作了无数的口头诗讽刺和反抗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因此落得一次又一次地挨打、受骂甚至遭到暗害。只有那些和他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群众，才对他无限的尊敬。

解放了，黑河的水换上了清泉。党领导穷人闹翻身，受罪的岁月一去不回还了。农民擦干了眼泪，换上了笑容，梅老汉把他大门上常年贴的一幅对联“满腹愁肠何日了，浑身恶债几时消”改成“满腹愁肠解放了，浑身恶债陡然消”。

从此以后，梅老汉就用他的歌声来打击敌人，歌唱幸福的生活，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在生产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土改时，有很多老实的农民不敢分地主的田地，对党不相信，怕国民党回来倒算。梅老汉就在会上高声的唱道：

田是我们开，树是我们栽，
农民自己田，回家理应该。

在斗霸中，他上台揭发乡里大地主刘怀太，唱道：

不法地主刘怀太，
他的心思实在坏，
白菜地里埋银洋，

银洋上面又兴菜，
这个顽固狗东西，
你看古怪不古怪！

五 他所有这些诗歌，都大大的推动了土改、斗霸运动。乡里的干部发现了这个现象以后，便把他和陈道信、闵辉松等四、五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创作组。这就是麻城县一九五一年诞生的第一个农民业余创作组。从此以后，梅老头子更积极了，他在表示决心时说：

过去唱歌光挨骂，
野狗咬人谁不怕，
共产党来帮助我，
教我唱歌好方法。
两个社会一对比，
心里好比洋糖撒。
我要天天唱新歌，
一定放下老人架。

一九五四年入冬，创作组召开会议，从他家到开会的地方有五里多路，加上下了雨，路上很滑，大家怕他年纪大了不好走，就没通知他。他打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夜手拄拐杖赶去，半路上倒在田里起不来。恰巧组员闵辉松开会路过此地时发现，才把他扶回家去，他还是口口声声的说：“不要紧，你们可不能把我当老人看待呀……”后来还因此得了一场大病，但这些困难都没有把他吓倒。病刚好一点，就找陈道信到家去给他讲讲外面的新闻，他困在床上编成歌唱。这时正是推广南大麦的时候，有些老农民思想不通，他就唱道：

南大麦，南大麦，
共产党带来的好贵客。

见了客人还迎接，
反而还要来胡说。

创作组对他的这些行动，非常感动，马上把他的歌在全乡到处教唱，乡政府还用红绿旗写上插个满畝，就这样全乡都按计划完成了南大麦的播种任务。第二年夏季南大麦增了产，他又唱：

我说南大是个宝，
有人还要横着傲，
麦子堆在你眼前，
看你再说好不好。

唱得那些不敢种南大麦的人简直是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

一九五七年夏天，同埠王大妈的女儿没考上中学，决定在农村参加生产，王大妈思想很不通，不仅恨自己的女儿“无用”，还常常埋怨政府。梅老汉知道以后，马上就唱了：

王大妈，好张巴（糊涂），
不让女儿做庄稼，
不是农民把田种，
吃屎也无人给你拿。

王大妈听了以后，开始有些生气，后来慢慢就想通了，还亲自教女儿要好好地生产。

大跃进的号角在农村吹响以后，到处出现新气象，梅勤生老头子的歌也越唱越多，越唱越好，越唱越新鲜，从早唱到晚，下地也唱，收工也唱。乡、社干部在布置什么新工作之前，总要找他先编一段歌在会上唱唱。乡总支书记查国良同志表扬他说：“你这一唱呀，比我讲一晚上还强。”梅老汉只喜得胡子翘翘地直点头，半天才说：

生产大跃进，
喜得我无头奔，
白天忘吃饭，
夜晚不想困，
想起社会主义好美景，
老汉我浑身都是劲。

在一九五八年抗旱斗争的两个月中，他共写了三百多首顺口溜，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过去讲迷信，泥巴做大圣，
抬着满畝游，磕头把香敬，
还是不下雨，到处饿死人，
有了共产党，天狠无人狠，
抗旱轰破天，满畝都是人，
一年不落雨，照样好收成。

党号召全民办钢铁以后，乡里建起了一座土高炉，九月五日这天出铁了。他参观以后，马上又唱：

过去两手掌犁铧，
如今两手掌火钳，
农业社办钢铁厂，
一条红龙冲上天，
铁水赛过长江水，
美帝吓得洞里钻。

唱完后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人民公社化运动又给梅老汉增添了不少的劲头，他接连唱出了很多歌颂人民公社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荷花没有桂花香，
小社没有大社强，

农村走向公社化，
我们一步上天堂。

编后记：农民梅勤生的口头诗，其中有些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我们认为，这是一段历史，我们无权改变它。因此，还是照发了。

农民诗人陈道信

王 杰

陈道信（1913——1969）是关厢区闵家集乡鸭儿塘湾人，只读过七年私塾，十四岁时父母双亡，过着挨亲靠戚的贫苦生活。十七岁时，由亲戚担保，他租了本湾地主陈吉峰的一间铺面，在闵集街上开了一爿小陶器店，不到两年，生意就关门停业了。后来落得生计无门，只得在人家的屋檐下摆了个卦棚，给人测字算命以糊口。

解放了的1949年，是陈道信人生转折的关键年。他听到一些革命道理的宣传，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各项政策的感召，开始认识到摆卦棚的职业不能干了，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并担任了贫农小组长。

1950年春，就凭他读过七年私塾和在卦卜中所练出来的文字水平，参加了闵集乡人民政府成立的宣传队。他开始创作的“三句半”、“顺口溜”，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就很能鼓舞人们的斗志。他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就是破除迷信的小演唱《竖筷子》，发表于《湖北文艺》，抗美援朝中，他又写了《汪爱玉捐献》、《董洪范参军》等真人实事的演唱材料。县文化馆辑

录和印发了这些材料，还给予他写作上的具体帮助。

党政机关的重视，文化部门的培养，陈道信的写作兴趣越来越浓厚了。在反霸斗争中，他写出了大型连台戏《吴金魁传》共九本。剧本系统地揭露了闵集乡恶霸地主吴金魁的罪恶，为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起了促进作用。

1951年，他参加了湖北省第一次文代会。省文联还给予他以荣誉，并鼓舞他和闵辉松（农民画家）合作，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他不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从省城回来后，更加活跃在创作战线上。《湖北日报》、《湖北文艺》、《布谷鸟》、《长江文艺》以及《展望》周刊等刊物，连续发表他的作品近两百篇。他与闵辉松合作的诗画配《吴家堤变了样》、《不法地主刘怀太》，分别发表于一九五二年《湖北文艺》的第二期和第六期。

陈道信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经常为了写出一篇象样的诗歌冥思苦想。他在写《恶狗坟》中，半夜时想到“……狗官不凭理来断，见了银子黑了心，狗官为狗判了案，当堂处罚穷苦人；高大棺材买一口，给狗送殡埋进坟……”时，即时披衣点亮油灯，提笔写上再睡。又如他在写《要为毛主席争光荣》这篇以工具改革为题材的诗时，他通过认真地观察，询问后，才得到激情洋溢的九首诗词。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写的：

……孔明死了几千年，木牛早已失其传。

今天仿效孔明法，创造铁牛在犁田。

要比黄牛翻几番。……

麦粃好吃磨难挨，人人都把脑筋开，

齿轮带动四幅磨，一牛拉着转起来，

粉子也不用人筛。

（摘自麻城文化馆编《农村俱乐部》）

从上面例子中也可以看出，陈道信的创作取材多来源于农村，语言也容易被人们接受。因而他的作品大都充满农民的生活情趣，如他写的《谷收时节》中的语言就体现出亲切，流畅自然的特色，把一个劳动场面，写得兴味盎然。这是他写的一对情人的对唱：

男：哥喊妹来妹应哥， 早稻黄了要早割。
 二人摸着下田畈， 同唱同做好干活。
女：踏上田畈吃一惊， 口喊情哥问一声：
 只听镰刀沙沙响， 为何冒见割谷人？
男：弯月西沉夜不明， 割谷之人手不停。
 今年早稻分外好， 个个喜得腰不伸。
女：情哥割谷跑在前， 妹在后面把哥赶，
 抢种抢收显身手， 看谁英雄谁好汉。

（摘自“同上”）

陈道信的全部作品，可以归纳出两个特点：一是坚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麻城各大水利建设工程中，都留有他的诗篇，哪里需要文艺宣传，哪里就有陈道信的作品。二是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另外在写作手法上他还擅于运用比照、夸张和拟人的手法，他的《增产山歌》九首中有一首：“……竹笋出土节节伸，一年变化一年新，莫说增产到了顶，耕作技术要革新，多挖潜力找窍门。”

（摘自《麻城生产歌谣》）

他在《明山水库工地诗歌选》中就用了夸张和拟人的写作手法：

英雄斗志世无双 推着泰山赶太阳
太阳歇了我不歇 又跟月亮干一场。

还有，他在一九五九年修建三河电站时创作的《与北风斗

狠》，各家刊物纷纷加以刊载，连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亦予采用。这首诗以一个普通的水利战士胸襟，先是对“北风”的藐视，接着以一幅热气腾腾的劳动画面，体现出工地上磅礴的气势，战士们对北风毫无畏惧，为了电站的早日建成，彻底改变全县人民的生活面貌，诗的最后一段是以教训“北风”的口吻出现的：

“……风呀风呀莫太毒， 你看河水也让路。
风呀风呀要知羞， 你看高山也低头。
风呀风呀任你狂， 修好水利多打粮。
管你北风停不停， 战得我赢算你能！”

一九六九年七月，陈道信因病逝世了，县文化部门及闵集乡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笔者作为曾经与陈并肩战斗过，兼是同乡，特邀集了以闵辉松为主的部分老人，座谈中就记忆所及，书此以示对战友之怀念。

蔡家山采陶工艺与抽象装饰

余敏文

蔡家山是湖北主要采陶产地之一，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早在北宋时期就建有两座老龙窑，从“汪四窑”发展到现在，工艺陶瓷厂已拥有六孔窑，辊边窑和两座龙窑，机械设备 62 台（套）和六个车间，七千余平方米厂房。

一、北宋采陶，蔡山为“楚陶”工艺之初

北宋时期，是我国陶业极盛之时，各地名窑辈出，从有关资料和蔡家山古窑址以及我县大批汉墓出土文物中的采陶考

证，蔡家山是北宋时期采陶主要产地之一。

仅从采陶老艺人汪老四珍藏的“三龙游海”采陶盘，图案和划花、描金就是当时的盛行纹样，云朵分布自然，中间一圆形盘龙，盘边二龙戏珠。还保存有北宋时极盛六方瓶、罐。分别画有海棠、荷花、牡丹、石榴、佛手等纹样产品，已是该厂流传至今的工艺了。采陶老艺人汪宗成、汪老四、周光成、袁立润等三十余人的口述和他们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流传至今已经历了十五、六代人，才传到他们，所以说蔡家山采陶始于北宋不是没有依据的。

蔡家山的来历：

蔡家山是以陶土资源来划分的。即从宋埠往北七、八里之地，由周贵入龙井经过的一带方圆十余里的小土丘，土呈梨黄色，素有七土之称闻名国内外，陶土资源丰富。

远古时期，蔡家山周围是一片汪洋。县志记载原名叫“晒鱼山”，直至秦代大力兴修河渠，才化海为原，便有北方口音姓蔡的一家人到这里定居，从此蔡氏一家由于人丁兴旺，利用陶土资源创办了龙窑，开始陶器生产，在每件陶器产品上刻上蔡家山纹样，蔡家山以此而得名。

北宋时期蔡家山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最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为主要的产品。由于适用得到畅销，但是它的生产规模和劳动方式与一般手工业作坊差不多，生产不够稳定，采用技艺也较为原始和古老，所以生产的陶器品绝大部分是粗制的日用土陶，主要是缸、坛、罐、钵，并烧有瓶、壶、炉、蜡台、陶枕，凡生活所习见无不烧制。一般没有什么纹饰，即便有某些纹样也极为简单。

除日用品外，也开始生产极少数的用于贵族和寺庙的陈设品。如花瓶、香炉、陶瓦、兽头等。这类产品均有纹样，而且

比较精细。仅从汪老四家里保留下来的花瓶、香炉、蜡台来看，当时只是一种灰陶，一般产品入窑烧成后是出现白泥和陶土，故其底色即呈梨黄和黑色，纹饰构图简单，刻一条龙，或一只凤凰。没有任何配合和衬托。

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用品已成为畅销货，陈设品也随之受到人们的喜爱。以后逐渐注意了装饰。并有一定的主体和内容，出现了组合和连续图案。同时表现面也大了起来，家禽类：鸡、鹅、鸭、鸳鸯等；鱼类：鱼、虾、蚌等；花鸟类：梅、兰、竹、菊、牡丹、荷花和白鹅、燕子、喜鹊、凤凰等；动物类：马、牛、羊、猫、兔、狮、象、龙、麒麟和出现戏婴图。由于表现手法的发展，而描金和刻画花的技艺得到提高和应用，这是蔡家山陶瓷装饰的新突破。

蔡家山陶器古雅耐用，独具一格，产品色泽古朴厚重，造型简练大方，工艺精细美观，保色、保味性佳，陶壶泡茶不走味，数日不变质，久保浓香等特殊功能，并且它的产品使用年代越长越亮，光润更古雅，被视为珍宝。

二、抽象装饰。蔡山是“楚陶”工艺之物

蔡家山近代陶瓷的抽象装饰：

沿着漫长的陶瓷工艺发展，不难发现，抽象的陶瓷装饰在人们的审美上确占有重要地位。

从蔡家山最初原始的陶瓷器皿上出现的刻划纹拍印纹；陶瓷上的螺旋纹、几何纹；黑陶上的弦纹、绳纹；七型彩釉的龟裂纹、乱纹；明清之际的锦地纹、回纹；以至现代的几何图案、宽窄色线和不可名状的各种装饰，都属于抽象的陶瓷艺术的装饰。

依照现存品种和有关史料证实，蔡家山最早出现的陶器的装饰和造型是属于抽象的装饰。从它的产品不难看出它的抽象

装饰和造型是由工艺过程中无意留下来的自然的纹路。而逐渐发展才成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加工了。

恩格斯曾说：“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从汪老四手头仅存的几件黑色陶器的纹样中就有编制纹和木制纹印的出现，这说明了是蔡家山生产的陶器的根源，也证实了当时它的生产条件、制造陶器的木制印模，拍印手耙和编织支架在陶器上形成自然痕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种种装饰效果，使人们产生一种审美的观念，这样开始了有意为之，所以蔡家山早期出现的陶面刻划纹和拍印纹、编织纹是原始的陶瓷抽象装饰。

随着蔡家山制陶工艺发展和生产过程的形成，由自然编织纹、拍印纹、刻划纹以及描金的应用，逐步出现了螺旋自然纹路，更引起了人们的审美感。除螺旋纹外而蔡家山当时就有波浪纹、三角形几何连续纹样。据考古学者考察记载，以上三种纹样分别是代表原始社会不同的三个部族。蛙图腾、鸟图腾和鱼图腾等不同符号的表现，而出现的回纹样就表示佛教的轮回，进而它表现的八宝纹、龙纹、凤纹、麒麟纹则是中国特有的封建意识象征。这就是蔡家山反映在陶瓷上传统的抽象装饰纹样，同时也是它的特征。

在纹样的表现手法上刚劲有力、刀法流畅、其变化自然、清晰富丽，花纹线条严紧，刻划细致，点面对比结合。所表现的风物栩栩如生。利用共同特征和自然形态是表现抽象陶纹的综合和概括，它所表现的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蔡家山陶瓷工艺造型，巧妙地采用对称、交替、连续和组合等等抽象形式的法则，用思维能力和通过推理把握事物的运动规律进行再创造，并将它上升为美的法则而加运用的结果，

形成了独特的蔡家山陶瓷在型与法上出现高度抽象装饰的统一。

蔡家山现代陶瓷的抽象装饰：

蔡家山现代陶瓷产品出现的纹样，已经发展为由某些公认的审美因素组合而成，它不仅是为了诉诸人们的视觉的各种物象的综合，而是通过由点、线、面、彩色块有规律、有组织的排列和沉现，严格地按照数学群论的推演，才形成比较纯碎的抽象的美感形式。这种美感的形成，是通过陶瓷工艺和工人长期的历史过程自然地培育出来的。它不再是可视的客观物象的概括和综合，而是象征着人们的主观情感和美感的运动最高形式。从眼睛所能见到它的形和色，高度感受到由点、线、面、彩色块所构成陶瓷工艺品。它保持着蔡家山陶瓷产品独特的性格，艺术的特征，自有一套诸如音乐的节奏、韵律等等规律的制约，其自身就具有生命力了。

蔡家山工艺陶生命力的特点是：“神、气、骨、肉”。它有大型配套的适用现代日用陶瓷和富丽堂皇的陈设陶器并加以组合，用现代抽象纹样进行装饰，用音乐的语言来说，就象一组节奏鲜明、动听、悦耳的“交响乐”，那么“神、气、骨、肉”就是他这组乐曲中的和声了。

蔡家山的陶瓷以抽象造型，抽象纹样追寻自我，神形兼备，有骨有肉。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生活的结晶，面向大自然的结果。通过工人熟练的技巧和特殊手法，巧妙地将点、面、线、色溶为一体，以表现作者的意愿和人民大众的审美共同感受为一致，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自我。

据有关记载，明末清初时期，蔡家山陶器就远销东南亚各国曾在国际博览会上多次获得好评。至今还有当时的产品珍藏在英国和美国及日本博览馆。于1973年有“双底青蛙”等数十件

产品，参加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博览会展出；1974年“四季鸟花坛”等十件采陶工艺品赴美展出；1975年又现广交会展出“花瓶式卜水坛”等五十余件采陶产品。1976年又有一批产品，如八方梅花茶壶、狮式八方坛缸、花瓶式坛和各种水花坛、筒、壶等千余件产品到国外展销。1979年曾派代表参加全国陶瓷座谈会。经全国专家认定和评比，对蔡家山采陶产品，定为特级，并将蔡家山采陶誉为“湖北真陶”，随着蔡家山采陶工艺品在国内外的畅销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它的历史状况和生产工艺就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各国专家、学者以及收藏家对蔡家山的采陶工艺生产和它的产品给予赞赏。

能工巧匠——夏长炳

夏德能 夏远明 口述 沈作夫整理

麻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雷氏祠，它的承建人、能工巧匠夏长炳，亦名长干，字炳珠，张家畈区白石山乡牌楼河村人。1903年（光绪癸卯）元宵，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夏生性刚直，诚实寡言，十四岁起从师学艺，勤奋好学，敢于创新，自画自凿自雕，工序往往超过师授范围。艺从师出，青胜于蓝。

1922年（民国壬戌），刚满二十周岁的夏长炳，以独特的石雕工艺，主领承建远近闻名的雷氏祠堂（今东界岭乡人民政府）。雷姓族长荆南对工程质量标准：只求绝技，不惜工钱。天盘以下全用石器，件件石器俱作浮雕，如有粗材废料，扣工价并赔损失。成竹在胸的夏长炳认为，这既是一次献艺用武之地，又是一次深造技艺的良机，他组集近百名石工，精雕

细凿，而绘图设计，全出其手，整个祠宇规模，造型新颖、奇特：架拱桥于天井，设洞门于殿前，装石栏于楼口，立牌坊于门外，屋顶飞龙压脊，门头鸣凤朝阳……，石雕精湛美观，图纹形象逼真，他凿雕的石狮（现局部有损），坐镇门旁，栩栩如生，气势异常雄猛，使人望而生畏。1926年祠宇全部竣工，成为一时的游览名胜，1927年6月因火被焚，石雕工艺大受损伤，复修后，“文化革命”期间负“四旧”罪名，全遭浩劫。1985年12月，麻城县人民政府行文，将雷氏祠列为“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43年，黄市乡的新桥，南端一空被山洪冲垮（跨度七米），夏长炳承担复修任务。桥面用的四根石梁，长7.57米，宽0.5米，厚0.47米，要把它架上高5米的桥墩谈何容易？夏经过思索以圆木代轮，逐渐向上滑动，顺利地完成了架桥任务。

1945年，安徽省禅堂乡地霸周伯安，他仗着儿子当县长的权势，横行乡里，周围的人无不畏惧。这年新建住宅与夏长炳签订合同，合同上一款言明：奠基，起门头时，主方应送给工人两次神福（加餐的酒肉），届时周倚势食言，夏长炳怒极，率领石木工人罢工两日，迫使周乖乖地按原合同办事，这场斗争胜利，当地闻知，既感惊讶，又拍手称快。

夏长炳授徒三十余人，在技艺上个个名副其实，其中，夏明山深得师传，技艺更为全面。师徒给贫困人家做活时，他总是谆谆地说：“在穷人家做生活，要特别尽力，他们不但给工钱困难，连供一餐饭也不容易。”

建国前，从小饱经风霜的夏长炳，总想为后辈子孙谋福利，平时自己节衣缩食，大量添置家产，变工劳动；建国后，凡是大型工程，领着众徒他仍然从事设计、指导性的劳动。

1975年农历10月25日病故，终年七十二岁。

侵华日寇盘踞宋埠罪行种种

周基正、胡良斌、徐厚良、李 明

侵华日寇盘踞宋埠达八年之久，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仅就我们的亲见亲闻，痛诉点滴，以见一般。

狂 轰 滥 炸

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初一，麻城三大集之一的宋埠，虽然天气晴朗，但人们的心头却阴霾密布。上午十点钟左右，两架日寇侦察机突然从西南方向朝宋埠飞来。到了宋埠上空，飞速减慢，高程降低。一阵盘旋之后，接着进行俯冲、扫射，约摸两个钟头，就向原来的方位飞走了。

这天下午一点，残酷的轰炸开始了。日寇飞机二十七架，以三架为一组，摆成人字形的战斗态势，仍从西南猛冲过来。第一组自宋埠西门外的湘帮河起，沿正街（现新生街）直到东门外的魏家咀，一路投下了大批罪恶的炸弹。紧接着九组集中于整个宋埠镇，低空盘旋、穿梭、狂炸。在轰炸过程中，一些

汉奸败类，混在城区四处，以镜子反光或手帕飘摆为标志，给敌机传递信号，指引轰炸目标。象湖北省银行（设在宋埠）、四官殿修械所和重要仓库等处，则遭到轮番轰炸，发现奔跑躲避的无辜市民则机枪扫射。直到太阳落山，凶恶的敌机才陆续逸去。

遭到残酷轰炸的宋埠镇，顿时一片混乱，其惨象令人目不忍睹。剪子街黄家纸扎铺全家被害，无一幸存；大南门巷一位姓龚的医生，大脑和四肢都炸飞了，血肉溅在墙壁上；三十多岁的陈大姐被炸，半边脸削去，眼球滚出，乳房被炸掉，几天后，惨死在南门外；躲在床底下的一对夫妇，也不免于难，罪恶的弹片，从男人的胸部穿透到女人的背部，迅即身亡；居民黄未然按着被炸出来的肠子，呼号救命；商户老板耿乾太，头躲进磨盘底下，但一只腿被炸飞了……。

镇中心三层立跨正街，驻扎着国民党防空哨所的望楼，全被炸塌。炸死和活埋在楼底的以百人计，一星期后还有人在废墟底层呻吟，但又有什么办法能够解救出来呢！

一向驻扎军队指挥机关的南门庙前，中山台侧的马家塘，绿树成荫，荷叶茂密，无辜的人群，为了活命，纷纷潜入这里，指望得保安全。但因居民黄未然从四官殿逃到南门外，又从南门躲进马家塘，这一目标被敌机发现了，于是对着马家塘，进行了疯狂扫射。一塘碧水，染得鲜红，五十多条生命葬于淤泥之中。

距湖北省银行最近的下正街，离文昌宫（常驻部队指挥机关）不远的永宁巷，炸毁房屋上百间，一个连一个的炸弹坑代替了原来一排排古朴整齐的商店和住宅。

城内城外，大街小巷，乱作一团，惨凄一片，呼娘的，哭儿的，号夫的，寻弟妹的，悲不忍睹，惨不忍闻。一个市场繁

荣、车水马龙的“小汉口”，顷刻变成了一座死城。

从这一天起，轰炸一直延续到九月初三。宋埠附近的歧亭镇、郝家铺、飞机场（现良种场）等地方，都先后被炸。这年八月的传统中秋节，人们都是含着泪水度过的。

烧、杀、奸、掳

这年九月初四，更加深重的灾难又来临了。从安徽省立煌县窜来的大批日军向这里急进，宋埠地区全部沦陷了。

日寇侵占宋埠后，就用铁丝、大缆绳套住屋梁，然后用汽车将未遭轰炸的房屋一一拉倒，并纵火焚烧，几天几夜，烈火不熄。日军初进宋埠，这里已是一座空城，几乎没有人迹。因此，它们的铁蹄就伸向了乡村，魔爪指向了农民。铁蹄踏处，肆无忌惮，烧、杀、奸、掳，为所欲为，发现粮食，全部抢光；见了鸡犬，一律逮尽；看到难民逃跑，立即抢杀；遇着妇女，不论老幼，强行奸污，有的被轮奸。

一次，日军窜到周家楼，将人民财产抢劫一空后，放火烧毁了全垸的房子，后又闯到胡家畈，抢走粮食，拉走耕牛，还将三百多间房屋烧光；伍家冲程本润因染袜子，有口煮袜染色的大镬铁锅，鬼子以为是中国军队留下的行军锅，于是将他家的房子烧成灰烬；在屈家巷鬼子一次捣毁民房七十多栋。一天，拜郊城一个外号叫陈狗儿的青年被鬼子发现，当即用刺刀刺死；陈云国的母亲躲在水泥沟山上，被日寇搜出，欲行强奸，他奋力反抗被枪杀，界桥垸一个叫“鳝鱼”的青年被鬼子从万仞岩搜出，也惨遭杀害。一九三九年春季的一天，日寇打掳到独山，一孕妇被追逼到三屋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进塘中，鬼子硬是从塘里把她拖起，进行强奸；一次，野鸡岗周杨冲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上山砍茅柴，被鬼子发现，对其进行轮奸。

后，用刺刀捅死；医师刘××的女儿被鬼子轮奸后，造成终身残废；七十多岁的王四奶留在家中也不能幸免，仍遭鬼子强奸。

“本部”内幕

鬼子兵盘踞的所在地“本（日语读洪）部”，老百姓通称“洪部”，这是一个杀人的魔窟。“本部”先是设在宋埠镇龚家塘附近（现棉花采购站），于一九三九年搬到屈家巷。真正的日军就驻在“本部”里边。起初，常驻一个中队的兵力，约一百余人，以后逐渐减少，只驻一个小队，约三十余人。“本部”以外，有“保安大队”、“宪兵队”、“便衣队”等鬼子装束的日伪汉奸兵，中国人民统统称它为“棒棒队”。

日军的“本部”，除了操纵指挥日伪县政府的一切活动外，再就是大肆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凡是捉到“洪部”去的中国人，必遭杀戮，十无一还。而鬼子施行的杀人手段，极端毒辣残忍，灭绝人性，天地寒心，仅概略揭露其十二种：

一、“本部”在宋埠镇，在屈家巷都设有专门杀人场。杀人场上树着两棵杉木桩，将被害人用钉钉在木桩上，蒙住眼睛，先由军犬撕咬，最后用刺刀捅死。新四军战士，铁门区人陈洪咏同志之死，就是痛楚的一例。

二、宋埠街沈老四的娘，是一九三八年冬，被日军用火活活烧死的。

三、一个放鸭子的无辜百姓被绑在宋埠南门外举水河沙滩木桩上，被鬼子当“靶子”，练习打靶致死。

四、郝永太商店老大郝志高，因“大万案”（大万村万孝浩等人处死一日军官）株连，日军将郝的头、两手、两脚分别绑在五匹马套上，让其撕裂而死。

五、由于铁门区大万村民处死一日寇后，日寇以百倍的疯狂来屠杀中国人民。一次他们捉了一批铁门岗的人，押解到屈家巷杀场后，强迫被抓去的人自己挖坑，并撒上生石灰。然后，将其推入坑中，先呛伤，后活埋。有段时间，宋埠文昌宫前广场上，几乎成天有人被活埋。

六、闵集乡王家细坑农民王义成搞了一个假维持会，曾诱骗日军到东山吃了败仗后，回头捉住王义成等四人，押到宋埠，在城墙上活活用铁钉钉死。

七、一次，日军捉到一个姓舒的所谓“新四军嫌疑者”之后，在宋埠绑在十字架上，边审问，边零刀细割，直至割死。

八、日寇在文昌宫挖了个大坑，内面灌满臭水，在坑的周围装上铁丝网。日寇将抓去的人，推入坑中溺死者不计其数。

九、日寇用牛皮弦捆住被害者的两个大拇指，吊在高架子上，然后猛地松弦，让人跌摔地上，反复几次，直至摔死。

十、令几个被害者跪在台阶上，日寇用指挥刀砍掉头颅。

十一、日寇将几棵大树用力压弯，将捉去的小孩的手脚捆在树梢上，撕裂致死。

十二、日军将捉去的人五花大绑地系在马上，然后打马拖死。

大 肆 屠 杀

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在宋埠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穷凶恶极，血债累累。

一九四〇年一个大雪天，我新四军某部，将日寇从宋埠架往红安桃花的电话线截断了。日军发现后，立即调动驻在麻城宋埠、黄陂、红安等地的鬼子兵，追踪到红安的细吴家坑，将全坑男女老少全部杀光。连一家请去做衣服的外地裁缝也不能

幸免。这个村子里幸存的，只有一个在省联中当校工的吴××和一个走娘家未归的妇女。据统计，象这样的大屠杀，先后共有受害者一千七百多人。

一九四二年三月，鬼子为了进攻湖南长沙，先在宋埠地区大量抓丁拉夫。抓到的就像穿鱼似的用绳索绑缚起来，关在暗室里。当抓到约四百人的时候，就一起押解到湖南。逃脱的只寥寥几人。宋埠照相馆袁善初的弟弟被抓去，硬是花大批金钱买个“替罪羊”换出来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认贼作父的汉奸，在螺壳潭附近的李氏祠发现中药店医师刘金溪存有西药，就咬定他是资助八路军、新四军，并立即报告了日军。于是将人称药王的刘金溪捉到宋埠“本部”，劫走全部药品，财物。将李氏祠纵火焚烧。

紧接着调集大批侵略军，半夜将螺壳潭附近的五周、李钊、杨林垸、螺壳潭等几个村子团团围住，每家门前一个鬼子兵，等天亮人们打开大门时，冷不防刺刀已逼在胸前。迫使所有男女老少到举水河沙滩排队站着，周围架起轻、重机枪。端着刺刀的鬼子，仔细审视着每个的神色，并摸肩、看手，只要认为不是农民的，就拉出去另排一队。这样，一次就抓走了五、六十人，除药王刘金溪被许多人联名具保放回外，其余的全部遇害。

同年冬天，鬼子将抗日游击队的通道，连接黄冈、红安的要冲，一度相当繁华的螺壳潭烧得七零八落。到了一九四〇年被鬼子再次放火，把螺壳潭化为灰烬。

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拜郊城项德润放了一挂鞭炮，惊动了肖家畈“本部”的日寇，马上出动兵马，把拜郊城围个水泄不通，将全城的人赶到稻场，周围架起机枪。这时，鬼子向群众嚎叫着，要把村里藏的新四军交出来，交不出就疯

狂地抓人、打人，闹得鸡犬不宁。

玩火者必自焚。猖獗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用它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终于迫使侵略者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向中国人民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彻底失败。

注：为本文提供资料的还有：汪显主、张润波、黄天保、汪厚富、袁国焰、项继成、屈佐清。

宋埠沦陷后的日伪政权机构

汪选举 胡良斌

刘世德 李 明

一九三八年，日寇飞机于古历八月初一至九月初三，对宋埠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零三天的狂轰滥炸。全城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炸毁房屋百余栋，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真是尸横遍地，血染沟渠。幸存者纷纷逃往山乡避难，家中只剩极少数老弱残废照门。这时的宋埠镇已是一座死寂的空城。

九月四日凌晨，日军以坦克、骑兵开路，掩护步兵由安徽立煌方向而来，侵占了宋埠镇。

宋埠沦陷后，日军开始留下一个大队的兵力，大约三百余人，在宋埠龚家塘建立“本部”，日语将“本”读为“洪”，故麻城老百姓称它为“洪部”。其余兵力继续向西推进。

日军占领宋埠以后，以其为据点，把魔爪伸向周围的乡村，一方面，疯狂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力量；另一方面，积极扶植地方势力，组建傀儡政权。是年冬季，由胡

伯恩、周一村、李继万、刘颜岩等地方豪绅组织维持会。维持会建立以后，还在各个地区先后建立了维持分会。各分会及其负责人是：

- 第一维持分会，辖宋埠遼，会长何传寿；
- 第二维持分会，辖汪王遼，会长何传寿（兼）；
- 第三维持分会，辖深沟遼，会长李楚成；
- 第四维持分会，辖七家庙遼，会长薛仁山；
- 第五维持分会，辖拜郊遼，会长李雁卿，陈简香（伯涛）；
- 第六维持分会，辖李胜遼，会长陈端祥；
- 第七维持分会，辖万永遼，会长范意谦；
- 第八维持分会，辖南湖遼，会长刘仲山；
- 第九维持分会，辖高峰遼，会长王子春；
- 第十维持分会，辖乌龙遼，会长王汉卿；
- 第十一维持分会，辖天齐遼，会长陈信山。

维持会及其分会是在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地方临时政权，是为日寇施行侵略暴行服务的机构。一伙民族败类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产性命，不惜充当汉奸走狗。他们向日寇提供新四军活动的重要情报，协助缉拿我抗日军民；广发告示，胁迫逃往外地的百姓返回沦陷区；强迫民众为日寇当苦力；捉拿青年妇女进“慰安所”供鬼子践踏；还倚仗权势，向百姓收租派款，为日寇提供生活及战争用品；控制食盐，搜刮民脂民膏；颁发“良民证”，妄图以此扑灭抗日烽火，等等。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商讨时局对策。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奉命赴重庆担任政治部部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政务由民政厅厅长严重代理。一九三八

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伪湖北省党政机构撤至宜昌。一九三九年秋，省政府派朱甲卿来宋埠组织建立“麻城县政筹备处”，朱甲卿任处长，刘竹移任秘书科长；内政科长刘正岩，财政科长肖开钧。张鹏冀任警察局长，还设有大队部等地方武装。各维持会均选派一部分人员到筹备处各个科室任职，共有职员百人左右。

一年以后，即一九四〇年秋，在宋埠正式成立伪麻城县政府。开始由朱甲卿任县长，改秘书科为秘书室，秘书由毛羽仪（外号毛嚏子，又名毛羽丰、毛清华）担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深入敌占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伪县长朱甲卿，警察局长（后为保安大队长）朱步瀛遂被争取过来，为革命作了些好事，朱甲卿于一九四一年底（农历腊月十五日）被日寇杀害，朱步瀛挂冠潜逃。一九四二年初由梅国祥任县长，周正书任秘书；后由万鹏任县长，石××任秘书。

与伪县政府平行的机构还有一个县党部，主任委员张沛然，秘书黄真。下设总务、宣传、组织、庶务四科。此外，还建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开始叫麻城青年协会，后改为东亚青年联盟，最后叫三民主义青年模范团。该会负责人是刘涤（雇岩）。

日军本部建立了一个能够控制、干涉县政府执行政务的组织机构。开始叫指导部，日军少尉兵滕为指导官，后叫辅导室，三好为辅佐官；最后改为联络部，林山为联络官。县长的一切决策，均需经过他们应允、方可实施。

伪县政府配备了地方武装，即麻城县保安队。县长兼任大队长，大队副执行大队长交给的任务。随着县长人选的变更，大队副先后有朱步瀛、项继民、朱正勋、余拱治。大队部下设三个中队，中队长有乐泽生、项为荣、韩敬庄。每个中队又设

有三个小队，共为九个小队。小队长有施季章、朱久兵、祝寿五等人。

保安大队还设有一个简易修械所，所长姓姜。

伪县政府的司法机构有警察局和司法处。警察局长先有张鹏骥，张调任保安大队长后，由李岛澜继任局长。警察局下设四课，其中情报课长李天才，它是伪政府的特务系统。情报主任陈端祥，情报员朱福堂网罗一批汉奸特务组成便衣队，向日寇提供了许多情报，杀害了大批爱国志士。伪司法处处长、审判官由刘惠民担任。

在伪县政府所在地——宋埠，南门龙王庙驻有汪伪暂编陆军第十一师四十团，约七、八百人。当地群众称“皇伪军”。

日寇“本部”设有“宋埠地区警备队特务班”，由陈端祥的儿子陈荣正任班长。还有一个便衣队，队长有王凯、胡树辉等，共计十余人。这些特务组织专门搜集我革命情报，破坏革命组织，杀害革命同志，抢劫百姓的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伪县政府下设四科、一所、六区、一会、一社。

四科：第一科（民政科）科长先后有毛汝梅、罗仕贤、罗西；

第二科（财政科）科长先后有肖开钧、赵炳良等，

第三科（建设科）科长程公肃；

第四科（教育科）科长刘雇岩。

一所：农林指导所，所长魏作舟，有职员六、七人。在现宋埠良种场处，划了十多亩土地，办起所谓“农业试验场”。

六区：宋埠区，区长先后有陈简香、陈端祥、黄立成、王子春、范步仁、徐正庸；

中驿区，区长林仁庭；

歧亭区，区长先后有柯后山、刘雁山、肖鳳山、刘竹移、梅国祥、罗阶；

门前垸区，区长程万里；

永河区，区长；（姓名不祥）

桃花区，区长马厚斌。

区以下设有乡、保、甲。

一会：宋埠商会，会长陈端庭。各行各业都设有专人负责；

一社：麻城县合作社，社长先后有叶照卿、黄立成。

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物资，提供军需；一是实行配给，操纵市场。它是由日寇军方直接控制的经济组织。

伪县政府下设的六区，每区都有县保安大队、县警察局的派出机构，或一个班，或一个小队，有的区还设立中队。它们一面与日寇和他们直接指挥的便衣队紧密配合，搜山打劫，破坏革命地下组织，镇压抗日军民；另一方面，横行乡里，蹂躏压榨穷苦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

日寇盘踞宋埠七年来，在军事上，对中国人民施行血腥镇压；在政治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在经济上展开大肆掠夺；在教育上，施行奴化教育。还在沦陷区，大量推销鸦片，开设大烟馆，以此来毒害麻醉中国人民。日寇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日寇侵华战争中

宋埠陷区经济掠夺种种

徐厚良 叶世棠 李德昭

历史上反动的举动，往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日寇在侵华战争中采取的“三光政策”，即是例证。军事、政治上绝灭人性的种种暴行自是世人所共睹；其经济掠夺之残忍手段亦是令人发指的。

宋埠沦陷，首先是日寇部队四乡打掳，铁蹄所到之处，翻箱倒柜，钱财、衣物、粮食，罄尽一空；鸡犬不留。宋埠城乡人民流离失所，落难逃生。初期的维持会，以后的汪伪政权建立以后，随着政权组织向城乡延伸，经济掠夺亦随之渗透。记忆所及，举其数端。

对食盐实行配给、专卖、封锁

食盐为日食三餐所必需，人体赖以生存而不可或缺的元素。日寇对食盐实行专卖配给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使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社会财富在其统摄之中。

城镇据点实行限量配给，需求紧张导致盐价暴涨。日伪即利用食盐搜刮民脂民膏，也给中间渔利者，造成了机会。汪伪政权建立之初，麻城县政府筹备处处长朱甲卿来宋埠即是抛出食盐打开局面的。筹备处的人员工资，各项经费即是在所谓“盐余项下”开支的。伪方各类人员及商人的私囊亦是盐余项

下填满的。

据点控制圈内的农村，实行物资交换。这种交换是不等价的。同时，它不是以物易物，而是各定各的价码。盐价可以由官方调升，农民不能自己定价格，吃亏的是农民。交换的渠道一是行政机构县、区、乡、保指派交换；一是合作社的经济网络合同交换；一是商行货物交换。几种渠道在收获季节齐头并进。这样，控制圈内广大农村的谷物、棉花就都囊括一空了。

据点控制圈外实行封锁禁运，以吸引物资交换。这种封锁禁运对控制圈周围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困难，盐价暴涨，有一时期每斤盐一块银元（当时一石谷只三块银元）。

鸦 片 专 卖

实行鸦片专卖是日寇企图以没有枪声的武器来进行亡国灭种的罪恶勾当。从种植到加工、贩运、专卖有一套组织机构。1939年宋埠成立“麻城县政筹备处”即设有“鸦片专卖所”，由官方公开兜售。当时宋埠的烟馆林立，仅上、下河街就有七、八家，每家至少是两盏灯、四管烟枪；最大的烟馆李漫卿的一家就有八盏灯、十六管烟枪。受害者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鬻女。筹备处的职员刘尧卿为了过烟瘾，典当老婆，卖儿卖女；有一次硬逼老婆脱光衣服去典当，老婆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偷别人的东西更是家常便饭。象刘尧卿这样的烟猴子，伪政府的职员中，人民群众中有的是。沦陷区的人是受尽了日寇糟蹋的。

洋 行

沦陷区的洋行，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洋行。它是受日寇军部直接指控并受其保护，实质是日寇军部的后勤机构。它的经

营项目围绕军需服务，以夺取物资为目的，不计盈亏。

宋埠逐步挂牌的洋行有四、五家。江商洋行搜集棉花。宋埠的棉花市场为它所操纵，每天由江商洋行发牌价。如果不按价交易，棉花没收，还要罚款；如果发现棉花外运就要受军部的制裁。万谷洋行收购皮油；工冈洋行收购废铜、锡等；三菱洋行收购皮革；三开洋行收购各类油子（蓖麻籽、菜籽、芝麻）。其经营管理办法与江商洋行相同。

合 作 社

合作社是日寇军方直接指控的经济组织。县社以下设分社。县社派有日本顾问，成立之初只有退伍军曹八百千头夫一人。1944年增派小田、中川二人。在日本人内部各有专司职责，但对合作社的一切事务，每个日本人均有权管辖；八百千头夫对日军方负责并总揽一切事务。合作社的一切活动，必须在其指控下进行；社长如果要改变顾问的部署，必须先行请示，未获批准，只能作罢。

合作社的主要任务：一是搜集物资提供军需；一是实行配给操纵市场。其具体手段是把食盐、布匹、日用百货及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控制在合作社手中，实行配给。

这种配给一是对公职人员及居民；一是对商场。对公职人员及居民的配给是通过平价推销处进行的。由平价推销处发购物凭证，公职人员的凭证是记账不付现金的，月终由工薪发放单位结算扣除月薪；居民的凭证就不相同，不仅交现款，而且卡片上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不仅限量少而且价格不平。打着抑平物价的幌子，居民没有一点实际利益，还是买高价；不足数量还须黑市场补充方可能维持生活。对商场的配给是市场上的商人，所有商人均在合作社出货，其目的是控制市场，因其

配给数量甚微，商人须自己解决货源，于是偷运、贿购、转手倒卖五花八门的黑市买卖层出不穷，日商、买办、中国商人互相串通大发横财，陷区人民，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

合作社搜集物资是其为军需服务的主要任务。它自身设置谷物、棉花等物资搜集所，大量进行物资交换；还向它的分社指派搜集任务；还通过行政的县、区、乡、保进行派购；商人为了换得物资进行黑市交易也收集物资向合作社交换。总之，为了搜集物资保证军需是不择手段的。

合作社除了以上配给、搜集物资两大任务之外，为更好地服务于军需，还开办农林试验场，试种粳稻、棉花、蔬菜等等，一方面搜集农业情报，一方面向农村推广，只管需要，不管合不合实。更为恶毒的是强迫农民在肥沃的土地上大种蓖麻，除蓖麻之外严禁扩种其他作物。为了保证种植蓖麻，还出动枪兵监视，甚至携带种子、人工自己强行扩种。使农民一季庄稼无收，陷入饥寒交迫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四十多年匆匆过去了，仍然历历在目。尽其所忆，不避挂一漏万之虞。

我所知道的日伪“麻城县合作社”

李德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农村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广大农民，所必须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则为食盐。日伪双方，利用此机，便实行垄断专卖，并规定农民须以不断增多的农副产品指数，来换取一定数量的食盐指标，美其名曰“物资交换”，

实则进行经济掠夺。宋埠沦陷初期，是由各地“治安维持会”来做这一工作。随着日伪县政府的建立，便为官办机构——麻城县合作社及其下属机构所代替。

“合作社”这个名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为挽救经济危机的手段之一。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由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过渡到集体大生产的方法之一。而日伪举办的“合作社”，从表面上看略似消费合作社，但实质上并非社员集资而成立。其资金全靠垄断的“盐余项下”而来。它标榜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实质是强迫多数的人人，来为少数的人人一日、伪服务罢了。

麻城县合作社是一九四二年建立的。此时，它的上级组织是“湖北省联合合作社”。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根据中日“军事同盟条约”，中国成为“大东亚战争”参战国之一，于是在国内采取战时体制，便将联合社改为“湖北合作总社”，社长杨伟昌，曾于一九四四年秋来宋埠巡视，并到歧亭游览杏花村古刹。因省合作社名称的变更，而县则改为“麻城县合作支社”，这一名称的变动，使伪县政府和伪合作社，无形地变成了平属关系。县支社在一、二、三区（即宋埠、中驿、歧亭）等日寇侵占的区镇，相继建立合作分社。原各区设有“农民公所”，此时物资交换的提法改成“物资搜集”，大批农村产品的收购，便移交到分社执行，并负责供给日军的生活给养，如柴、米、油、盐和各类蔬菜等等。实质上是执行倭寇“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

这里顺便补述一下，农民公所的基层组织是“第×保农事实行社”，伪保长执行农民公所下达、分派的各项任务。由此，“合作社”进行经济掠夺的触角，便深入到沦陷区的各个角落。“农民公所”以所谓“平价”“配给”各保“农事实行

社”少得可怜的日常生活用品，多被上层侵吞。农民哪能知道内幕，只得忍气吞声向农民公所交售自己的棉、粮、肉等农副产品，这样一来，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大部被掠夺了。那时，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物物交换部规定向农民交换农副产品的比价是：巴盐一斤换进大米三斤，或包谷三斤十四两（十六两制，下同），或小麦三斤十四两，或黄豆五斤三两，或糯米二斤十两，或公鸡一斤五两，或母鸡一斤二两，或鸡蛋一斤一两，或木油一斤八两，或板炭十一斤二两，或木炭三十一斤三两，或猪油三斤三两，或菜油一斤五两，或茶油一斤二两。县合作社从外地购进食盐，还要加进运费、缴用、损耗、利息、食盐附加税等开支，使食盐与农副产品的交换远远高于以上比价。

麻城县合作社（后为合作支社），是由日本军国主义所操纵的经济组织。由八百千头夫任顾问，小田和中川任协理。小田负责日报、周报、旬报、月报和收集各地的经济情报；中川负责农林试验场，这个试验场设在宋埠西门外，为推行“以华制华”的罪恶行径，他们强迫中国人大力种植鸦片等毒品。

麻城县合作社开始由叶照卿任社长，到四三年三月后，由黄立诚任支社社长。

合作社（支社）下设四课：

总务课课长朱汉英，主管生活用品和仓库；

业务课课长刘登美，主管报表和收集经济情报；

增产课课长许邦荣，主管良种试验场；

会计课课长徐耀良，主管财务收支。

合作社（支社）附设“平价推销处”（即日杂门市部），负平价购买权之拥有者，完全是汪伪县政府及其他能在二科（即财政科）会计股领取月薪的工作员。这类人，每人领有

“平价购物凭证”一式三联，此证不但是平价，而且还可赊购。平价推销处将购物凭证的第二联月终与伪县府二科会计结算领钱，然后再由会计根据凭证第二联，分别扣除购物人的月薪。至于其他人，则休想问津，即使能买，也不比市场价格便宜。

还附设一个所谓草包厂。一九四四年初，合作支社从武汉购回一批木质打包机，厂房是征用的。工人是临时雇用的街道妇女，本来就没有织草包的技能，开工一个多月，仅织了几十条草袋。因数目太少，也无法向别处推销。而强迫征集来的稻草，也成为一堆腐朽的垃圾，自此结束了短命的草包厂的生命。

我当时虽在合作社做过一段事，由于年长月久，加之年老记忆减退，有些情节记忆不太准确，请熟悉内情的同志给予补充斧正，使这一资料趋于完善。

王家细湾的劫难

王 杰

王家细湾现属麻城市关厢区闵集乡的熊家岗村，距闵集街约一公里。

一九三八年农历九月三日，盘踞在冯家墩的日寇到闵集“打掳”。它们铁蹄所到之处，人们就要遭殃，生命无端被杀戮，财产受掳掠，眼看日军就要进王家细湾时，突然从人群中走出四位农民，对日军点头哈腰：“请太君手下留情，我们愿意替您维持”。这四人是王家大湾与王家细湾临时推举出来的农民王义成、王晓芝、王春荣、王彬富。经过他们四人的一番

周旋，这两个湾子才幸免于难。

一九三九年春，日军进东山（白泉山）扫荡，走到闵集地界，先找王义成等询问东山有没有“匪”。王义成等为了惩罚这些日军，让鱼儿上钩，立即答道：没有。于是日军大摇大摆，人喊马嘶地向东山开进。他们刚接近“打雁尖”时，山上响起了枪声，紧接着“哒哒哒……”的机抢声也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原来是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八十四军（广西队伍）正居高临下对日军进行阻击。这一下打得日军人仰马翻，仓皇后退，刚退到山口，又遇上国民党县自卫队截杀一阵，它们不得不拼命突围，剩下的残兵败将逃到王家细湾时，经清点死亡的日军达一百多人。日军的这次挫败，他们把帐记在王义成名下。

穷凶极恶的日军，马上把王义成等四人五花大绑，由冯家墩押往宋埠。在一次维持会长的会上，他们宣布王义成是搞的假维持会，将王义成的手脚钉在城墙上，活活钉死。接着又把王晓芝等三人一一打死，埋在一个坑里。

残酷的日军，办死王义成等四人还不甘心，他们继续利用国民党军顾金芝组织的三乡联防，再次向王家细湾伸出魔爪，由汉奸徐少卿引路出面，捉去王家细湾的无辜百姓四十余人，一起捆押至阎家河的太子庙，罚款二千多银元，王家细湾的户长王润之（教书先生）说了一声：“只怕拿不出这么多钱”时，匪军当场将王润之用刺刀捅死，鲜血淌了一地。接着对被捉的群众一一宣布，某人罚款多少，并令其家属，携款来领人。在家的家属有的送布匹，有的送棉花，有的交银元，更有的向亲戚向朋友挪借，为救亲人，倾家荡产的不少，人们发出这样的呼号：

王家细湾受折磨，亲人的鲜血淌成河。日军杀，汉奸讹，

国军来了也要得多。刚说下坂去，又喊把人捉，捉得鸡飞狗跳窝。白天慌，夜晚躲，提心吊胆过生活。这种日子何日了？哪天才得不受磨！

日寇铁蹄在料棚

李成彬

1938年9月4日麻城沦陷，顺河集区的料棚和汪家大垸也来了日伪军。这些家伙，成天四处游荡，烧杀奸掳，无所不为，称之下乡“打掳”。出发之前号炮三声，以示威风，这样，人们也就知道日寇出发了，从而弃家逃遁，密藏深山老林，但家里猪、牛、羊被宰杀，粮食被糟塌，财产房屋被烧毁。在家的老人有的杀在村旁，有的死于野外，有的投塘自尽。总之，在日寇蹂躏之下，人们遭受的苦难，惨不堪言。如此猖獗，人们忍无可忍，因而设法放火烧掉了黑门的木桥，以断日寇“扫荡”的交通要道。日寇知道后，大为恼火，叫嚣什么是周家楼一带“八格鸭路”（指八路军）干的，必须“扫荡扫荡”，“杀了杀了的”。1939年农历2月20日清晨，日寇带着日伪汉奸向周家楼一带“扫荡”，刚过黑门河，发觉一群逃难的群众躲在周家楼西冲密林中，立即开枪扫射，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草丛内，39名群众倒在血泊中。并将周家楼12户的一个院子烧光，牵去耕牛19条，猪、羊、粮食杀绝抢光。有一幼女被轮奸致死……。

周家楼遭受这次沉重打击以后，真是哀鸣遍野，惨不堪言，孤儿寡母大部沦为乞丐，有的挨亲靠友，有的外出帮工，

有的草率地在原地安个家，春耕季节到来，无牛使用，群众无奈，请维持会长陈则英跟日寇商讨讨回耕牛，日寇要200斤糯米换一条耕牛，糯米照数付齐了，但结果还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这些鬼子还骂：“中国人，良心坏了坏了的。”这句话回敬日寇倒是恰如其份的。

求 孙 埠 惨 案

余品璋

一九四二年冬，盘踞武汉、宋埠一带的日寇，集结两万余人马，兵分黄、麻两路，向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立煌县（现金寨县）急进，对大别山区进行疯狂扫荡。日寇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使大别山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

是年冬月二十一日黄昏，国民党三十九军五十一师的整师人马，从红安七里坪经麻城阎家河向东山进发，其先遣连押解近百名民伕已抵达求孙埠宿营。随后跟进的两个团在老塘象驻扎。求孙埠现属龟山茶场李家畈村，过去系东木通往麻城的必经之路。此地有一小饭店和一个染铺。一个木凉亭位于河边，供过往行人歇息。一百多民伕在另一地方卸下担子后，全部被赶到染铺过夜，隔壁饭店里驻有部分兵士看守民伕。当晚，七千余日寇从白果经大坳，翻险道山向东木方向行进。至大桥边邵家一个油榨处，抓了几个东木在此造皮油的油匠为其带路。油匠意欲将日军引向麻城方向，带出山外。半夜时分，日军到达了求孙埠，发现求生埠和离此不远的李家畈驻有国民党的部队时，立即进行了包围。顿时，李家畈枪声骤起，日寇放火烧

房，打死了国民党的部分兵士，还将村民李千弔夫妇和一个小商贩拉到村头稻场用刀刺死后，放火焚尸。顷刻间，火光冲天，烟雾弥漫，喊爹哭娘的声音撕裂着夜空，惨不忍闻。接着，有三名头带钢盔，身背短枪的日军军官，带领一批鬼子，踢开关押民伕的染铺和饭店的大门，用华语大喊“投降，投降！”遂将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士兵和民伕，一个个地叫出，用绳索串连起来，全部押到凉亭西北角的干沙河里。民伕兵士自知面对陡山，背对枪弹，身缚绳索，已是走投无路，命在旦夕。因而瘫软在沙滩上，嚎啕不已，喊爹叫娘，泣不成声。刹时，鬼子一声咆哮，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人群进行扫射，沙滩上顿时骨肉飞溅，血流如注。尔后，日寇手握刺刀，在尸堆内逐个拨动，如发现稍有动弹，即刻猛刺。这时，现幸存的张远贵同志，亦在尸骨堆内。由于层层尸体压盖才免于中弹，但日寇检查尸体时在他面额上连拔三刀，至今仍留下三道伤痕。约摸过了半个小时，乘日寇离去之机，张偷渡小河，登山远去，才保全了性命。据他回忆，仅在求孙埠沙河里，被日寇一次用乱枪打死的就是有一百多人。

日寇对求孙埠疯狂地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顺河西下，行至离求孙埠约五华里的老塘汭、测陆潭时，恰与国民党三十九军五十一师后续部队的两个团接触，双方展开了激战。由于国民党军寡不敌众，两个团的兵力迅被全歼，尸横遍野，不计其数。

回忆当年，在求孙埠的殉难者，不论民伕还是国民党的军士，全是血气方刚的中华男儿，上有父母，下有妻儿。适逢春节将至，家家盼望骨肉团聚。谁知一夜之间，惨遭杀戮。一命呜呼，死无葬身之地。孤魂独魄，游荡他乡，此情此景，正是：“瞬息天昏地若崩，腥风血雨卷乌云。可怜堆骨求孙埠，

犹是深闺梦里人。”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麻城人民，对中华民族欠下的累累血债，真是罄竹难书。

资料来源：①据求生埠惨案受害者、现黄土岗村民张远贵同志口碑；②据求生埠被日寇杀害的李千书之长子李意丛口碑，李意丛同志是求生埠惨案的目击者。

我在麻南敌后抗战的一段经历

刘永贤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原地区，我鄂边区党委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为打通长江以北鄂皖通道，与华东新四军兄弟支队沟通联系，于一九四〇年三月，组织了以张体学、刘西尧为领导的鄂东纵队独立团。根据边区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形势，鄂东地委决定开辟麻南（黄安、麻城、黄冈、黄陂四县交界地域）敌后根据地，组织武装抗日反顽斗争，建立税收机构和地方政权，以保证汉麻公路中段我军的交通安全和抗日部队的给养。同年十一月，鄂东地委领导人刘西尧同志，将我从鄂东纵队独立团抽调出来，委任为鄂东麻南办事处主任兼税务第四分局局长和安麻独立营副营长。按照鄂东地委的指示，我带领小方等七位同志和三条半枪，到麻南开展敌后工作。

麻南地区，北迄中馆驿，南抵五湖，东起潘塘，西至八里垸，地处交通要冲，历来为敌人重点驻防之地。宋埠，为麻城日伪县政府的所在地，日本侵略军一个大队的本部（“本”，

日语读“洪”，故老百姓称“洪部”）也设在这里，约三百余人兵力，以后减至百余人。“本部”以下设有宋埠地区警备队特务班，有十余人的便衣队，伪县政府设有保安大队，伪警察局情报课也组织了一支便衣特务队。此外，在歧亭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伪保安队的一个班。仓子埠、柳子港、李家集、中馆驿、郭三屋垸、门前垸、永家河、桃花等地均有日军据点。犬牙交错，日伪布防相当严密。而我方，包括曾朗廷的便衣队在内，总共只有二十多人，十几条枪，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因此，只有依靠群众，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在这里扎下根来，打开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是年底，我带着队伍从陂安南回到家乡歧亭一带开展工作。夜间到达张家洲，正好当地维持会会长张楚良在祠堂里开大会，内面敲锣打鼓，搞得很热闹。我通过熟人将张楚良叫了出来，他见我后，很是恐慌。我忙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们新四军回来了，你这个维持会长要注意接待我们，掩护我们，还要为我们工作。你可以三面维持会长的身分，既可应付日本人，又可应付顽军。有情况要及时向我们报告”。张连声称是。我们让他回祠堂继续开会去了。接着，我们又摸到歧亭乡找到伪乡长李柏池。我和李同住一个小镇，从小就认识。先向李交待了我军的政策后，希望他利用伪乡长的身份，为我们工作，注意收集日伪顽军情报，当好我军耳目。经过一夜长谈，终于将李乡长争取过来了。歧亭附近余家寨，有个邓汉平，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副营长，因官场失意，退役在家。但他家境贫寒，有一定的爱国心，又是汉流邦会组织的三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活动能力。还有一个叫张国东的青年，革命热情很高，政治上也比较可靠，决定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继之，

我们又大胆地吸收了如杨德敬、贺永善、陈宏咏、罗七姐等一批抗日热情较高的同志参加活动。至此，新四军在歧亭一带有了立足之地。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离敌人据点较近的地方，我们多于夜晚进行活动；离据点较远处，则白天开展工作。汉麻公路两侧，村落较为密集，我们走村串户，一天要活动好几个村庄。每到一地，首先布置哨兵警戒，然后通过熟人串联。或上门做工作，晓之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或组织小型会议，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方针。这样，群众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都说“刘永贤带着新四军队伍回来啦！”穷苦百姓都觉得有了依靠，心宽胆壮。抗日烽火点燃了，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又适时地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使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接着，以麻南办事处的名义，到处张贴布告，并利用庙会、戏场等群众集合场地，采取不同形式，有时散发传单，有时作公开演讲，宣传我党的十大抗日主张和税收政策，造革命舆论，长人民志气，大煞日伪顽的威风。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新四军在麻南的影响愈来愈大。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初步打开了麻南地区敌后抗战的局面。一九四一年春夏之间，鄂东地委又组建了安麻县委会和安麻行政委员会，开始由张正亚任书记，后由任士舜同志继任县委书记，董绍铭（董必武同志之侄）任县长。同时还建立了工委，陈志远同志任书记，我任安麻行政委员会委员、工委委员兼工委党支部书记。分工主管军事和税收工作。

在敌后开展税收，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十分尖锐。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有一股虎劲，加之，广大人民群众是爱国的，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坚实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一个又一

个的困难，使税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首先，建立税收工作队伍。为加强麻南的税收工作，上级派钱运华同志任第四分局副局长，选派了熟悉财税业务的张厚珠同志任会计，并将曾朗庭同志的便衣队改编为麻南办事处警卫班。我们在当地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为税收人员的基础上，还争取了一些伪政府的税收人员为我们工作。例如，伪税收人员巴荣青，在歧亭一带征税时，欺侮穷人，对肩挑背驮的小商小贩纳税过重，群众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我们把他杀掉。为了贯彻刘西尧同志“采取‘老瓶装新酒’的方法，开展敌后税收工作”的指示，我们立即抓住巴荣青，揭露其欺压群众的行为，宣传我党坚持抗日的道理和主张，向他指出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出路。通过教育后，把他放了。巴荣青受到我党政策的感召，逐步向革命队伍靠拢了。按照我们的意见，做了不少工作。如经常向我税收人员汇报敌情；将其收缴的税款大部上交给我税务第四分局，留下一些送伪税务局交差；我方人员还利用巴的身分证章在歧亭汉麻公路上公开征税，即使碰上了日本人，只要说一句“一字凯的”，日本人不仅照章交纳，还翘起大拇指说：“大大的好！”这种以敌人的名义，实为我方公开设卡纳税的方法，创造了敌后税收工作的先例。后来，贺家富、杨德敬等同志都按这个办法，在汉麻公路上增设了几个税卡。最后，巴荣青也成为我方的税收人员。通过改造、争取敌伪税收人员，利用他们的旧机构，现班子为我们做税收工作，发挥了“老瓶装新酒”的作用。这样，我们的税务人员增多了，力量加强了。为适应税收工作的需要，我四分局建立了以小方同志为队长的手枪队，共有十余人枪；地委又选派了张波为队长的手枪队，二十余人枪，协助我们的工作。后来，建立了一个有五、六十人枪的税警中队，保证了税收工作得以顺

利进行。

第二，设立税收机构。四分局下设税务所，税务所下设税卡。我们首先在歧亭建立了第一个税务所。开始由贺家富任所长，后由杨德敬继任所长。杨曾被日寇抓去，经过严刑拷打，但他只字未招，立场非常坚定，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宋埠城内，设有一个税务小组，负责对城内坐商的收税工作。后来，在潘塘、夫子河、古龙集、三店、桃花、谢店、八里垸、五湖等地相继建立了二十多个税务所和四十多个税卡。

第三，开展税收工作。起初是下条子。我们派员到各地摸清当地富裕户、殷实户的基本情况，然后开条子。封面上写着“上芒下芒，救国公粮”，内面写上某人姓名，限期交款多少。并送达某地交某人收。这样搞了一个短暂的时间，收到一定成效。但远远不能保证我军的给养。后来，我们决定争取一批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人物来为我们做工作，以扩大税收范围。开始，由工委书记陈志远等同志负责，找当时的伪县长朱甲卿、伪保安大队长朱步瀛进行秘密谈判，并且达成了协议。二朱被争取过来后，为我们做了些工作。后因失密，朱甲卿被日寇杀害，朱步瀛也逃跑了。我们又选择了宋埠猪行老板陈良汉为突破口，设法做他的争取工作。陈为汉流邦会成员，在宋埠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于是我带领一个班，夜里摸进陈良汉的家里，捉住后将其眼睛用黑布蒙上拉了出来，带着他在歧亭九骡山一带转了一个星期，边转边给他做工作，终于将他争取过来了。陈表示支持我方在宋埠开展抗日救亡和税收工作，并动员商人向我方交税。我们以后通过陈良汉出面做工作，迅速打开了宋埠税收工作的局面。那时，宋埠有两个日本商人，专做土特产品的倒卖生意，他们将牛皮、猪鬃、牲猪等运往汉口，牟取暴利。过去，无人敢向他们征税。后来，我们命令宋

埠伪税务局的我方人员出面，向日商纳税，日商因惧怕我们没收其货物，只得乖乖交了税款。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在麻南敌后的工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一批优秀的热血青年，积极同我们一道战斗，最后成为我们忠实的同志和朋友。如罗七姐，系中共党员，她丈夫为税卡卡长。他们夫妇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后为革命英勇牺牲；陶幼臣，歧亭人，做过检查税务，搜集情报的工作。他经常深入敌人内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争取敌伪人员弃暗投明，历经艰险，成绩显著；外号称“无字天书”的陈德堂同志，在五湖一带开展税收，工作非常积极，为四分局征得了很多税款；贺永善，歧亭人，曾任我的警卫员，后为手枪队员，机智勇敢，忠于革命；还有张国东、杨德敬、陈洪咏、李斗安等同志，均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好同志，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艰苦工作，才使我们的税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一九四一年一、二月间开始收税，每月税款只有几千元法币，后来每月税款收入增加到两、三万法币，还有部分银元。根据鄂东地委的指示，我们严格遵守财经纪律，所收税款及时派手枪队员护送，由经济交通员直接解交给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同志那里，所有开支，由他统筹安排。麻南的税收工作，有力地保证了鄂东抗日部队的给养。

根据鄂东地委的要求，帮助建立“三三制”地方政权，是我们麻南办事处的又一工作任务。它既能领导群众与敌人开展持久战，又能保证我方征粮筹款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物色了一批信任我党我军、在当地有一定名望的人物到伪政权中任职。如王子义，歧亭人，他是接近我们较早的抗日积极分子。我们就让他出任伪桂家岗商会会长；还挑选了进步人士赵彩练为方山乡之我方付乡长；张国

东为歧亭乡我方乡长；之后，派一姓陈的同志（名字忘了）为宋埠区我方工作人员。

“三三制”的地方政权建立后，普遍推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使革命形势进一步好转，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为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我们一手抓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一手开始锄奸活动。

一天晚上，铁门大窑寨附近一个村庄搭台唱戏，我们事先得知日寇“本部”豢养的几个密探，要来戏场敲竹杠，企图捞油水。平时，我们已将这些密探的姓名、家庭住址，平时表现和罪恶事实等主要情况都摸清楚了。于是，唱戏以前，作了周密部署，派部队和群众中的抗日积极分子把守来往交通要道。天黑后，五名密探果然混入了戏场，我们即以两人盯住他一个。开演前，我和罗七姐均登上了戏台，她先讲话后，由我宣讲抗日形势。最后，我宣布说：“现在，有日寇的汉奸、特务混进戏场来了，企图捣乱，破坏抗日。大家不要怕，不要乱了秩序，配合我们抓住汉奸。”台下的五个密探一听就慌神了，开始往外挤，但已来不及了，全部被我们逮住。这时，戏场又恢复了平静，好戏开场了！我们带着这五名密探到村子里审问。我打开小本，将他们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和罪恶事实一一数了出来。密探吓得象筛糠一样，一个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最后我对他们说，论你们的罪行，死有余辜。但新四军以宽大为怀，只要你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为新四军提供情报，我们表示欢迎。他们一一接收了我们提出的要求。将其放回以后，按我们指定的地点，多次为我方提供了情报。

我铁门情报站站长陈宏咏之子陈远耀，充当了日伪汉奸，参加了本部便衣队。其父陈宏咏多次向组织提出要将儿子从本部拉出来。我们考虑，只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还是让他留在

本部有利。遂决定让其父亲做儿子的工作。结果陈远耀被教育过来了，也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还有伪保安大队长项济民，我们了解到他是“汉流”成员后，即派邓汉平以其“汉流三爷”的身分，进宋埠与项秘密会谈。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达成协议。项同意我们提出的三条要求，即掩护我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在宋埠开展工作；为我方提供敌人情报，不搞敲榨勒索等等。我们还选择了伪军中表现较好的郑德昌、朱友斌、杨福田等五人，派张国东将他们拉了出来，交待了具体任务，让他们当“钉子”，做“内线”，为我们工作。

对于死心塌地投靠日寇的铁杆汉奸，我们决不心慈手软，坚决铲除。伪县政府情报主任陈端祥，其儿子陈荣正是日寇本部所辖“宋埠地区警备队特务班”的班长，父子狼狈为奸，投靠日寇，深得日军小兰队长信任，杀害了我们很多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是万民痛恨的父子汉奸。于是，经与地委联络科科长王建平等同志多次研究过，决定铲除陈氏父子。以后又找张国东、邓汉平等同志商量，大家认为采用“离间计”，借日寇之手杀掉陈氏父子较为有利。于是，让张国东利用我方有一位同志与陈端祥的儿子陈荣正是同学这一关系，借机上陈家玩，将我们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带至陈家，巧妙地夹在他的书中。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新四军欢迎陈家父子与抗日政府取得了联系，鼓励他们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等等，信尾署了一个假名字。张国东从陈家出来以后，我们又写了一封检举信投进了日军的告密箱，揭发陈端祥父子私通新四军。日寇收到密报后，立即赶往陈家搜查，果然搜出了陈家父子所谓“通共”的书信，便信以为真，立即将陈端祥、陈荣正父子解往何家河堤刺死在一个坑内。消息传开，人人拍手称快，有人给他父子写

了一幅挽联：

端偏不正，在维持会虐民，在区公所虐民，开始亏弟兄拍马；

祥变为殃，到县府不准保，到洪部不准保，临终要父子摸鱼。（注）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我奉调到鄂东纵队司令部工作。我离开麻南后，日寇黄陂本部派来一支特务队到宋埠、歧亭一带从事镇压革命活动；加之，我方工作上出现了漏洞，使革命队伍遭到了沉重打击，我政府、地方工作人员，税收大员、武装干部及来往过境交通人员被敌人捕、杀达数十人；财政税收网络几乎被破坏殆尽，税款收入下降。一九四二年初，鄂东地委又派我回麻南参加攻打宋埠的战斗。

为迅速恢复麻南地区的工作，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同时解决我方经济困窘状况和军用物资问题，区党委决定攻打日伪麻城县政府的所在地——宋埠。并派师付政委任质斌同志率领的特务团和三十九团，来到两道桥，与我们鄂东纵队会合。任质斌、何耀榜同志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了边区党委关于攻打宋埠的决定。会后，令我率纵队警卫连，从两道桥出发先行，其任务是：找一可靠向导，了解敌伪兵力部署情况，选择攻城地点，作好攻城准备。主力部队负责封锁郝家铺本部和歧亭刘结子河的日军据点，从西北方向进攻宋埠。我找到地下交通员李斗安同志当向导，掌握了宋埠西门警戒稀少，又系伪县保安队防守这一特点，就选择西门为攻城目标。进攻命令下达后，我们很快登梯进了城内，俘虏了敌人一哨兵和保安大队付队长朱振勋，迅速打开城门。接着，我军三十九团、特务团也打进城了。日本鬼子吓得钻进地洞不敢出来。我军很快包围了伪保安大队部，从侧门攻了进去，打死了伪分队长夏巧桥，缴获了

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布匹和生活用品。整个战斗，只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战斗结束后，我们集中了被俘的日伪翻译、伪县府秘书毛明荣、伪政警人员、商会会长，伪保安大队兵士及一些豪门绅士和商户老板，约两百人，将他们带到两道桥，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教育，向他们交待了我军的俘虏政策，指明出路，谁要继续顽抗，与人民为敌，充当汉奸走狗，我军将严惩不怠。一星期后，经纵队领导批准，将这批伪虏，全部放回。这次战斗，在敌人内部发生了强烈震动，在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发展，为恢复麻南的工作创造了条件，使这里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抗日战争距今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我也成为年近古稀的老翁。由于记忆日渐衰退，有些情节难免有误。请当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战斗过，而今又健在的老同志、老朋友和熟悉这段历史的诸位同志补充更正，使这段史实日臻完善。

（注）这幅挽联词是后来听群众所讲。

作者原为福州军区福州空军基地付主任，现离休。

民族勇士万孝浩

张良钧 张远亮

万孝浩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暴勇士。生于一九一一年，卒于一九五二年，字胜东，铁门岗乡大万村人。幼丧父，其母纺织为生，家际贫寒，未能入学。至二十岁时，以屠宰为业。他幼年助母谋生，在艰苦的岁月中磨炼出一身虎劲，过早的成熟，养成了憨直豪爽的性格，慈母的教诲，造就了他尊老怜幼，爱

国爱家之心。

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宋埠镇，鬼子兵到处烧、杀、奸、掳，四乡八里惨遭蹂躏，家无宁日，民不聊生。离宋埠仅数里之遥的大万村民，更是倍受凌辱。日军天天骚扰，激起了全村民众的公愤。为了抗暴，该村于十月六日晚召开了抗暴的会议，组织者是万孝浩、万仁山，参加会议的人达四十余众。会议决定，每四人一班，站岗放哨，倭兵将至，报讯传音，给予严惩。并提出：“国不安，民不宁，可恨日本兵。不灭鬼子威风，不算中国人。”

十月七日十时许，一日寇军官（官职不详）身佩指挥刀，腰挎盒子枪，牵着军犬，押着挑夫，从宋埠方向来大万打掳。此时，站在村口放哨的万孝金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值班的万孝浩、万仁山、万玉清、万正富四人，他们立即带刀出迎，跟踪鬼子，伺机下手。

那鬼子进入一家庭院，纵放军犬，扑咬鸡鸭，并猫腰入室企图发泄淫威时，万孝浩火高万丈，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抱住后腰，扭头朝后高喊：“还不动手，待等何时？”

鬼子遭此一击，一怔之后，继而镇定，忙伸手掏枪。孝浩死抱鬼子不放，并使眼色示意同伙朱维新（万的好友）动手。朱维新用宰牛刀对准鬼子掏枪的手猛砍一刀，鬼子痛的哇哇直叫，并用脚乱踢。军皮鞋接连踢在孝浩小腿骨上，鲜血直流。他强忍疼痛，接过维新手中的刀子，照着鬼子的前胸捅了进去。随着一声嗥叫，黑血直喷。那鬼子折腾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

为了防止日寇的反扑，万孝浩和大万村民众机智地将尸体连夜转移。当时国民党王啸风部队和保安团黄雨庭部，均驻扎在附近，于是将日本军犬交给了他们。此后，万孝浩遭到日寇

的通缉，大万村民众耽心他的安危，劝其暂时投奔黄雨庭名下避难，他被迫应允。抗战胜利后，即旋归故里，从事农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病逝于大万村。

万孝浩一个普通平民。虽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忠义爱国之心，虽不是炎黄子孙之人杰，亦堪称中华民族之英雄，其精神为子孙倾倒，其事迹为后人景仰。

智 溺 日 寇

黄昌益

一九三九年七月，盘踞在宋埠的侵华日寇，窜到白果一带烧杀奸掳，无恶不作，沿途百姓被迫逃离他乡。一个掉队的日本兵，在大路上东张西望，缓步东行。将上白竿岗时，被白树寨的农民罗启福、罗先义发觉。这个日本兵头带钢盔，身挂手榴弹，肩荷步枪，罗先福等先前误以为是国军，怕他被日寇发觉，打算叫到垸里来避一避。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日寇。罗先福附耳对罗先义说：“想办法叫他见阎王。”先义会意地点了点头。罗启福把手一扬，这个日本兵就拢来了，并向他们打手式询问日军大队去向。日军明明东去，罗先福他们反指向西。遂将这一鬼子引到白木寨，诱至茯苓岗庙里。这家伙一看锅里还有冷饭，即打手式要炒油饭充饥。罗启福在炒饭之机对先义说，“时候到了，快把垸里罗文右叫来”。待先义他们回到庙里时，罗启福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炒油饭，送到日军面前。当日军起身接饭碗时，罗先义和罗文右一齐上前抱住了日军，罗启福急忙缴下鬼子携带的枪支弹药，剥去身上的衣服和皮靴，用麻绳将其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拉到庙后马家看管了

一夜，第二天又玩猴把戏似地牵到楠竹坑监守了两天，打算押送到龟头河交伪县政府处置。但这一连三天，日寇调集了大批兵力在白果附近乡村寻找落伍士兵。罗启福惟恐敌人发觉，待到第三天夜晚，遂将这一日寇身上绑了一块大青砖，沉入五世祖大塘里去了。待到半夜时候，罗启福等人恐怕敌人尸首露出水面，再次到塘边去看一看。不料，这个家伙挣扎着从水里爬到了岸上，滚了一身泥巴。罗启福等人吃惊地说：“你还不想见中国的阎王爷呀？”遂再加上两块青砖，第二次溺入塘中，才结束了这一侵略者的性命。这一事实距今虽已四十余年，但罗启福、罗先义、罗文右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地人民群众之中广为传颂。

郝家铺教案始末

宋埠区志办

鸦片战争失败后，腐败的清政府被迫接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系列卖国条约，屈从其“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狂妄要求，帝国主义列强乘机侵入中华国境，利用种种合法身份，设租界，开教堂，占我国土，夺我财宝，侮我民族。他们不仅进入了我国的各大城市，竟然渗透到中、小城镇和乡村。如瑞典所谓传教士梅保善、乐传道（化名）来到宋埠辖区郝家铺，披着基督教传教士的外衣，干着反对中华民族的罪恶勾当，就是其中一例。

清末，光绪十八年（即1893年）五月十八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大端阳。宋埠镇与郝家铺之间有一条干沙河，四乡八畝的群众聚集到这里做龙船会。会场里，有赛龙船的，比武

术的，唱大戏的……，热闹非凡。这时，梅保善、乐传道两人，诱骗当地两名少女一郝××、郝××，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也凑在群众中看热闹。当地群众对这两个家伙，为非作歹，凌辱良家妇女的罪行早有所闻，仇恨的种子已深深地埋在人们心中。爱国志士屈子厚，曾作歌谣，揭露所谓传教士在宋埠地区犯下的罪行，唤起民众与其进行斗争。龙舟会前，由屈组织了一批爱国人士，伺机惩办作恶多端的“洋教徒”。当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欺侮我们时，人们已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有的怒目相视，有的唇枪舌剑，痛加指责。梅、乐自知没趣，龟缩到教堂，关上了大门。有一少年，出自好奇，爬上教堂窗户，想看看“洋人”在内干什么。正在这时，梅、乐猛地将大门打开，将少年拉了进去，依然把大门关上。有人看到这一情景，大喊：“洋人抓人了！”喊声飞进了会场，人们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燃烧的怒火，“打洋人罗”的喊声响成一片，一齐冲向教堂，撞开了教堂的大门。梅、乐见势不妙，连连后退。拔出手枪，指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就在这即将导致流血惨案的瞬间，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实汉子挺身而出，一个箭步纵身来到两个刽子手面前。他叫徐全福，宋埠张徐家垸人，自幼聪颖过人，喜舞拳弄棒，并得名师指教，至而立之年，其功夫已达上乘境地。时年，他为张、徐两姓的武教师。常以“学武最重武德，不可无故生事”教育弟子，并说：“这并非胆小怕事，我觉得中国人打中国人，不算好汉，只有敢于对付侵略者才算英雄。”现在正是他用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只见他用钢钳般的手抓住了梅保善持枪的手腕，扭至身后，一只粗壮的腿蹬在梅的背上使劲往下压，痛得梅哇哇直叫。乐传道急忙将枪口转向徐全福，正欲扳动板机，忽地飞来一脚，将乐的手枪踢出老远。这个勇士就是李金狗，本名

李培祥，系现铁门金鸡李大有寨人。自幼受著名武师李东福的真传，练得一身过硬本领。东福师傅“练就真功，一来保国家，二来习勤劳”的教诲在他的心田里扎下了根子，所以，在这生死关头，他毅然挺身而出，紧密地与徐全福配合，与两个侵略者格斗起来。这时，又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他就是新洲县三店区孔三垸人，在家排行老五，人称孔五苗子，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见此情景，也参与了战斗，只见他们三拳两足，将恶贯满盈的所谓传教士打倒在地，在场的人众蜂涌而上，将两个侵略狂人活活打死了。

龙船会变成了审判会。当地群众处决了这两个坏家伙，振奋了民族精神。人们簇拥着三位英雄，带着胜利的喜悦，各自散开去了。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外国领事馆要一百个“凶手”人头的无理要求，下令湖北总督转令麻城知县张吉庆办理。张一面晋省要求减缴人头，缓期办理；一面派出衙役，四处追寻“凶犯”。徐全福、李金狗为不连累乡亲，分别上县投案自首。英雄的行为，感动了县令，他亲授口供：“只承认佛教与基督教、神论与多神论的教义之争，互不相让，引起斗殴，失手伤人”，并嘱咐“宁死于刑，不死于法”。最后安慰二人“咬紧牙关，坚持一词，三次朝审，得不到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后经屈子厚上书官府，谓外国教士违约擅入内地，应据理驳斥。才使事态未致扩大。后来，徐全福、李金狗经过多次受审，受了许多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不改口供，致使官府无从定案。结果，清政府向外国领事馆赔偿了一批银两，二人终于获释。一场教案，就这样结束了。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一九一一年春来麻城考棚为其四叔代课时，经常以李金

狗、徐全福等反对帝国主义的事迹，来启迪人们的思想觉悟。直到一九六一年，董老在谈及宋埠教案时，还说“印象最深”。

(原文略有删节)

王五玉轶事

缪镜洁

王五玉，字辉瑞，名天贵，盐田河区三合湾村王家冲人。生于一八二〇年，卒于一八九二年，终年七十三岁。

王五玉先生，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阶级家庭，自幼读书，由于家庭境况不佳，没有赴京应试。只是个邑庠生，穷秀才。从二十三岁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近五十年，其子王兰亭，孙王再羲，相承父志，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盐田河地区颇有威望的教育世家。

王五玉先生，机智聪颖，心窍十足，善于诙谐，谈笑风生，在宾朋会宴和大庭广众之中，常以隐语博满座之欢笑。他十分痛恨地霸豪绅，惯用讽刺权贵的故事，以示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因此，倍受穷苦百姓的喜爱，在麻城、黄冈、罗田等县，人们至今还经常传诵着他的一些趣事：

一、赴试路上

王五玉，二十一岁时，正值大比之年，他赴州府参加乡试。由于家道中落，没有路费，只得肩背稿荐（草编的睡席）沿途向店主哀求，借一角之地安宿。一天傍晚，刚在店主家柴房铺开稿荐，准备休息，忽然走进也是去州府参加应试的三个考相公，他们衣冠华丽，气派傲然，一看就知道是富家公子。

这三个花花公子到店投宿后，马上就到店堂饮酒作乐。正当酒酣兴浓时，其中一个提议：“今日饮酒，要来个酒令，一咧显显我们的才能，二嘛以消旅途之疲乏。”其他两人表示同意。三人计议了半天，决定说四言八句，在句中要说出“忧中乐，乐中忧，贱中贵，贵中贱”十二个字。说得好的不付酒钱，说得不好酒钱全付。于是，三人各自深思苦想，但久久没人开口。躺在稿荐上的王五玉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他忍着饥饿的肤体挣扎起来，走到三个相公席前，打了一躬，说道：“小生也来参加一个，不知诸位可否？”三个相公一齐白了一眼，见他一付寒酸相，很久没人答腔。这时店主人上前说道：“这位也是上州府的考相公，你们不妨让他试试。”过了大约一盅茶时分，其中一个白胖胖的答道：“你能说得好吗？你如果说得我们三人叫好，不仅不要你出一文酒钱，连进州府的盘费也由我们包销！”说话时显出一付瞧不起的神色。

王五玉这才凑拢坐下。三个相公见王五玉坐下后，互递眼色，还是那个白胖胖的开口：“仁兄既来参加我们的趣宴，就请先讲！”王五玉从容不迫，点了点头就大声说起四言八句来：

“忧中乐，孝子门前奏大乐，
乐中忧，嫁女轿前双泪流。
贱中贵，妓女伴陪公子睡，
贵中贱，才子无钱睡稿荐。”

三个相公听了，明知五玉挖苦和鄙视了他们，但无一人说得出来，只得僵着颈脖子拍手叫好，王五玉不仅未花一文钱饱食了一餐，而且进州府的盘费也有了着落。

二、江 边 助 对

王五玉与三个公子到了州府后，见到早至的考生都在认真

复习功课，五玉顾不得游览从未到过的州府，即时投入了复习功课的行列，唯独那三个花花公子死玩活耍，到处闲逛。

一天清早，上百名考生在江边树荫下看书，正碰上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至江边浣衣，看书的考生没有一人瞧姑娘一眼，而那三个花花公子，出个怪像，跟在姑娘后面，要尽一切流氓动作，企图达到与浣衣姑娘答话的目的。

浣衣姑娘看透了三个花花公子的心，她暗想：这三个家伙，不复习功课，流里流气，浪子一定无才，他们想作弄我，我偏要为难他，让大家看个笑话。于是，姑娘便有礼有节地说：“你们三位一定是到州府来参加乡试的考相公，我出个对子你们对对，如果对得好，我接你们至我家作客”。三个花花公子，听到姑娘与他们答话，满身骨头软了，嘴笑裂了，连忙答应：“好！好！好！”浣衣姑娘头也不回，随手将一件红裙往水里一铺说道：“一件红裙铺绿水，”并逼着说：“对呀！”那三个花花公子站在姑娘的后面互相张望，哑口无言，最后向坐在堤上看书的王五玉噜嘴招手，要求五玉帮助他们答对。

王五玉知道他们对答不上，噜嘴招手的意思是求他帮忙，他便随口大声说道：“这个好对嘛！你们就对曰：‘三筒黑汉下黄州’，五玉的对语刚一落地，百余考生笑得前俯后仰，都齐声称赞：“对得好！对得准！”那位浣衣姑娘也笑得用手直接擦眼泪。而三个花花公子却羞得满脸通红，一溜烟地跑得不见人影。

三、会 戏 台 联

一八四八年，年刚二十八岁的王五玉，在麻城南门梅氏祠教书，南门唱五月龙船会戏，因无戏班，改至九月唱岳飞传。

当时，全县生员聚集于县城，准备赴京应试。南门会戏首

领，见此文人聚集良机，特求助于赴试生员，要求写一台联，其内容既要了结龙船会戏之愿，又要反映出传戏的内容。几十名生员，深思苦虑了一整天，没有一人作出一付恰当的台联来。其中有几位生员，是五玉的交友，便转荐于五玉，大家素闻王先生精通文墨，才学过人，无不同意去请教于他。会戏首领和几十位生员来到梅氏祠，说明来意，五玉以年轻无名，力辞其任。而会戏首领和众生员却坚决不依，王先生无法推脱，详问其情，遂随笔作出一联：

“表大将精忠，吊大夫孤忠，百世流芳，何苦折两朝梁栋，
演南宋传戏，补南门会戏，三秋奏曲，依然落五月梅花。”

台联写好后，众生员不仅为其书法流利而赞赏，更为台联内容贴切而惊讶，大家一致称赞：“王先生不愧为全邑文人所传诵，实天下奇才也。”

四、送 个 “ 雅 号 ”

王五玉在麻城镇教了近二十年书，由于他满腹经纶，又礼貌待人，因此，不仅向他求学的学生多，而且镇上的贫民百姓一遇逢时过节，红白喜事，找他写对联，做悼词的人也多。王先生对贫民百姓求他办理的事，从不推脱，总是认认真真地办好，因此，深受人们的尊敬。

麻城镇东门有个王皮匠，排号老三，街邻老小都喊他“皮匠老三”。大概是野鸡扒了祖坟，王皮匠利用做皮匠赚来的几个钱，开了个皮张铺，他倒买倒卖，从中渔利，生意越做越发。皮匠老三富了，于是就结识了些豪绅地霸。他在豪绅地霸的支持下，很快当了甲董，不久又升为保董，成了东门有权有势的暴发户。皮匠老三，权有了，家富了，头脖子也就歪了。心想：我是当地的保董，又是皮张铺的掌柜，没有个雅号，难

道老是让人叫我皮匠老三不成。他见王五玉乐于助人，于是找到王先生的学校，要求给他送个大号。

王五玉本来十分讨厌这种人，多次找他送号，都没理睬。皮匠老三死皮赖脸地跑了上十次，不奈意思何，就给起了个雅号，并用一张大红纸写上“阑波”两个大字，还作了一付对联：“拨开堆柴火越烧越发；学做杈角楼，宜室宜家。”雅号和对联写好后，请来几套锣鼓，放着鞭炮，同街邻一道送去，贴在正厅堂上。皮匠老三专门办了十几桌酒席，酬谢乡亲。还请来全镇豪绅，为王先生充当陪客。大家自然是酒醉饕饱，不必细说。

饭后品茶时，一些豪绅和街邻都要欣赏王先生的墨迹，大家踊到正厅去看雅号和对联。南门刘保董称赞雅号文雅中听；西门宋保董解释对联上联时，祝贺阑波兄还要大富大贵；北门丁保董解释对联下联时，祝贺阑波兄要做玉宇琼楼。唯独左邻的刘秀才一言不发，右邻的张屠夫暗自发笑。

观赏完毕，客人各自归家。邻街的一群人围着刘秀才和张屠夫，问他们为什么不做声，还暗自发笑？他们两人反问道：

“你们认为雅号和对联怎样？”大伙齐声回答：“王先生做的粑没瘪的！”刘秀才把长袖一摔，说道：“好是好，好笑人！”

“什么可笑？”刘秀才解释说：“‘阑’字是门里加个东字，这写的明明是东门，‘波’字是三点水旁边一个皮字，这写的明明是皮匠老三，合起来不就是东门皮匠老三吗？什么雅号。”张屠夫接着说：“那对联上联的第一字是拨字，‘拨’与‘剥’偕音，下联的第一个字是学字，‘学’与‘削’也偕音，上联的末尾‘发’字，下联的末尾是‘家’字，把四个字连起来：‘剥削发家’。”大家听后，捧着肚子笑弯了腰，都齐声称赞王先生有才干，刘秀才和张屠夫也有水平。

五、贵 客 “ 迎 门 ”

一八八〇年，王五玉已经六十岁了。平常，一些豪绅家中有什么喜事，都得接王先生喝喜酒，因为他的学生有不少已是当地名人了。学生被豪绅接去作客，老师未到，学生自然不答应。因此，一些豪绅请王五玉喝酒到不是真心，而是怕得罪了他的学生。

王先生六十寿辰快要到来的时候，一些豪绅合计着说：“王五玉平素光吃我们的，这次要以为他祝寿为名，我们也去吃吃他的，定要赶个本。”于是，就提前向王先生打了招呼。五玉听说豪绅们要为他祝寿，非常高兴，满口答应了，并说：

“我虽然家境贫寒，但六十寿日，一定是贵客盈门，你们都是本地人，必须要身着礼服穿阔气一点，帮我凑个门面。”

王先生的六十寿日来到了，他首先着人通知他的学生，一个也不准为他祝寿，只接待当地的豪绅们。学生接到通知后，大家都知道老师一定安排了一套有趣的花絮。寿日那天，吃罢早饭，果真成群结队身着崭新礼服的豪绅们向他家走来。五玉也雇请了几个跑堂的，将豪绅们脱下的礼服客客气气的接着，依次挂在堂屋的墙壁上，并领豪绅们到客房就坐聊天。

到吃午饭的时候，一餐特别丰盛的寿宴出乎豪绅们的意外。都想：王先生家里很穷，那来的这么多钱办寿席？但事实已经证明，寿席办得特别爱好，大家只得饱吃饱喝，五玉也陪着客人吃得肚子弯不得腰，喝得薰薰大醉了。

到寿宴快结束的时候，王五玉提高宽大的嗓门对大伙说：“感谢诸位对我的抬举，使我办了一餐丰盛的寿宴。诸位知道，我王某很穷，没钱办席，只好将诸位的礼服送到当铺典了，取来一些钱酬谢诸位为我祝寿。现在寿宴已经结束，各自

礼服的当票，我托跑堂的全部依次贴在大门上，请诸位各自去认票取当。”一伙豪绅知道，王五玉说得就做得出，再回忆起他的学生一个也没来参加寿礼，都知道自己上了当，于是，二话不说，向堂屋蜂涌而去，果真挂在墙上的礼服全都不见了，又都纷纷跑至大门，见当票真的贴在大门上，浆糊干了，撕也撕不下来，豪绅们计议了一下，只好下了大门，抬着大门向当铺方向走去。王五玉在后面放着鞭炮送客，并很有风趣地大声叫喊：“今天是我的六十大寿，诸位亲临为我祝寿，真是贵客‘迎门’”！王五玉这样一叫，惹得在一旁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豪绅们，抬着大门，前呼后拥，个个都哭笑不得。

六、痛骂奸商

一八七八年，王五玉已经从麻城回到了家乡盐田河教书，由于家境贫困，每挣上两个钱就到盐田河粮行去余回一点粮食度日。

一天清早，王五玉到粮行去买米，正碰上几位贫民百姓与粮行老板发生口角。几位贫民百姓因手中少钱，每人只能买几斤大米，粮行老板说他们生意做小了，要吃了早饭再卖，因此，互相争吵起来。五玉早就知道这位粮行老板欺行霸市，每年新粮登场，他以低价出，大斗进的办 法垄断粮食，囤积居奇。到第二年开春，正当劳苦大众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又以高价卖，小斗出的奸狡手段，盘剥农民。当地黎民百姓，无不恨之入骨。五玉见粮行老板与几位贫民发生争执，他想，这次是帮贫民百姓长志气的时候了，他便大步走进粮行。粮行老板和管帐先生假惺惺地点头弯腰接待王先生，五玉也装成调解口角式地对几位贫民百姓说：“争什么呢？有话慢慢说嘛！”粮行

的管帐先生想调和行里的气氛，接着五玉的话说：“是呀，王先生说得对，有话慢慢说，不要争，王先生会讲故事，我们先请王先生讲个故事，大家笑一笑，等我们吃了早饭，再把粮食卖给大家。”王五玉见粮行还是拖延时间，并把他当成消磨时间的娱乐品，肚子气得鼓蛮高，但他并没有发火，只是叹了一口气冷气道：“我昨夜一夜没睡，哪有闲心讲故事呢！”粮行老板忙问：“王先生昨夜做什么事去了，忙得一夜没睡？”王先生回答：“昨夜呀，我刚一上床就碰上臭虫、虱子、跳蚤为争儿子打架，闹得我一夜不能安枕。”粮行老板听王先生这么一说，觉得十分奇怪，他以好奇的心忙问：“它们怎么个打法，打出了结果没有？”王五玉接着说：“臭虫、虱子、跳蚤发现一个活像它们的小虫，各自都说是自己的儿子，争吵了一夜，还是得不出个结果来。后来，他们三位都来找我，一定要我秉公判决。”粮行管帐先生，摘下老花眼镜，偏着光头忙问：

“你判决没有？”王五玉不慌不忙的回答：“判决了！”粮行老板问：“你怎么判法呢？”五玉提高嗓门，咳嗽了一声说：“我把小虫捉在我的手掌上，叫臭虫、虱子、跳蚤都看着，对他们说：这个小虫要跳（祟）嘛就是跳蚤的儿，要不跳（祟）呢就是臭虫的儿，如果想跳（祟）又不跳（祟）就一定是虱子的儿罗！”

王五玉讲完这个故事后，几位买米的贫民百姓哈哈大笑，齐声称赞王先生的故事讲得好。粮行老板和管帐先生明知他们挨了骂，但不好出言，只得哭丧着脸，丢下早饭没吃，忙把大米祟给王五玉和几位贫民百姓。他们买好大米，乐呵呵地扬长而去。粮行老板只有等他们走后，望着王先生的背影瞪他几眼。

七、灯 头 联 语

每年春节，我们盐田河地区有玩龙灯的习惯。在旧社会，

一些权贵地霸，常常借着玩龙灯的机会，敲锣打鼓，放铳鸣炮，炫耀威风。

王家冲虽然不富裕，但在权霸面前不肯甘拜下风。有一年春节也玩起龙灯来了。一天，太阳快要落山，王家冲的龙灯已经玩了一整天，准备回村休息。在回村路上，碰着几个富家豪霸，见龙灯不登门贺彩，便高声大骂：“王家冲尽是些混蛋，瘟猪肉偏偏送上门，玩灯送福就过门不入……。”

王家冲的群众听了非常气愤，回村后把此事告诉了王五玉。王先生听后，二话没说，只是叫人拿来一张红纸，挥笔大书一幅对联：“我本西方慈父母，特来东土渡儿孙。”吩咐将对联贴在灯头显眼的地方，重新敲起锣鼓，向骂他们那几个富豪门户进发。

那几家富豪地霸，一眼看到飘荡扑门的灯头对联，气冲牛斗，但知道是王先生有意干的，又不好发作。只好摆上三牲祭品，磕头礼拜，鸣放鞭炮，表示欢迎。王五玉见豪霸们跪地磕头，便俏皮地说：“恭喜东主，我们特来贵府送福！”豪霸们忍着内心愤恨，皮笑肉不笑地一个响头一个是的回答：“是！是！是！”。

八、智服恶僧

东岳庙有个和尚十分暴恶，经常与当地流氓地痞一道，偷鸡摸菜，打骂群众，敲榨香客，骗取钱财，做了许多坏事，群众称他为“恶僧”。王五玉经常听到老百姓诉说“恶僧”和尚的为人，非常气愤，决定整他一下。

一天，王五玉来到庙里，一屁股坐在恶僧和尚的床上，大声叫道：“有谁在家？”恶僧和尚见是王先生来了，暗自小心，便忙从后殿走来，客客气气地说：“王先生，是那阵善风把

你吹来了？”王五玉答：“顺北风路过贵刹，给师傅烧根长香！”和尚说：“要先生破费，真是三生有幸！”王五玉见恶僧假装正经，便将脸一沉，手指恶僧和尚的脑袋说：“你出家人做的好事，知罪吗？”恶僧和尚见王先生此问蹊跷，火冒三丈回答：“王先生是发疯吗？”“混帐东西，看你床底下是什么？”王五玉用手指着床底下的一双绣花鞋。恶僧和尚落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心想：哪来的一双绣花鞋呢？慌忙解辩：“王先生，弟子从未接触女人，请多包涵。”王五玉指着恶僧和尚的鼻梁，叱责道：“你不仅敲榨勒索，打骂香客，竟敢还干出这等败坏佛门的丑事来，是公了还是私和？”

恶僧和尚明知上当，但又知道王五玉很不好惹，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甘拜下风，跪在地上连忙磕头，求王先生宽恕。王五玉见恶僧那种奴才像便说：“你的意思是想私和吗？”恶僧连忙回答：“是！是！”王五玉接着说：“要私和嘛，也容易，只要你答应三个条件，我可以不告官。”恶僧说：“请王先生直讲。”“一是今后不准你偷鸡摸菜，敲诈民财；二是不准你打骂香客和周围民众；三是不准你侮辱妇女，违反法规！”恶僧和尚不敢抬头，连忙答道：“是！是！是！”头磕在地上直响。

王五玉将那双绣花鞋拾起作为证物藏入袋中，拂袖而去。从此，恶僧和尚再也不敢打骂香客，敲诈钱财了。

九、四 句 告 词

一天，贺知县带着个风水先生，从三星鲍氏坟山路过。走到坟山正中，那位风水先生对贺知县说：“这个坟山的风水好，大人如果得此宝地，不仅要加官晋爵，而且可以富贵万年。”贺知县听了十分高兴。

贺知县回府后，恰碰他的太老爷死了。于是传令把鲍族户长找来，要把太老爷安葬在鲍氏的坟山上。这一着，可把鲍族户长难住了：答应吧，怕族人不肯。不答应吧，又旨意难违。只好回答与族人商议，即日复音。

鲍族户长回家的第二天，说明了来意，王五玉笑哈哈的说：“这好对付！这好对付！”户长问：“先生有何高见可以制服赫赫有权的县老爷？”王五玉满有把握地回答：“写四句状词至府上告他一状，就是毒蛇猛兽也可以降服！”鲍族户长喜得赶忙铺纸磨墨。王五玉在状纸上除一些套头语言外，写了这样四句话：“人言此地是仙地，葬下就要出皇帝，县令强行要葬坟，不知起的是何意？”

状词写好后，鲍族户长连夜赶至黄州府。知府看完状词，即时派人审理此案，查明贺知县强行葬坟的事实后，贺知县被问成“谋朝夺位”罪而成为国家的皇犯了。

十、巧对春联

盐田河有个雷老爷，家里人财两旺，他既儿孙满地，又家财万贯。自己读了十几年长学，但才疏学浅。由于他有钱有势，雷老爷十分傲慢，当地豪绅见了他，都要说些恭维话。

每年春节，雷老爷总要遍请当地的文人为他写春联，但没有一年写的春联使他满意。有一年。雷老爷想：年年的春联都没有反映出我家是人财两旺，今年的春联我自己作，再托别人写，一定要在春联上把我这个有钱有势的家庭炫耀一番。于是他从正月初一想到腊月二十八，好不容易才想出个上联来，下联不管怎样也对不上去。春节快到了，春联还未作出来，怎么办？雷老爷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请王五玉先生对个下联。

腊月二十九日，雷老爷拿着自己想了一年的上联来求王先

生答对。王先生一看，雷老爷作的上联是：“福禄齐来，五子九孙谁似我。”王五玉看后，二话没说，只是交待，请雷老爷在三十日天黑前派人来取对联回出张贴，保证不误贴春联的时间。雷老爷听了，喜得拱手道谢。

雷老爷在腊月三十日天黑前，派人至王先生家取春联，王先生已将春联写好，公公正正地叠折着。春联取回后，天已完全断黑了，雷老爷吩咐立即在大门上张贴起来，他对儿孙们说：“今年的春联是我作的，比任何一年的春联好。”儿孙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老太爷亲自劳神，全家一定大富大贵。”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太阳刚刚出的时候，雷老爷的大门外，挤满了不少看春联的人。大家都说：“这个春联对得好，有才有才！”雷老爷听了非常高兴，他喊来五个儿子一同出门欣赏春联，以助新春之乐。他们父子六人走出大门，抬头一看，只见春联写道：

“福禄齐来，五子九孙谁似我，
灾祸并至，七颠八倒不如人。”

雷老爷的五个儿子看完春联，对着父亲骂道：“你老糊涂了，简直是狗屁胡说，你还大吹你的春联作的好。”雷老爷眼睛望着下联，耳朵听着骂声，完全呆傻了，哑口无言。看春联的群众交头接耳，不时发出冷笑声，也同时走开了。

本文承蒙甘茂森、胡发和、董胜来、李仕斌、林荫辉、曹晴峰等同志提供资料，在此致谢。

吴久阶趣事

李成彬 陈 邑 整理

吴久阶（1845—1923），麻城市顺河集区吴家畈人。世代耕耘，家境贫寒。他读书时，买不起书就借别人的抄录，常常废寝忘餐。生活困窘，啃红苕，喝凉水，睡草铺，面壁十年，终于考取秀才，从此以执教为终身职业。

吴久阶性灵敏，多心计，聪颖过人，处事风趣，广为后人赞颂。

他喜作对联，且对仗工整，通俗易懂。料棚街一家油条店的主人非常贪利，待人刻薄。一年春节，店主请吴写副春联，他故意拖到腊月三十傍晚才写成。店主不识字，马上贴于门上。对联是：盆中有麵人无面；头上无毛屋有茅。大年初一拜年的过往行人一看，联想店主光头、麻脸、住茅屋，不禁掩面而笑。

一次，邻居叔侄吵嘴，侄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了叔父一拳，打掉两颗门牙。论族规要送官治罪，小子找久阶搭救。此时久阶正在打牌，听了小子之言，边打牌边说：“小事，小事”！小子不解其意，继续苦苦哀求道：“叔父告发，明天断案……”。久阶想，他叔父为人不正，心狠手毒，人称“蝎子”，正好借机惩罚一下，因而说：“站拢来，你听我说”。小子把耳朵贴近久阶，久阶将小子的耳朵狠咬一口，便哈哈大笑说：“官司赢了，官司赢了！”第二天，县太爷升堂，叔侄跪于地下，县太爷把惊堂木一拍说：“你等有什么不

平之事，从实讲来。先由老者申诉，小子后可辩驳。”“蝎子”诉说：“禀老爷，侄儿狠心打叔父，应按族规国法治罪，请老爷验伤”。小子忙辩道：“老爷在上，小子虽是村野愚夫，可礼义也略知一、二，我根本不敢打叔父。只是前天晚上，在我睡熟之时，他偷入我房，双手捉住我的手脚，用口咬我的耳朵，小子负痛，头一摆，撞掉他的两颗门牙，不信请看我的耳朵，请老爷为儿伸冤作主。”蝎子不防侄儿反咬一口，气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他……他，他是自己咬的”。县太爷火了，大喝一声：“胆大奴才，公堂之上还敢诬告，自己怎么能咬自己的耳朵？！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赶出衙门！”一场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又一次，吴久阶同几个朋友坐在一家饭店闲谈。忽然看见一个军官太太骑着马朝饭店而来。一友人说：“谁敢去捏一下那太太的脚，我愿割肉打酒待午餐”。吴久阶不慌不忙地跑到太太跟前，两眼审视着马鞍踏蹬。然后，一手将太太的脚举起来，忙说：“我说是铜踏蹬，你们偏要说是铁踏蹬，你们看，快来看！”那太太感到马配铜踏蹬而自豪，情不自禁地笑了，吴久阶的目的达到了，也笑了。

久阶常到铁匠铺聊天。一天，他要打一张茅镰，铁匠有意跟他开个玩笑，叫午后来取，铁匠见他远远而来，忙把镰刀烧红掷于地下。他刚进门，铁匠说：“师傅来啦，镰刀早就成功了，放在地下，请看”。久阶伸手拿镰刀，被烙了一下，转身就走了。事隔几天，又来此铺。铁匠问：“师傅，为么事这么多天不来坐坐呢？”久阶说：“我管闲事去了”。铁匠又问：“什么事要耽搁这几天呢？”久阶一本正经地说：“世上总有一些怪事，一家爷儿俩都是单身汉，想娶个内当家的，正好一个女人改嫁，爷叫儿去对相，一看就很中意。媳妇刚进门，爷

儿抢起来了，还是爷的劲大，把媳妇抢去问上门，高兴地说：

“嘿嘿，落（烙）了老子的手”。铁匠被骂，哭笑不得。

吴久阶六十岁时，老伴病故，他自挽一联：“为过一生难，淡薄油，淡薄盐，把你苦死了；丢下千斤担，不管儿，不管女，比我快活多”。

他替乞丐写的朝五脑山祷告文，至今不少人能全文背诵。其中一段云：

……别井离乡，屋宇田园非我有；求衣觅食，东西南北任吾游。不劳力，不劳心，收万户无粮之稞；未有妻，未有子，引几个落魄之徒。青竹一根，恰似终身伴侣；破瓢半个，犹如养老儿孙。白云深处有人家，不必向樵夫问径；绿树林中看气色，何须投寓所栖身。想来日后生机，不寒而慄；展望未来晚景，未老先衰。

光纸三张，只磕素头几个，诚心一片，祷告佛主千尊。不求女，不求儿，但得一身康健；不买田，不买地，唯求五谷丰登。东村晏罢到西村，共乐尧天舜日；此地游完到彼地，同赏绿水青山。诉不尽哀情，吐不完苦水，今生已矣，万事皆休！

（根据群众口碑整理）

盐田河的来由

很久很久以前，麻东地方的人们吃盐十分困难，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挑。加之路上常被盐官、山匪拦劫，许多挑脚的人就死在千里迢迢的途中。偶而弄回一点，又要受到当地财主的勒索。所以盐贵得出奇。一般穷人只好长期吃辣椒喝淡水，不少人都是有气无力，面黄肌瘦，脖子上长出一个大泡颈。

这儿靠山近河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位勤劳勇敢的小后生。由于他祖祖辈辈穷得冒腥气，一无盐吃，二无田耕。其父母为了讨个吉兆，改变穷困的处境，给他取了个富贵名字，叫盐田。一天，盐田听人家说海水能煮盐，又治泡颈，他立志要给乡邻办件好事。于是，他带着干粮袋，匆匆地告别父老乡亲，朝南边大海方向，踏上了遥远的征途。一路上，盐田不知是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终于望见了大海。他扑到海边，捧起一捧海水喝着，咸辣辣的。盐田喜得跳起来，巴不得把海水浇上天，像下雨一样又落到家乡的塘里河里。但是，凭他的力气能浇几丈高啊，怎么能将这海水带给路隔万水千山的家乡呢？他望着大海出神，愁眉不展。

十天过去了，半月又过去了。盐田每天都站在海边，对着大海诉说着家乡缺盐的痛苦。他消瘦了许多，头发开始发白，又破又烂的衣服在海风中像飘动的树叶。天天如此，他象这样，又度过了许多日子。

终于有一天，他感动了上帝。南海观音乔装成一位渔家女，送给盐田一个流不干海水的宝葫芦。并告诉他：“有难之时，只要将葫芦对天三摇自有人助”的警语，就不见了。盐田接过葫芦一倒，果然海水直溢不休。他朝天三拜后，又日夜兼程回家。回到了家乡，盐田急忙将消息告诉大家，及时立灶煮盐。从此，大伙都吃上了咸菜，十分感谢盐田。

不料，消息传到了不远处一位姓贾的财主耳里。贾财主见没有几多人用黄丝白银来换他的盐，气得发疯，对盐田恨得要命。同时，对那个宝葫芦却想得要死。一天，他召来几十个家丁打手，牵着十匹大马，吩咐如此这般，妄图害死盐田，一举抢夺宝葫芦，发一笔横财。

正当盐田和乡邻们喜悦地煮盐、分盐的时候，财主带着人

已悄悄进了村。无奈，穷乡亲毫无准备，有几个人被贾家打手当场打倒。盐田奋力搏斗，紧抱葫芦，意欲夺路逃走。哪知左冲右突，无济于事。正在这时，一个打手正举刀向盐田冲来，猛然间，盐田想起“将葫芦对天三摇”的嘱咐，就举起宝葫芦忙忙摇动，几乎在同时，打手下了毒手，顿时，盐田觉得天昏地转，倒在村头河边的血泊之中。

当贾财主得意洋洋抱着葫芦、带着打手，赶着马群逃走时，突然间，天昏地暗，大雨倾盆，宝葫芦口喷出汹涌的水柱，使他们摸不清东南西北，睁不开眼睛，只见顺河路前一条巨龙和一匹猛狮昂首扑向马群。顿时，盐遇水化，马见狮奔，家丁打手未死的各自逃命，财主淹死在盐水中。

后来，人们为了永远记住盐田这个悲壮动人的故事，在顺着河边的一些地方取了“观音崖”、“龙王岩”、“狮子脑”、“十马山”、“死贾垱”等地名，并将盐田倒下的那条河，定名为“盐田河”。

董胜来、缪镜浩收集整理

蕙兰山上蕙兰香

蕙兰山，位于麻、罗两县交界的地方。该山东西长为二点五公里，南北宽约一点八公里，总面积四点三平方公里。山势呈东西走向，南陡北缓，向西北方向倾斜。主峰在山的中心，海拔八五二米。这个山上，遍长蕙兰，当地人民每当蕙兰盛开的时候，最喜欢讲述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不知道是那一个朝代的时候，这个山脚下，住着一家姓鲍的大财主，家有钱财万贯，良田百亩。他膝下无儿，独生一

女，名叫蕙兰。蕙兰自幼受到父母的宠爱，脾气有些任性，但他聪明伶俐，乖巧逗人，常与穷人的姑娘一同上山，帮穷姐妹们砍柴、采药。虽然遭到父母的反对，但她不改初衷。

眼看蕙兰到了弱冠年华，尚未许配人家。她父母商定：要为蕙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这样，一来这万贯家产不会落入他人之手，二来俩老脚手一伸，也有个半子披麻戴孝，扫墓烧香。可是，蕙兰对自己的婚事，已有主意，她早就爱上了邻近村里一位叫林三的青年农民。林三老实厚道，勤劳正直。她想：如果同林三成家了，小两口忙时在家种田，农闲上山采药，自食其力，不象父母那样当吃人血汗的寄生虫，该多幸福！天长日久，蕙兰与林三要好的消息被她父母知道了，于是为女儿择婿的步伐加快了。

下面垅里，有个姓何的大财主，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已成家立业，二儿因父母对他的娇惯，飘游浪荡，婚事未定，人称“何流子”。早年，媒婆就向两家提过蕙兰与何流子的婚事，因鲍财主对何流子的为人早有所闻，故未答应这门亲事。如今，为了门当户对，鲍财主再也顾不上这些了，他认为只要是富家配富家，“流子”总比穷汉好。于是，他们再托媒婆，要立即把这门婚事定下来。

蕙兰听说父母已将自己的终身许配给“何流子”，气愤万分，即与父母大吵大闹，并说：“除了林三，我不嫁第二人，大人如果不依，我只有一死了事”。

鲍、何两财主，见蕙兰决意不从大人之命，他们反复密谋后决定：唯一的办法只有将林三害死。林三死了，蕙兰再没有心上人，到那时，也只好听从父母的安顿。两个奸狡巨滑的财主起了杀人之心后，即派何流子领着几个打手，趁林三上山采药之机，活活将其推入万丈悬崖摔死了。

坑里一些穷姐妹，很快把何流子摔死林三的噩耗告诉了蕙兰，蕙兰哭得死去活来，并哀求穷姐妹出个主意帮她摆脱虎口。大家商量了半天，都觉得暂时的办法，只有藏在穷姐妹家里，对外声张蕙兰逃跑了，至于以后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再定。

蕙兰突然“逃跑”了，周围群众中说得闹哄哄的。鲍财主夫妻俩，哭得泣不成声，何财主听说儿媳逃跑了，赶忙跑来看望鲍财主。两亲家反复分析，觉得蕙兰不会远走，一定藏在山上。于是商定：由鲍财主带着门婿一路上山寻找。岳丈领着女婿，当天就出发了，找呀找，天快黑的时候，找到山顶的一个山洞口，何流子高兴地说：“肯定藏在这个洞子里。看，洞子出进的路被踩得光光的”。鲍财主一看，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说：

“是的。一定有人把她送到这个洞子里”。于是，翁婿二人大步进入洞口，由于脚步声响，惊动了睡在洞内的两只老虎，老虎猛地起身，向来人直扑过去，把个鲍财主和何流子咬死在洞内。

鲍财主的妻子，听说丈夫被虎咬死，女儿又下落不明，痛哭了一场，结果也悬梁自尽了。

蕙兰听说父母双亡，开始心里有些难过。后又想到：他们嫌贫爱富，害死林三，平常又吃人血汗，死是天定。她回到家中，买好衣服棺木，收殓了双亲。并召来周围的贫民百姓，对大家说：“我父母原有的万贯家财和百亩良田，都是从你们身上刮来的。现在他们都死了，这个家由我当，你们各自回家，好好勤耕苦种，不要向我家交租了。”

一切家财、田地处理结束后，蕙兰花了一些银两，买了一挑香纸，她选择了一个风和日暖的天气，挑着香纸，来到林三被摔死的地方，磕头祭奠。祭奠完毕，蕙兰站在万丈悬崖上，大声呼唤：“林三哥呀林三哥，等我一路吧，我生没作林家的媳，死要成林家的鬼！”喊声刚落，猛地往崖下跳去……。

坑里的穷姐妹和周围的贫民百姓，赶到悬崖下，蕙兰已命丧黄泉。人人都泪流满面，大家捐攒了一些钱，买了很好的衣料给蕙兰做了七领嫁衣和制作了上等棺木。将蕙兰入殓后，与林三合葬在一个坟墓里。

周围的群众，为了纪念这位善良而多情的姑娘和勤劳正直的林三，大家跑遍了所有的山头挖来了无数株蕙兰和药草，栽种在蕙兰和林三殉难的山上。从此，这座山蕙兰盛开，药材满坡。这个山，人们就叫它“蕙兰山”，大家在农闲的时候，仿效着蕙兰和林三生前的活计，纷纷上山采药。至今，蕙兰山上除蕙兰盛开外，盐田河区还在山上建了一个药场，成为全省有名的中药材基地。

缪镜浩 搜集整理

磨子河趣闻

在元末明初的时候，盐田河这个地方，除经常发生兵乱外，有一年遭受严重的旱灾，两百多天没有下过透雨。庄稼颗粒无收，又加之瘟疫流行，老百姓饿的饿死，病的病死。

盐田河这里有个叫“饿子河”的村子，居住着二十多户人家，靠种佃田和讨米叫化为生，养育孩子，一伙富人讥笑这个坑的老百姓是饿大的，故唤名为“饿子河”。

饿子河的穷苦农民，遇上这种灾年，日子更加难过。全坑近百人，大部分被饿死、病死，幸存下来的，只有一位叫李三毛的男青年和他的堂妹李细姑。

兄妹俩，在处理完坑下死去的父老兄弟的后事之后，想外

出投亲靠友，维持生活。可是，出外一看，天呀，到处尸骨成堆，饿殍遍野。见此情景，兄妹俩抱头痛哭一场，只好仍回饿子河继续耕种度日。

三毛和细姑，通过辛勤劳动，渡过了灾年。往后，吃不愁，穿不愁，日子过得还好。

这时，从江西筷子巷迁来一些人氏，其中有一个大财主，有权有势，就是没有后代，想娶妾生子。他听说饿子河有个叫细姑的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十分漂亮，决心要娶细姑做小老婆。李细姑听到这个消息后，哭得天昏地转，想悬梁自缢，免受外来老财主的凌辱。事出意外，当天深夜，细姑睡着了，一位自称从南海过来的观世音在梦中对细姑说：“江西那个财主是要娶没有婚配的姑娘，你为何不与李三毛婚配？你只有与李三毛成婚了，老财主就不会娶你了，而李家也有了后代！”

第二天，李细姑怀着羞涩之情，将头天深夜的梦吃对李三毛讲得一字不漏。三毛想：我和细姑虽不是嫡亲兄妹，也是李氏一家，兄妹成婚，恐与天理不合。于是对细姑说：“兄妹成婚，实是对不起祖宗，但有观音菩萨作媒，成全我俩的婚事，我不敢不依；但有一条，既是菩萨成全，一定有天地作合，我俩各执一扇石磨，明早到后山去同时将石磨往山下滚，滚下河中，如石磨巧合，我俩婚配原属天意，我别无异议。”

三毛和细姑，第二天清早，各背一扇石磨，走上后山，到了顶峰，两人同时将石磨往山下滚去，石磨飞快地滚至河心，两扇石磨自然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停顿在河心。三毛和细姑，经菩萨作媒，石磨作证，正式婚配了。江西那个财主听说细姑已经结婚了，也就打消了娶细姑做小老婆的念头。

三毛和细姑结婚后，生了很多儿女，发展成大户大族，从此，饿子河也就改名为“磨子河”了。（缪镜洁收集整理）